

炎黄春秋

■ 孙中山为国家统一奋斗终生

■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

■ 两类矛盾学说的演变

■ 『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

■ 国民政府女官刘曼卿单骑赴藏

第2期
2003年

■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春 秋 笔

- 1 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 汪澍白
6 “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 钟沛璋
12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 盛永华
21 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奋斗终生 刘路生

人 物 志

- 26 文武双全的辛亥功臣黄世仲 胡志伟
31 国民政府女官刘曼卿单骑赴藏 田 文

沉 思 录

- 35 刑讯逼供与封建主义“草民意识” 江仁宝

英 杰 谱

- 40 滕代远受命组建军委铁道部 廖诗权 张宏一

求 实 篇

- 43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王忠人
48 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 薛衍天
52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陈清泉

挚 友 情

- 53 闻一多和顾毓琇的情谊 闻立雕

道 闻 录

- 56 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孙思源
62 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自杀”真伪揭秘 鞠九江 盛楠

亲 历 记

- 65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丁 丑

人 海 浪

- 67 抗战时期《文摘》创办人孙寒冰教授 郑兰荪

一 家 言

- 71 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 陈铁健

文 史 闻

- 75 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闵 杰

九 州 景

- 78 绵山的中国之源与中国之最 惠金义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镠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理 事 单 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 4.80元

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

● 汪澍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晚期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它原来是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篇讲话,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诸问题作了新的探索,系统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同年6月,在修改发表时,却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成为转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后来日益滋蔓,以致到“文革”时被奉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本文拟对这一学说在理论上的演变过程作一些粗略的历史考察。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对批判思想僵化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刚刚结束,东欧就出现了波兰的抗争和匈牙利的动乱,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

惊,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研究。1956年12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同时,强调政治上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人民内部分清是非;理论上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到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于18日和27日两次讲话,在两类矛盾中,他虽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强调要暴露敌我矛盾。在讲到闹事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又要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实际上已经把后来称为“引蛇出洞”的方针昭告党内高层领导了。接下来,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公开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两类矛盾作了系统而生动的论述,引导各界人士积极鸣放。

《讲话》回顾了马列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初步探讨,批判了斯大林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

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区别。斯大林在很长时间内他是不加区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讲话》还说,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指出了斯大林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并清醒地指出,我们当前依然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危险。本来,如果国家有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把好人当坏人整”的问题就难以发生。正因为当时的新中国还未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所以毛泽东提出区分两类矛盾的学说,就被人们视为一种新思维而受到热烈欢迎。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还分题论述了正确处理各方面矛盾的具体方针。如在经济上采取对城乡各阶层人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正确处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方针;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学术和文化领域,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少数群众闹事,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对群众积极进行教育疏导;在肃反问题上,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等。

2月《讲话》以后,为进一步澄清党内外种种疑虑,毛泽东又南下作宣传,反复向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时期,并把这个转变概括为: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南北奔波,谆谆讲解两类矛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希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至于其蕴含着诱导敌我矛盾充分暴露的谋略,当时却鲜为人们所察觉。

(二)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下达以后,党内外迅速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活跃气氛。中共中央紧接着又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新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请他们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热烈响应号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些批评建议有助于改进党的工作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群众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错杂的思想,并有个别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两院制”,主张“轮流坐庄”之类的不同政见。毛泽东认为敌情开始暴露,反击的时机趋向成熟,5月15日,他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下简称《变化》),作为内部文件下达。

《变化》一文劈头就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向前进了一步。”文章大讲“物极必反”的道理,这就同两个多月前《讲话》所强调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总方针迥然不同了。接着毛泽东又分析了整风中的动向,他说:“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两个多月前《讲话》的重点是批判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变化》的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来自右的

方面的修正主义了。《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变化》却推出了新的课题,提出要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预示着“风向”将要转变。为此,他还作了具体指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变化》的精神反了过来,它是要激化矛盾,促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场。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内部指示,对反击右派的方针、策略和办法作了具体部署。比如对当时在鸣放中一路领先的高等学校,他就特别关照:“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俾便“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6月19日,正当反右派运动趋向高潮时,毛泽东将作了多次重大修改的《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各报刊公开发表。文章的总题目和十二个小题目都没有变,但其主要精神已有深刻变化。首先就是重新突出了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话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于7月1日发表。社论直率地写道:“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

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这就把原来的内部文件精神公之于众,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大见成效,现在已按计划进入横扫一切魑魅魍魉与牛鬼蛇神的决战阶段。这篇社论除了将《文汇报》与章(伯钧)罗(隆基)网罗入罪,还对整个资产阶级右派作了定性判断。并提出:“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样一来,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转换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进一步论证:“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并且将苏联和匈牙利的情况作了对比,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基础之所以比较巩固,是由于进行了反对托派这样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匈牙利之所以不巩固,就是缺乏这样一场革命。他把中国的章伯钧与苏联的托洛茨基相提并论,定性为不甘心于灭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归入敌我矛盾一类。由此可见,发动反右派斗争,正是直接继承了斯大林反托派斗争的经验。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发出了继续深挖右派的指示,他说:“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同时他明确肯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揭露和解决矛盾的推动作用。并且说,这种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

1957年的大辩论同斯大林的反托派斗争,同样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但采用“四大”的形式则是新的创造,是毛泽东所赏识的。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确定了整风运动继续进行的方针和步骤;并重新讨论了什么是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10月7日和9日,毛泽东讲话,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讲话,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八大”的政治决议,而且也完全背离了他自己2月《讲话》的基本精神。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他的个人权威盖过了党的权威,所以他的这番讲话此后便取代了“八大”决议,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化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对1956年反冒进的再批判,一直延续到1958年夏天。

持续一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成为一场地地道道的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全国上下,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者55万人。他们大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对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作风,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批评的动机和内容大都是好的,其中即或有某些内容失实或见解偏颇,只要耐心进行对话,也不难加以化解。但是,由于最高领导人把问题提到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高度,各级党组织奉旨层层清查,便把不少正确或带有某些错误因素的批评意见罗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入了敌我矛盾。同时,又采用“热处理”的方法,一语定终身,甚而株连到亲属。这样大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沉冤二十余载,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得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重大转折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结国际和国内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确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尚未健全条件下,提出了一个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框架,

基本上适应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要求,因而具有新思维的性质。

然而,当时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却与此颇不同调。如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也讲到要让一些人“闹够”,以便从反面教育人民的意思。现在我们翻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可以发现当年许多风刀霜剑般的词语和春风化雨似的《讲话》几乎是同一时期出自于同一人之口,就不难看出《讲话》的确还寓有一层诱导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和激化的深意。但这种两面性,当时并未被揭破。至5月中旬撰成《变化》一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也只有党内干部得知。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修改后正式发表,两类矛盾学说的框架未变,但阶级斗争观念又在这个新框架内恢复了活力,像旧酒注入新瓶一样,依然保持着它的原汁原味。再通过为时一年的反右派斗争实践,便初步奠定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其要点有五:

第一,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反复。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与“八大”《决议》在理论上似乎可以互补。然而,毛泽东由于担心中国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动乱局面,不惜运用“诱敌深入”的兵家韬略来发动反右派斗争,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更断然否定了“八大”《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重新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种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反复,是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第二,提出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新概念。

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便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战线

和思想战线上,因而独特地提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概念。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句话表明政治革命的要义在于夺取政权。然而,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再来一次夺权斗争,或者对被推翻的阶级再采取大规模的暴烈行动,都只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混乱。况且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说过:“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可见,不能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一旦提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或把思想战线与政治战线连在一起,采用大批判、大辩论的方法,借群众运动的压力来解决,就势必会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阶级斗争和反右派及后来开展的其他政治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第三,突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强调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苏共二十大以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以不同方式尝试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中共中央1956年4月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改革采取了审慎的支持态度。毛泽东1957年2月的《讲话》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条主义错误,进一步透露了支持改革的新思维。但到6月修改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时,矛头已经公开转向。文章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这不啻是对刚刚萌芽的改革思想给了当头一棒。自此以后,改革总是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而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则往往被视为立场坚定的表现。积久便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惯性心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因此被整整推迟了20年。

第四,开启了按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的端倪。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历来也是从经济关系入手来分析农村和城市的各种阶级关系,制定各项政策。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但他后来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别出心裁地按照人们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论划分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来,这就错误地提出了按政治思想标准来划分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按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的情况更逐步升级,终于孵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等一套极为荒谬的理论。

第五,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使其成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合法手段。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他认为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强调要把它“传下去”。实际上,在确定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方针以后,“四大”已形同皇权专制时代的“奉旨申斥”,经过几个月的“四大”演习,此后的思想与政治领域便呈现出打手逞凶与百家缄口、百花凋零的景象。1958年更把这种形式推广到经济领域,发动“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1966年又借助它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终于酿成不堪回首的十年内乱。

以上五点,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此也不难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及以后修改发表的文章,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造成了极为复杂而又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至今仍不能低估其深远影响。因此,回顾这一段历史,认真探讨两类矛盾学说的演变过程,对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林耀)



“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

● 钟沛璋

“以俄为师”这个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国内发动了十次起义，都归失败。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诞生了中国的、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大权，之后又是军阀割据。封建势力依旧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17年彼得堡的炮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重新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提出了“以俄为师”口号，同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华大地曾经焕发了蓬勃的革命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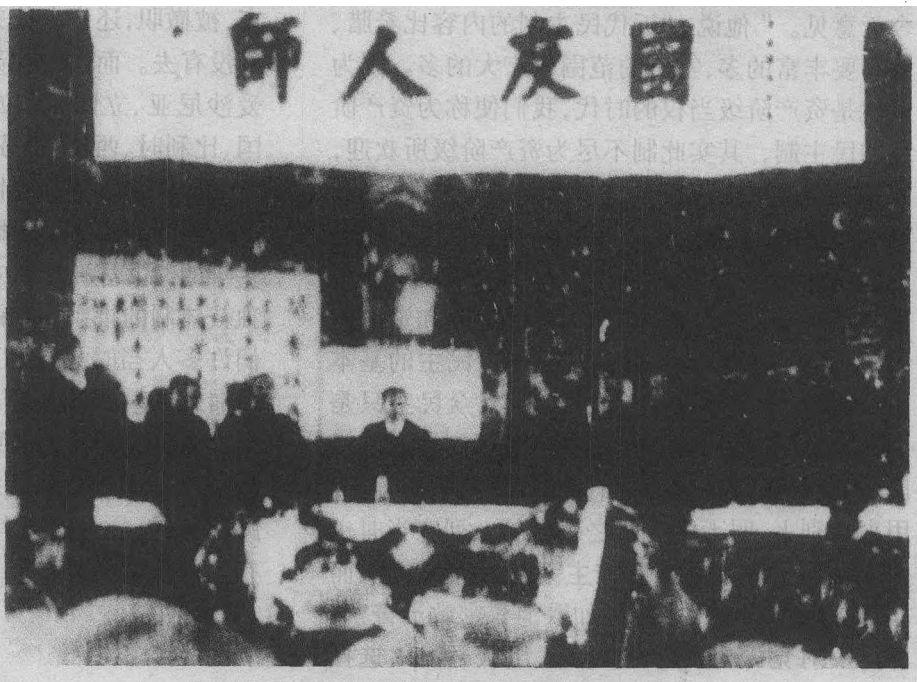
孙中山当时说要以俄为师，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俄国“以党治国”的经验。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因此现在他要以俄国为模范，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他制定了《建国大纲》，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所谓“训政”，就是要全民受党化教育。孙中山在倡导革命的过程中，接受过西方的民主思想。他说他提倡的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民权就是“德谟克拉西”，就是民主。但当时他对民主的认识还是粗疏的，而在另一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思想。作为革命领袖，他还是摆脱不掉自古以来以圣王明君自居。1914年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际，就规定了“誓言”，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

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他担任党的总理后，又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在几经挫折之后，孙中山现在看中在党内实行集中制而以党治国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以为老师，也就很自然了。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创立的。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坚持党应是由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党应有铁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么艰难复杂的环境，列宁当时强调纪律和集中是可以理解的，正确的。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也并不是一党制。但是到1922年底，苏联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局面。这种没有其他党派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僵化、专制埋下了隐患。列宁当时已感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他一再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在晚年曾强调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但设想没有变成现实。他感到党的领袖专权的危险，在1924年他去世前，曾建议要把性格粗暴专横的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却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当时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党即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以党治国、党内高度集权的党，而提出以它为榜样，“以俄为师”，这就为蒋介石后来实行专制独裁开辟了道路。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学生自居。孙中山去世后，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这就是后来蒋介石

实行的“党权高于一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由来。蒋介石终于背叛了革命，他实行法西斯专制独裁，最终遭到全国人民唾弃。

今天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在思想上最早起来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是坚持民主宪政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培等人。针对国民党要实行一党专政的势头，他们激扬文字，纷纷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攻击



1924年2月，孙中山在追悼列宁逝世大会上致悼词

国民党的文章。胡适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他们批评什么呢？一是批国民党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国民党“训政”，没有宪法或约法，训政就是专制；三是批国民党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实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罗隆基说：“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独裁制度，因它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的挑战，自然惹怒了国民党。当时已屠杀了大批曾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对这些主张人权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放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中央要严惩“反革命”胡适，撤销其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对罗隆基则更不客气，干脆把他关押了起来。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场反对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的抗争，很快被国民党压制下去了。在中国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奔腾不息的浪潮中，尽管这场抗争仅是几颗浪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二

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看待“以俄为师”的呢？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很大帮助，中共受苏共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不过，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最初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国情，指出，设立书记，遇事公决，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杜绝个人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有较高的威望，开会时，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早有察觉，绝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会发生偏差，因此要求会议给予纠正。他注意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以上引自沈建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陈独秀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几经挫折，从国民党的监狱，到晚年困居四川江津，以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1940年9月，陈独秀在写给濮清泉的信中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

今天意见。”他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的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的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至为宝贵；不幸十月（编者按：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来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警觉到‘民主是对官僚主义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择自由等，LT（按：即托洛茨基）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择自由，然而太晚了。”陈独秀并且提出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之亲缘性的观点，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的混合物。

陈独秀当年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抵制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瞎指挥，不买他们的账，结果被栽赃陷

害，被撤职，还责令他去苏联。陈独秀抵制了，幸亏没有去。而当时在苏联的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包括中国共青团的领导人俞秀松，都被斯大林杀害了。陈独秀因身受其害，又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在1940年提出了对斯大林独裁体制的批判，是深刻的，也是比较早的。而我们许多人当时只看到斯大林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革命导师”的光环，根本看不到斯大林体制的消极面。西方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也是晚了多年之后，才相继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批判独裁制的有巨大影响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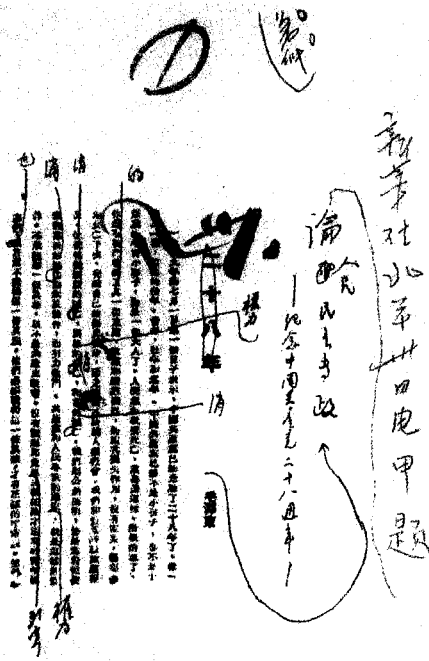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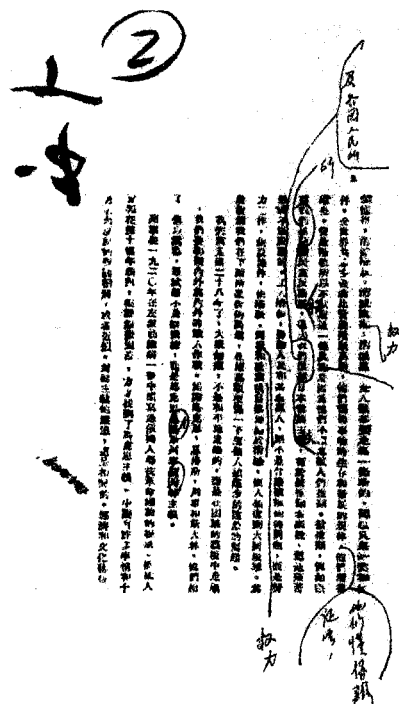
三

说到“以俄为师”就自然要说到“走俄国人之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意气风发、在当时影响极大的雄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论起，回顾先进的中国人，历尽艰难，寻求解放的道路后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主张要向俄国一边倒。文

章批驳了对这个结论抱怀疑的一些观点，如：

“你们一边倒。”毛泽东说：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你们独裁。”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部分清样修改稿

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文章，使许多人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真理完全在俄国人一边，俄国人实行的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只是对反动阶级、反动派。我们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倒向俄国一边。回想新中国创建之初，许多人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并且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见，“走俄国人的路”这个口号影响之大。对斯大林的迷信，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歌颂的文章。当时我在上海主持《青年报》工作，也曾在报纸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陈伯达的庆祝文章，我还记得这篇文章最后的一句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斯大林这个迷信才被突然打破。真是晴天霹雳：“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怎么竟然是杀害自己同志的人呢？据揭露，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俄罗斯联邦前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而这些杀害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批准的。据已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自批准枪决所谓的“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

还需要特别提到的，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有逃出斯大林的镇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指挥员中的3个，以及所有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5万重要军事政治干部被害，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以上材料均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再加上，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多个情报（包括当时德国驻苏大使向莫洛托夫的明显暗示），毫无应战

准备，以致德国的“闪电战”第一天，就摧毁苏联飞机1200架。德国猛攻苏联三周后，苏联将近30个师实际上已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大约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库被击毁。

面对这样冷酷的事实，人们不能不问：由列宁亲自缔造的寄托着人类希望的被认为是“开辟新纪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在斯大林手里变成如此封建专制王国的？这是人类在20世纪历史中需要严肃深思的一个大课题，不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总结，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社会，也是需要总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立即震惊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引起人们普遍的深思。现在回头来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提拔起来的人，他显然没有能力和水平，揭示问题的根源，指明改革的方向。但是他当时捅破黑幕（过去曾被称为“铁幕”）的胆识和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了斯大林几方面的问题，但是引起人们最为震惊的，是斯大林肆无忌惮地杀害自己的同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贯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同志却大不以为然。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难免的，第二是认识偏差。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功是七分，过是三分。《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和12月，曾连续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阐述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很为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是“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毛泽东坚持要“走俄国人的路”。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所谓“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还继续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

的必要性。他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毛泽东同志那时对斯大林的这些评价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维护，遭到了东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批评。毛泽东感到国内外都出现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发动公开的论战，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赫鲁晓夫这个最大的反面教员、活靶子。这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长达一年半之久，连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当时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不断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广播“九评”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这场论战，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以至在中苏边境发生了一场珍宝岛之战。这场论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是中国人要“走俄国人的路”，而俄国人却不同意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许多年后，在修复中苏关系的时候，邓小平谈到那场论战时，对俄国人说，那时我们大家都说了很多空话。而事实上，至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空话。因为为斯大林辩护的“九评”，正是两年之后对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

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大讲子孙后代都要学习苏联，也就是要继续“走俄国人的路”的时候，刘少奇、彭真、周恩来、陈云等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是不是毛泽东同志没有看到不讲民主的危害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说美国发展快，其政治体制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说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毛泽东同志还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上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但是，在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看得更为严重的是，他那时感到否定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的同时，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所以他认为必须挖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根据毛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1957年1月访苏时当面问过赫鲁晓夫，你们20年同斯大林一同共事，至少也可以少作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对此赫氏的回答是：“斯大林独断专行，根本不可能进言。”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周恩来向苏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几年后很快就同样反映到中共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来了。尽管中共许多领导人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抵制，毛泽东同志还是一意孤行把中国人民拖进了“文革”的十年大灾难。“文革”中迫害的，仅中央一层就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军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察委员34人，人大常委委员60人，政协常委74人。所幸的是不同于斯大林统治下那样，中国这些人没有都被“肉体上消灭”。

四

1991年，貌似强大的苏联顷刻瓦解，为斯大林主义、“走俄国人的路”，画上了句号。但是，怎样认识斯大林主义，怎样认识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它为什么能在俄国和中国这样东方的国家生根？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教训？这是需要长久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些年来，在俄国和我国都有人做了大量工作。或是披露过去人们不知道的内幕，或是进行分析研究，发表了大量文字，出版了不少书。例如，原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列昂·奥尼科夫在1996年出版的名为《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的著作。我国《国际政治研究》杂志2002年第3期刊登的中国社科院原苏联研究所所长徐葵编写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共产党的特征及其垮台的原因》，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

的“苏联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都是从制度上来分析斯大林主义的悲剧根源,值得很好看看。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女性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在她未完成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批评推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纯粹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卢森堡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即1918年写下《论俄国革命》手稿,而在她殉难的第四年才被印行。之后,陈独秀也从制度上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半个世纪前,即1940年9月,当斯大林还高居在至高无上神龛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从个人恩怨上来看斯大林,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按:即秘密警察)政体,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

徐葵的文章中,有一段触目惊心的话:

苏联是先有苏共垮台,后有苏联的解体,而苏共本身则是由党内种种弊病把自己毁掉的。经历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即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有着1900万党员和40万基层组织的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于顷刻间,毫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的一大悖理现象。从苏共的党建和党的工作原则的角度来剖析,苏共是由党内的种种弊病给毁掉的。这就是:党内包括党机关内部完全缺乏民主;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党委会)及其所有工作机关垄断了全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党内实行高度保密制度,党的工作缺乏透明度等等弊病,1900万党员完全被剥夺了自主性、自动性、自我管理精神和自我表达的可能,广大党员长期只能驯服地执行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命令。斯大林把党变成了对国家和人民进行个人统治的政治工具……普通党员毫无权力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疏远和漠不关心,这是苏共于1991年遭禁止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挺身而起的根本原因。

《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登载的上述两篇文章中,列出了苏共执政丧权亡党的许多历史教训,

如:

斯大林实行党政合一、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党领导和包办一切,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集中于总书记个人手中。

党的干部不是选举而是任命的,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政府部门干部。党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的限制。

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完全控制信息的传播,排斥和否定外来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大批判和专政方式,甚至用肉体消灭的办法,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党内的严格保密制度成了党的机关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

党机关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党中央机关从1919年时的30名干部,扩大到1987年的1800人,还大量使用“编外”干部。民主集中制成了官僚集中制,个人集权制。

邓小平说,我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中国党也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党和国家的垮台,不能不引起中国党的深思。邓小平在1986年曾多次谈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6年过去了,我们改得如何?我们有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每一个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责任心、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的人,都应该认真对照一下苏联、苏共这面镜子,从中切实地记取教训。

中共“十六大”总结了13年来十条基本经验,并对我国体制改革作了若干规定。可以看出这些历史经验,已经与毛泽东晚期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大不一样了。中国在进步。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 方 晋)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

——纪念宋庆龄诞辰 110 周年

● 盛永华

1966——1976 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 1959 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当时身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不多。但从宋庆龄的记载不详的言行，从保留下来的她给亲友、同志、同事的一些信札，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后她对“文革”的批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在十年内乱中，对那股乘机篡党夺权的

反革命逆流进行最大限度而极为艰难的抵制与抗击。大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宋庆龄是从觉察、警悟、认识，到抵制、反抗以及后来的揭批和反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所能作的一切，从而使人们更能认识和理解宋庆龄——这位对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为国家 and 人民利益从未停止过战斗和前进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宋庆龄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既无思想准备，又感困惑不解。

宋庆龄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并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坚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她心目中具有极崇高的地位。因此，她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宏伟目标——“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保证新中国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开始也是相信的，并力图使自己跟上运动的步伐。

及至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宋庆龄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受到冲击。尽管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1966 年 8 月 30 日，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就是宋庆



宋庆龄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

龄,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她在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闯入;她北京居所周围的高音喇叭搅扰得她成天不得安宁,红卫兵在她住所的围墙内外贴上毛泽东语录,将住宅内的一些石狮子涂上红色,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楹联匾额也拿了下来。宋庆龄当时仍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群众运动的。1966年8月,她写给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她告诉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而且“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宋庆龄尽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她对这场“革命”还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诚地要求自己通过运动来改进工作。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说:“请您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对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您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她还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宋庆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女士受托打电话给李云,说“夫人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宋庆龄的某些忧虑还未形成明确的判断——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事变还未充分展开和暴露。

后来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急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甚至操纵。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恣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为他们上台做准备。这时,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许多同事与战友,很快就“靠边站”,进而被批斗,被关押,他们当中有些同志因不堪受辱和

迫害含冤自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被戴上特务的头衔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弥天大罪)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而几乎陷于停顿,正如她后来所叙述的那样:“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它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

就在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干部名单后两天,北京街上即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有红卫兵要冲到她家里贴大字报,还要剪掉她的发髻——他们认为那是“四旧”的东西。北京宋庆龄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不仅开会串联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70多岁的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令宋庆龄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曾是孙中山最早的战友及追随者。他倾家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他的家是革命者的联络点。而他又不要宣扬自己,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隐君子”)周恩来为此出面干预,对红卫兵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图谋才没有得逞。

当然,宋庆龄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邃的洞察力。虽然面临的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她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禁产生了怀疑,感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所宣称的革命目标相去越来越远。她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同年11月,经宋庆龄审定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尽管刘少奇已身处逆境,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在书本的扉页上,赫然留有宋庆龄亲笔书写“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的题签。

宋庆龄对来势凶猛的无休止的所谓“破四旧”十分忧虑,明显反感。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提出质疑:“前几日送给您一小包梨及熏鱼,是家里饭菜存下来的,给你尝尝。你说那是‘四旧’么?我一向心里当你是自己人,分一点给你犯错误么?”斯时,毛泽东曾派江青往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宋庆龄对于当时红得发紫、权倾一时的野心家江青能当面提出如此直率的意见,表现出她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心胸又极其狭窄的江青,对宋庆龄的批评如何受得?她对宋庆龄从嫉恨发展为仇恨,伺机报复。江青对宋庆龄的仇恨,举一事可见一斑: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此,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6年出版的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两书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当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看到封面有周恩来的题签,疯了似的将书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咒骂宋庆龄,给她扣了许多不

三不四的大帽子。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江青的疯狂举动,不仅是对宋庆龄的嫉恨,也是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江青打击宋庆龄的恶毒的一手,便是要歪曲抹杀孙中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颠倒黑白,并将其“批倒批臭”。

正是江青等反革命一伙的倒行逆施,使忧国忧民的宋庆龄对“文革”很快便怀疑警觉并进而抵制和反击。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尽管毛泽东在宋庆龄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得到很真诚的信任,也尽管宋庆龄对隐藏于党内高层的野心家的真面目一时还难于完全识破,但宋庆龄仍如她过去的大半生一样,在历史潮流中绝不随波逐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背离原则,对于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进行坚决斗争,她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真理。

①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第一个重大反击,便是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居然有人公开将矛头指向为国人与世人普遍敬重的孙中山。为此她不得不以74岁的高龄,再次奋起捍卫孙中山的事业与旗帜。当然她相信她并不是孤军奋战,毛泽东早于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文革”的岁月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充分肯定的,他们给了宋庆龄以巨大的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

1966年11月,中国人民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在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在演说中,她非常简洁而又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一生的业绩和他与时俱进的步伐。她把孙中山的一生概括为“一

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谈到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时，她说：“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这笔遗产是毛泽东早就肯定了的。宋庆龄进而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在当今仍有着深刻的意义：“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她指出，“孙中山还有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对于孙中山晚年不断地修正错误，不断地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三大政策等，宋庆龄认为这“显得更加光荣”。

留存下来仅有的很少的资料，记载了宋庆龄写作《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的情况。1966年2月，宋庆龄给时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的好友爱泼斯坦先生的信中曾提到：“我一直在用心写我那篇为纪念孙中山所用的文章，但我需要你的大力帮助。”

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了。纪念大会开过后，宋庆龄很想请所有帮助过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聊，但那时已经“不是时候”，政治形势的复杂可想而知。期间，她对文章的修改，内容的取舍，乃至表述的方式，会有很多考虑。她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详述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毫不含糊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这不仅是她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也是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保护民族遗产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更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倒行逆施的抗击。宋庆龄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文革”那些颠倒是非的岁月里，江青一伙不但对孙中山、宋庆龄放明枪，还施暗箭。歪曲他们的婚姻关系，散布关于宋庆龄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即是他们拙劣的伎俩之一。在这个已成为历史的个人生活问题上的中伤和诽谤，完全是服务于他们卑劣的政治阴谋。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鼓噪。在“文革”初始，宋

庆龄对那些恶意中伤不屑理睬：“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但不久以后，当她警觉到这是“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乎孙中山、宋庆龄的个人形象和声誉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图篡改历史时，便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起而反击，维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真实性、合法性。

1972年11月9日，宋庆龄致函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时，指出在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的错误。她说：“在利昂·沙尔曼写的那本传记中，我发现她在描述我的婚姻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她郑重地声明：“我是从上海去东京并于1915年10月25日在那里同孙逸仙结的婚，这就是说，我们结婚的时间是在他们（指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作者注）离婚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婚姻是在东京市登了记的。举行婚礼之前，我们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书上签了字。结婚的证书是一式三份，这些证书分别由孙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师和田瑞保存。”宋庆龄指出，“很久以来，敌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传教士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诽谤。”她请韩素音“采取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办法把我这个声明公诸于世，以正视听”。相同内容的信件，宋庆龄还寄给了她的朋友麦克唐纳。

1973年2月27日，宋庆龄写信给孙科的亲戚林达光，批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一书中所“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她郑重地告诉林达光，当她与孙中山结婚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正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他父亲把离婚和结婚的事都告诉了他。”宋庆龄认为孙科应“还保留着这历史性的家庭档案”。

宋庆龄还于1973年3月13日亲自致函索尔兹伯里，直率地批评他的错误：“首先要感谢你惠赐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读。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史实上的错误。孙逸仙在我同他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时，他是自由的。（结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说的1914年，当时我还

在上海。)……反动派和传教士(他们常常是反对进步的)试图造谣污蔑我们,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丈夫的儿子现住加利福尼亚,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上述事实的证言。”

宋庆龄敦促索尔兹伯里改正他书中的错误,同时严正提出:“你也许可以向你曾咨询过的那些所谓可靠的参考资料来源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是一则极为恶劣的不实之辞,他们到处散布是有罪责的。”及至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时,立即给作者去信表示“对你的情谊深为感激”。

然而,在那个是非颠倒、以谎言取代现实的年代,暗箭仍不断射来,宋庆龄继续以各种方法顽强地反击。1973年8月23日,她致函挚友爱泼斯坦夫妇。(他们历经无数考验仍然无限忠诚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受“四人帮”的迫害而蒙冤陷狱长达五年之久,此时刚刚出狱)她在信中说:“请读一读附上的剪报。你们作为我的挚友,请告诉我对这些有关我的诽谤性文字,我该怎么办。这些有关我的谎言时不时地得以刊布,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和愤慨。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来同这个斯坦利·卡尔诺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指爱泼斯坦夫妇——作者注)是否能写篇东西来制止这些谎言流传呢,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不断重复的谎言会变成事实的。”她在给孙科的妻弟陈志昆夫妇复信时,还特意“寄去一张我的旧照片,是坐在我丈夫的像前照的。”并请他们代为问候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平和孙治强。

如此等等。事实上宋庆龄所作的决不仅是她和孙中山婚姻真相的辩证,关乎对江青之流的政治阴谋的揭露,而且是对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反击,表现了她一贯的革命原则性。

②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另一种反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保存力量,而对国际友人的保护,更维护了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文革”开始后,民主战士邹韬奋的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的沈粹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据她回忆,当时宋庆龄对她极为关切,

“几乎三天两头来一封信,每信必问我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要保护身体,给她写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沈粹缜,宋庆龄建议她搬到自己母亲生前的住所去住,那幢房子属于私人产业,解放后由上海市政府修缮后交还宋庆龄的。宋庆龄以为那里可以当作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沈粹缜在征求邓颖超同志意见后,刚搬进去住了一个多月,又被“造反派”以“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线”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由,勒令搬了出来。

当时,不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长期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受到迫害,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投入牢狱。宋庆龄和他们很熟悉,因此忧心如焚,尽力设法给予关怀和保护。当她得知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被无端怀疑、面临遭受迫害时,她立刻为他写了那份在粉碎“四人帮”后十分著名的“证明书”,派秘书及时送给路易·艾黎。在“证明书”中,宋庆龄列举了艾黎为中国人民解放和进步事业奋斗几十年的功绩,明确表示“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这封“证明书”及时地保护了路易·艾黎免遭“四人帮”的毒手。

还有,宋庆龄对当时蒙冤身陷囹圄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的子女的关怀和安慰。

宋庆龄对亲友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当她得知表弟被抄家,所有衣物被抄走后,便将自己能用的衣裳都给了他们。当她得知表妹倪吉贞一家因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被扫地出门,只得挤住在间破旧的小屋,并被作为“管制对象”强迫劳动时,她设法通过中国福利会的干部送去一点钱,给她们以精神安慰和物质支持。关于此事,在宋庆龄1967年11月29日给沈粹缜的信中有所记载:“我的老干部蔡曼云,一年多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她被关起来。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为她代我交了一些钱给我一个表亲的缘故?因为她一直很老实,守纪律的,也不和坏人来往。如果你听到她的消息,请不要瞒我吧。我对她应该负责!除了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

我的表亲从未参加政治或做过坏事,一直很老老实实的。”这封信表明,宋庆龄是很明白自己的处境的,但是她坚持自己毕生奉行的原则——坚持真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不管这恶势力有多么强大。

尽管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人的名单,但江青、张春桥一伙却从未放弃打倒宋庆龄的阴谋。1968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的住所抄走大量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庆龄与他的来往信件及底稿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宝。在上海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在市革委的报告中,强调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并说“这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由于是毫无根据的欲加之罪,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未敢贸然下手,但恶毒用心已显而易见。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她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的办法。现在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为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根据沈粹缜的回忆,“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几个惊叹号。”从保存下来的宋庆龄1966年9月24日致罗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于此信内中谈到对“文革”及“破四旧”的看法(本文上面已引述),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别注上“此信看后即烧掉为荷!”字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的好友美国女记者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给宋庆龄的复信中,曾着重说明:“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在“文革”中,宋庆龄与好友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谈论对这场“革命”的种种看法。他们住得很近,宋庆龄的信都交由忠诚的保姆或司机送去。遵照宋庆龄的意见,马海德在阅信后即销毁。后来“造反派”抄他的家时,虽然抄走了许多文书资料,但没有发现宋庆龄的信。而宋庆龄另外一位长期的忠实的同事与朋友、《中国建设》杂志的第一位社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却因为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没有及时“阅后烧掉”那些信件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被“造反派”抄家后不久,金仲华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杀。

“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在“文革”整整十年中,宋庆龄始终以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历史进程暂时的逆流中,年逾古稀的宋庆龄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她以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特殊的抗争,非但保持了自己的崇高政治气节,而且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从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以后,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前,除出席极少数必须参加的国事活动外,宋庆龄基本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有些庆典仪式,她不愿出席是因为她不愿成为“摆设”。但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面前,她没有消极退缩,更没有置身度外。除了本文上面所述她的各种抗争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她关心着国家的生产建设及各条战线的状况,特别是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四人帮”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和破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努力与那些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事业的外国朋友保持着联系,并尽可能认识新的朋友,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极左的自我禁锢,向世界传递关于我国的客观正确的信



1976年宋庆龄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夫妇

息——宋庆龄确信解放16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一切方面都取得伟大的成就，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成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想抹杀也是抹杀不掉的。1970年1月，她在给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她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和金杨，让你们看看我们的一些成就，你将会为你的祖国感到骄傲”；“我希望在哪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宋庆龄确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新中国前进历程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主流，她要把这些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介绍给全世界。

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岁月，宋庆龄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和所发生的变化，大至祖国统一、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复交，小至抗震建筑材料的研发，都在她的关注之列，并为在艰难中前进的祖国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

而欢欣，而且及时将这些成就介绍给外国友人。1971年，在毛泽东发动的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乒乓外交”之后，宋庆龄致函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指出此举的重要意义，表达了自己的乐观。她说：“周恩来总理把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称为揭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实际上就是重新打开门户，这句话说得多么正确。接着许多美国人士从不同的兴趣和目的出发前来访问，这都是你知道的。”1975年春，第四届人大开过以后不久，她致函美国友人罗森夫人，称：“我们四届人大常委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向二百九十三名战犯颁布了大赦，其中有些是在押的国民党著名将领。这的确是许多其他事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对台湾定能起到积极的影响。”不几天后，她又给罗森夫人去信，告诉有关北京轻微地震的消息，并且喜悦地告诉她：“我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一种新的建筑方法，现已高到十八层的北京饭店，就是按类似的方法盖的，将来的地震对它不会有影响。”

她还建议英文《中国建设》杂志刊登文章，“介绍这里外科手术的惊人成果”，如此等等。宋庆龄用特殊的方式，向世界传递消息，不遗余力地介绍十几年来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最本质的部分——除表达了她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前途的坚定信念外，更是从特殊的角度宣传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宋庆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背叛祖国的林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走向覆灭的开始。国内政治形势有了一些松动。同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紧接着“乒乓外交”之花开始结果，结果之一，便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一切，使宋庆龄受到鼓舞，她的“民间外交”——尽管她是国家的副主席——变得更为活跃。除了书信外，她开始陆续通过报刊传达自己的声音。英文版《中国建设》是她向国外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宋庆龄在1972年第一期《中国建设》上

发表了题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这是她在沉默了大约五年之久以后,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文章列举了20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客观存在,使美国朝野不得不重新检讨和修正他们20多年来,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错误,也使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认识到,“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一个逐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存在,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中国的存在。她确信,“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透过乌云,看到远景。宋庆龄毕生保持着政治上的敏锐,并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介绍给全世界。

通过报刊,宋庆龄还给朋友送去关怀和友情,她继续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架设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1972年2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失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十分悲痛,她除发去唁电外,还在《中国建设》上刊文《纪念埃德加·斯诺》,追述斯诺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帮助和贡献,表达对他深深的怀念。几个月后,她又在《中国建设》上撰文悼念另一位美国友人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和她的丈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候,出版《中国呼声》杂志,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以后又长期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宋庆龄深切怀念这位忠诚的老朋友。她说:“格雷斯·格兰尼奇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热情将永远鼓舞着太平洋两岸所有认识她的人。”宋庆龄以博大的胸襟,给各国朋友送去关怀和温暖,也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友谊和支持。她被誉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友好的代言人”。斯诺夫人在谈到宋庆龄的关怀时,曾深情地表示:“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并遵照斯诺的遗

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他曾在那里授课的前燕京大学校园),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坚冰被打破的前后,许多外国朋友急于访问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把宋庆龄视为良知的化身,最可依赖的朋友,纷纷写信向她求助。宋庆龄告诉友人:“许多美国政府内的人及商家、新闻记者都很急的要来看看中国。不但是他们,我自己的许多老朋友,都来信要求帮助他们到新中国来参观。”“艾达·普鲁伊特、陆懋德和十几位一直为我们积极工作的其他朋友,让我为他们来华帮忙。我曾为鲍威尔夫妇申请过签证。”宋庆龄也尽力给予朋友们帮助,她不厌其烦地给朋友们复信,指导他们来华需办的各种手续。她要朋友们来“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且她要求朋友们在报道中,既要写目前,也要“写未来的远景”。宋庆龄陆续与许多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其中不乏二十年代及三四十年代就认识的,如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籍日本友人有吉幸治、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美籍华人杨孟东、新西兰友人贝特兰等等,甚至还有她青年时代在美国留学时的友好。她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美国著名的耳外科专家萨缪尔·罗森夫妇、史迪威将军的儿女、美国著名记者



宋庆龄晚年在北京寓所

索尔兹伯里等。

在“四人帮”对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严重的干扰破坏,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遭受损失的时候,宋庆龄坚持与各国朋友友好交流,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给世界。这是对“四人帮”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而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团结了一批真诚助我的朋友。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革命终于战胜反革命。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笼罩在祖国上空的阴霾被吹散,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春天。宋庆龄由衷地欢呼:“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1976年11月3日,她致函爱泼斯坦:“……快活起来,艾培!现在是那些‘横行夫人’(暗讽‘四人帮’)的最好时节。如果你和邱茉莉这个时候能来,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南方的特别风味。放松一下吧!”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1978年3月,85岁高龄的宋庆龄带病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她已身患多种疾病——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多次摔跤造成骨折;支气管炎使她咳嗽不止;多年的荨麻疹(家族的遗传病)反复发作奇痒无比使她夜不能寐。但她还是快乐地表示:“不论怎样,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内部敌人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斗了。”

宋庆龄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的祖国充满了信心与期望。她对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此“我们才能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才能信心百倍地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同时,宋庆龄深感一定要将“四人帮”的罪行公诸于众,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进行

历史的审判,将这伙反革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才能真正地拨乱反正。因此,她把揭批“四人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四人帮”被粉碎,至她1981年5月逝世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这位80多岁的老战士从未停止过对“四人帮”的控拆、揭露与批判。这些充满战斗力的批判,见诸于宋庆龄的目前已经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和一百多封书信当中。

首先,宋庆龄从本质上断言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是“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文革”使得“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同时“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她怒斥这一伙罪魁祸首祸国殃民,“把我们的国家和事业推到了毁灭的边缘”。

她在给友人杨孟东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外国衣裳(西装)都给我表弟的五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到极点的婊子江青所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赶出家门,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宋庆龄为人、为文一贯温文尔雅,文采斐然,在她的文章和给友人的书信中,充满了睿智和幽默,像这样直率的骂人话仅见这一次,可见她对江青一伙愤恨至深。

1981年1月,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进行审判期间,88岁高龄的宋庆龄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撰写《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一文,在追思自己长期的忠实的同事和朋友的同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宋庆龄革命的一生中,她所有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个人,她的目光也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她对“四人帮”的批判的目的,正如她在文章最后所写的那样:“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老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是宋庆龄对祖国、对人民的崇高责任感的体现。

(责任编辑 庄建平)

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奋斗终生

● 刘路生

争取和保持国家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军阀割据,建立统一、共和制度的多民族国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他的思想与革命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为实现和谋求国家的统一,孙中山奋斗了一生。

“担心中国被分割”

在 19、20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惨遭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是刺激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动因。

1894 年夏,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一开始战局对清军就十分不利。到年末,清政府败局已定,割地赔款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清政府连连丧师辱国,已失去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能力。于是,孙中山乃在檀香山约集志士,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宣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华。”1895 年初,孙中山又建立香港兴中会总部,筹谋发动广州起义,打响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兴起。孙



孙中山

中山悲愤万分,手绘《支那现势地图》,将“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警心”。奋笔题记,引用前人诗句说:“‘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太息久之。”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1903 年,孙中山撰写了长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指出清政府无力保全中国独立,无力阻止列强的瓜分。文章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民情论证,也用当今世界已进入“天下交通,文明渐启,光气大开,各国人民唱自由之义、讲民权之风以日而盛”的时代论证,中国人民决不“肯甘受列强之分割”,将以“同仇敌忾之气”,“出死力以抵抗”。从反抗列

强“分割”的民族大义出发,孙中山称赞义和团的民族正气,他深刻地指出:“义和团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表现了他伟大革命家不同俗流的卓越见识。

怎么才能阻止瓜分,维护独立和统一,以拯救危亡的国家呢?孙中山明白地说:“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1905 年,革命党人在日本成立了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二是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革命。

保皇党说革命会造成连年战争,必将引起列强干涉,招致瓜分“灭亡中国”。孙中山在制定革命纲领,提出并阐释三民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亲自撰写文章,并指导革命党的理论家批驳保皇党人的言论。革命党人指出:瓜分说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不能自立,其所以不能自立,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外人之所以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所以,清朝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只有用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富强统一的国家,才能最终阻止瓜分中国。革命不会引起列强干涉,而中国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敢死之气”,才能遏止列强干涉,才能使“近数年来西土人士,无贤不肖,皆知瓜分中国必不能行之事”。

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后,中国可能会出现群雄割据分裂不统一的局面,孙中山亦有充分的估计。1897年,他就对日本友人说过,综观中国“古来之历史,凡国经一次之扰乱,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1906年,孙中山又一次谈到这一严重问题。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

既能拯救中国又可避免分裂实现统一的方法何在?孙中山认为:在于实行共和政治制度。他说,中国历史上出现不统一的局面,“皆由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故各穷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孙中山认为:“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民”运用革命的手段,迅即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制定并颁布“共和宪法”,依照宪法建立强有力的“国民政府”,以领导治理国家,国家即可统一富强。那些在革命战争发展起来的各路英雄人物,“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在中央政府的“驾馭”之下,“以尽其才”。按照联邦共和的准则,排除其凭借兵力割据之野心。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沦陷京师,孙中山疾呼:“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孙中山设想在华南“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以作为拯救中国的根基。为此,他曾策划过两广独立,也曾发动过惠州起义。这是在非常时期,“担心中国被分割”,以非常手段,维系国运,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方案。事情虽未获成功,但体现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贯追求和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

“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坚持建立共和制度和统一国家的最高原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抵制南北分治方案,坚持以共和统一为前提的南北和议,乃至放弃临时大总统,举袁自代,终于使中国保持完整的版图,以先进的共和制度诞生于世。

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响应,革命政权迅速控制了半壁江山。然而,革命党人仍不能一举推翻清政府,建立统一全国的革命政权。清廷还在负隅顽抗,北方军事、政治力量首领袁世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这就使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出现了是统一还是分裂,统一于谁,统一于什么原则之下等一系列问题。在革命处于面对多种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由海外返抵国内,受命于危难之际,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成为革命政府方面的最高决策人。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开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庄严地昭告世界:新生的中华民国要实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这五大统一,既是孙中山为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规定的历史任务,也是他对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所寄的期望,为中华民国描绘的美好前景。而统一的根基则是革命的共和制度,即孙中山所说:“尽扫专政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北和议谈判已在进行,孙中山表现了希望南北和议成功的极

大诚意。但和议不是无原则的。他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说:和议的条件是“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即和议的前提是实现全国共和统一,而不是北方提出的实行清政府君主立宪。孙中山表示:为了促进南北共和统一,愿意亲自北上与袁世凯谈判,也欢迎袁南下谈判。唯一的条件是:袁宣布赞成共和制度,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当时全国上下一片“非袁莫属”之声。南北和议的成功,也就是孙中山让位临时大总统位给袁世凯。于公于私,对孙中山都极为不利。但他光明磊落,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他就向临时参议院举袁自代,让位给袁世凯,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与政治远见。

孙中山也深知共和统一不能靠乞求取得,革命党人必须有坚强的实力(包括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还必须充分准备,倘和议破裂,即依靠武装北伐,推翻清政府,以实现全国共和统一。他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一旦和议失败后的作战方案,并先后致电黎元洪等,部署北伐军事以作为和议的后援。孙中山说:“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

南北和议期间,曾有“南北分治”的政治解决方案提出。当时美国记者麦考密曾对孙中山说:“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孙中山不拿共和统一的原则作交易,断然回答道:“不,那不行!我国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北京并没有政府。”稍后,孙中山在回顾南北和议时的局势时说,对于当时某些人制造的“南北分治一说,余绝不赞成,故思协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

在南北和议谈判过程中,孙中山还十分可贵地坚持了一条主张,即和议是自己国家内部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解决,反对假外国之手左右和谈大局,或者谋求外国力量的仲裁与保证。他首先断然拒绝以南北分治来换取外国的承认,接着又断然拒绝把优待清室条件交海牙国际公会存案的荒谬主张,认为这是一种有伤国体的耻辱。他复电伍廷芳明确指出:把优待清室条件“交海牙存案,民国内阁反对者多,其理由:一,国内之事件,交列国国际公会,大伤国体。二,不信国民,必须存案于外,即为丧失外国信用,牵涉于国际”。



孙中山

三,“正式公文通告各国”即可,并明示伍廷芳,优待条件“不交海牙存案”。

当然,在尘埃落定之后来看,当时的整个和议过程中,孙中山以及所有的革命党人确有许多失误和不足之处。在后来忆及辛亥和议时,孙中山也十分遗憾地说:“溯辛亥革命之役,吾人调和心理,失于过急。”但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革命派诸领袖人物中,孙中山是坚持共和统一最力,主张最坚决,斗争最顽强,理论最为完整的一员。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成熟的民主革命领袖,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最高水平。孙中山坚持了共和统一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共和国制度,并领导制定通过了《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把共和制度固定下来,为以后十年间的反独裁、反复辟、反军阀混战,统一国家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思想武器。

“我南方为护法而起”

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十余年间的

中国,名义上是共和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则是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转而为各个军阀争相割据,互争正统的亚分裂状态,即孙中山所说:“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但孙中山始终认为,不论独裁以至恢复帝制,还是军阀混战,都是暂时的历史逆转,是不能长久的。共和统一才是全民族的要求,是大势所趋。他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但是,统一则应从属于共和原则。他说:“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文志在共和,终始不贰。”孙中山高擎着共和国和《临时约法》的旗帜,为维护和谋求国家统一而奋斗,道路十分艰巨而坎坷。他被迫再度流亡国外,两次被排挤出广东而避居上海。

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举袁自代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的初衷相反,袁世凯为谋专制独裁,“背弃信托”,制造了宋教仁案,破坏约法。孙中山毅然发动了二次革命。袁势力则诋毁孙中山是制造“南北分治”,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孙中山愤然驳斥了这种谰言,指出:“此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为其坏约法,叛民国,是用讨之,以惩不义而奠我国家”,二次革命乃是在于维护共和制度与《临时约法》的尊严。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共和国建立不到二年之时,就以反民国罪而被迫流亡海外了。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系争权攘利,破坏约法,“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的地步,“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孙中山指出:北洋军阀“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如任伪共和专制全国,是奖乱也”。他揭橥护法大旗,于1917年7月南下广州,以民主空气较浓厚的广东为根据地,随行者有朱执信、章太炎、廖仲恺、何香凝等。9月,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领导护法战争。孙中山阐明了护法战争的正义性,指出:这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我南方为护法而起”。“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名为南北战争,实共和主义

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他庄严宣誓:“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竭诚尽智,相我法纪,以返邦人于真正共和之域”。

然而,孙中山并无可供直接指挥的军队,参加护法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各怀目的,尤其控制广州的桂系,更是多方掣肘军政府。1918年初,西南军阀和政客又导演了军政府改组,排挤孙中山,孙中山由大元帅改任七总裁之一,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此次失败之后,孙中山着意扶植陈炯明统率的粤军,作为护法的基本武装,陈炯明是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自然以为可为依靠。1920年10月,粤军打回广州,11月孙中山由沪赴穗,重组军政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民国政府,是为第二次南下护法。孙中山重申:“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立即宣布出师北伐。首先出兵平定广西,设大本营于桂林,1922年,又移大本营于韶关,进军江西。但陈炯明及其控制的部队不仅反对北伐,而且于6月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再次离粤,护法战争最终失败。

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孙中山为国家共和统一艰苦奋斗了十年。失败和挫折没有使他气馁退却,而是“愈挫愈勇”地奋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使他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提高认识,逐渐认清了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更新了统一国家的道路和方法。首先,孙中山痛切地承认了护法斗争的失败。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以后,孙中山彻底放弃了护法的旗帜。他说“现在护法可算終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毁法之徒,反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国会成了军阀利用的工具。其次,经过了失败后的反思,使孙中山从本质上认清了国家长期分裂不能统一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他说,“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帝国主义是中国分裂与祸乱之源。他说,数年来的护法战争,是“直接与北方战,间接与欺凌我国之帝国主义而战”。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逐步有了本质的认识,这是他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大飞跃。第三,找到了为实现国家统一而斗争的可靠的朋友和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他从备受帝国

主义歧视、干涉、扼杀的痛苦教训中,深切地感受到只有苏俄是支持中国革命、统一大业的真朋友,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国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同志。正是基于此,就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共产党人被视为洪水猛兽的20年代初,孙中山却在经过了从1918至1922年五年之久的接触、思考、研讨之后,以他饱经沧桑的政治阅历和政治家的洞察力,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同苏俄结盟的决策,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然宣称实行对外联合苏俄和对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1920年,处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表示,亟望结束中国极端混乱和不统一的局面,他说:“我相信,这个问题如果循着正路走去,一定有解决法找得出的。”他锲而不舍,为寻求这条正确的救国道路而奋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后仅仅二、三年间,便果然寻找到了。这就是与苏俄合作,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召开国民会议。

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返回广东,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一大宣言》的制定,表明了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主张具有了崭新的内容。一大宣言中的民族主义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在致苏俄代表加拉罕的电报中也说:国民党一大的目的在于:“继续辛亥事业,以底于完成。使中国脱除军阀与夫帝国主义之压迫,以遂其再造。”“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具体地说,孙中山的国家统一主张又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国家统一的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统一,就必须“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第二,他从俄国革命的历程为中国统一事业找到了有益的经验。第一条是建

立“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的革命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第二条是创建“革命军”,作为“革命党的后援”。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培养革命军队骨干的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队,经营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寻找到了实现国家统一真正可靠的物质力量。第三,革命武装力量为后盾,以和平手段求得国家统一,其途径是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说:“中国最急最要的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但他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

国民党“一大”之后不久,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孙中山认为这是谋求开国民会议,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有利时机。于是,决计应邀北上。孙中山通告军民,此行的目的是“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发表《北上宣言》,要求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1月,孙中山由广州起程北上。此时,他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这是他13年前应袁世凯邀北上之后的再次应邀北上。13年的世变沧桑使他预感前途未可乐观,他深知国步维艰,心情十分沉重。诚如他在北上登程时对蒋介石所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非常危险,将来是否能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北上途中,所到之地,孙中山在广州、上海、日本、天津等地多发表长文、演说、答新闻记者谈话,侃侃阐释三民主义大义,擘划和平统一大业蓝图,反复申述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和平统一的主张,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然而,天不假年,正当他以新的思想境界,向着新的目标奋进之际,顽疾夺去了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签署了他的《国事遗嘱》,念念不忘“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表明孙中山为国家统一奋斗到最后一息,也表明他未能亲睹国家民族统一,乃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责任编辑 江之洲)

文武双全的辛亥功臣黄世仲

● 胡志伟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回顾90多年前的现实,革命胜利的成果被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政权多数被封建余孽、保皇立宪派、满清官员以及军阀政客所控制,而甘冒矢石冲锋陷阵的革命党人却陆续遭到诬陷杀戮。例如,1911年10月31日,革命党的湖南都督焦达峰与副都督陈作新被立宪派首领谭延闿麾下乱兵狙杀;1912年5月4日,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被代理都督陈炯明即捕即杀;1912年8月,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被剪辮的满清协统黎元洪枪毙;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遣奸徒暗杀于上海车站。其中,黄世仲案乃是民国肇建后第一宗政治冤案。

《洪秀全演义》风行海内外

黄世仲,字小配,别署禺山世次郎,笔名黄世颂、黄棣荪、棣荪、荪、老棣、棣、棠、堯、亚堯、黄帝嫡裔、黄裔、世界一个人、世次郎、世、禺、禺山次郎等,多寓复汉排满之意。清同治十一年生于广东番禺县茭塘司崇文二十四乡(今广州市芳村区西塱村),少颖悟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据他自述:“童时与高曾祖父谈论洪朝,每有所闻,辄笔记之。”“孩童随父兄入于演剧之场,见夫傀儡登台,忠奸贤佞,神形毕肖,为之心往神怡。遇忠者爱慕之,奸者怒嫉之。”

清光绪十九年冬,他22岁时,以居乡不得志,乃偕兄伯耀先后渡南洋谋生。两年后(1895)回乡,目睹广州乙未起义失败,陆皓东等数十名志士慷慨就义,其反满思想高涨,四出探访英烈事迹,决心以小说的形式来唤醒国民推翻满清。

他攀登白云山蒲涧寺,结识太平天国侍王李

世贤幕府、削发为僧的璜山上人,彼述及洪朝往事如数家珍,并嘱为之书。故他返新加坡后开始构思《洪秀全演义》。时闽侨邱菽园在星创办《天南新报》,他于业余常投稿该报,抒发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亿万同胞命运的关怀,乃受赏识主持该报笔政。从现存的《天南新报》查悉,自1902年7月18日至1903年3月25日,他在该报发表政论68篇,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皆有涉及,内容丰富,以中国问题为主,诸如《论广西矿务不宜给法商办理》、《论中国维新之变局》、《论张之洞之禁〈新民丛报〉》等等,间中也发表一些感时伤事的古体诗。

庚子国变后,黄世仲在星洲撰写了他的处女作——20万言的述史小说《镜中影》,以热河西狩到庚子拳变为经,何珠儿(影射慈禧)和吕思瀛(影射李莲英)狼狈为奸祸国殃民行径为纬,其时间跨度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长达半个世纪。小说刊行时,同盟会已经成立。作者告诉读者,国政操于何、吕之辈手中,已腐败不堪,即使皇帝欲有作为,也是无力回天。小说结尾吕思瀛梦见京城旌旗纷起,一阵大风摧塌宫殿,隐喻保皇无用,唯革命起义才能救中国。

1905年6月起,他在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发表连载小说《洪秀全演义》,自序指出:“四十年来书腐亡国,肆口雌黄,发逆洪匪之称,犹不绝耳……昔之贬洪王曰逆匪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狙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民国第一任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赞此书:“撝拾太平天国遗事轶闻及古老传说,效三国演义体编演而成,洋洋三十万言,章太炎为之序。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且巨。”

《廿载繁华梦》为晚清小说巨擘

1905年,他在广州《时事画报》推出44回长篇小说《廿载繁华梦》,由岭南派著名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绘配插图。此书主角周庸佑影射广东大买办周东生,作者以周氏的暴发至败落为主干线索,以甲午、戊戌、庚子等重大事件为背景,集中描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揭露官商勾结穷奢极欲,旨在宣传反清革命。冯自由称颂此书,“绘声绘影,极尽能事,大受社会欣赏,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此书实为巨擘”。

1906年9月起,他在《少年报》连载小说《宦海冤魂》;翌年6月将该小说扩充为三十二回长篇小说《宦海潮》,发表于香港《中外小说林》旬刊。小说前半部写张任盘(影射张荫桓)由市井无赖爬上出使三国大臣的发迹过程,表现满清各级官吏无知昏聩;后半部写张氏出使美国的经历,用西方物质文明、开明政体对比中国贫穷落后、封建专制,意在宣传反满革命。作者自述:“是书无一事无来历,或得耳闻,或本目睹,或发现于新闻社会者。其余点染,出使外洋事迹,则取材于张氏原著日记、书本为多。”

1908年9月,为了批驳君主立宪等保皇思潮,他在日本东京推出长篇小说《大马扁》,揭露“康圣人”原来是个妄自尊大、贪财好色、忘恩负义的大骗子。从陈少白、曾克端以及康有为二媳庞连的回忆录来看,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基本上符合原型,故评论家钱杏邨说:“抨击保皇党的《大马扁》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政治宣传效果;从艺术造诣上说,也是放之晚清第一线作品而无愧色的。”后又说,“所以这样抨击康有为,目的是为民主革命运动铲除绊脚石,廓

清道路,……他是为着种族革命的利益而作此。”

1909年冬,香港《实报》出版黄著《宦海升沉录》,背景自甲午战争前后至光绪、慈禧逝世十数年大事,如中日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之变、中俄纠纷、向英借款等,从中描述袁世凯青云直上至被迫下野,重点突出满汉之争,借以鼓动读者的革命情绪,从汉族大官被冤杀被罢斥的惋惜与愤懑,证明国事之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

《党人碑》为孙中山树碑立传

1907年9月,他在《时事画报》连载纪实小说《党人碑》,叙述原武(影射孙中山)与友人陈虞(陈少白)、杨文(杨衢云)等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并筹划乙未年广州起义以及事败后陆皓东等党人英勇就义,对比康有为为一伙贪图功名、钻营谋官等卑污嘴脸,爱憎极为分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倘以报道乙未广州起义事迹而言,比诸邓慕韩撰写《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及邹鲁撰《乙未广州之役》都早了12年。

1909年,他在广州《南越报》连载时事小说《朝鲜血》16章,以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事,推论“今后乃知20世纪之民气,虽亡国遗裔,而终不可轻视也。”此书对革命党人一年后发动黄花岗起义产生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

1910年9月,他在广州《南越报》连载时事小说《十日建国志》,描述葡萄牙共和党首领布勒格“以草泽英雄愤然肩国家之重任”,举义兵攻占王宫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歌颂了“为自由而死,为国民而死”的革命英雄,鼓动国人效法葡国共和党人,起来推翻满清专制统治。

1911年6月14日,他在



黄世仲铜像

《南越报》连载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以亲身亲历记述惊天地、泣鬼神的广州黄花岗72烈士之役，包括筹备、发难、战斗、失败、被捕、逃亡、逼供，种种细节如对白、服饰、时间、金钱等数字均在。这篇反清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要在满清统治下的广州发表，且连载57日，故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新闻纪事形式作伪装，语言简朴，文风激昂，是为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1911年11月9日（广东反正前3日），在新创刊的《新汉日报》推出小说《新汉建国志》，将辛亥前20年中革命党人的奋斗史，原原本本，据实详叙，俾成信史。作者以报社总司理名义刊布预告曰：“凡我同胞，留心国事者，皆当各手一篇，则于新汉建国源流，自不至数典忘祖。”

黄世仲在旅港8年间，连续发表20部以上小说，竭力鼓吹反满革命，是同他本身从事的新闻工作分不开的。1903年他从南洋回港，以尤列介绍，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历任记者、编辑和主笔，与郑贯公并肩战斗，成为兴中会后期及同盟会时代华南进步报人中之两员闯将。

《辨康有为政见书》气势磅礴

1904年1月《世界公益报》创刊，他应主编郑贯公聘，转入该报任主笔，一度接手编务，公开号召“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投袂而起，光复中国”，因而被冯自由称为“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后因排刊扬州10日记歌谣，报社东主以过于激烈请略变宗旨，他又与郑贯公共进退，于同年3月31日随贯公创刊《广东日报》，继续鼓吹革命。翌年报社易主，6月复与贯公创办香港第一张小报《唯一趣报有新谓》，言论果敢，宗旨专一，一纸风行，为省港各报之冠。在短短两年间，郑、黄两人合办三家报纸，声誉与销路驷马凌驾《中国日报》。这三家报纸文字通俗，副刊活泼，其粤讴、南音等民间说唱文学以及诗词散文很能引人入胜，发扬民族主义，不亚于《中国日报》，一时革命派报纸之声势为之大张。

1906年4月，郑贯公遽逝，黄世仲独树一帜，创刊《少年报》，自任总编辑。次年12月创办《社会公报》。1909年6月，《南越报》在广州创刊，黄世仲等同盟会员任编撰人。1912年11月9日，

广东独立前3日，他在香港创办《新汉日报》，任总司理，创刊号登载了武昌起义后的民国军事记以及孙中山、黄兴、黄花岗烈士的照片。

在杂志方面，1906年9月、1907年5月、1908年2月黄伯耀、黄世仲昆仲与欧博明先后创办了《粤东小说林》、《广东白话报》旬刊和《岭南白话杂志》周刊；1907年6月，黄氏昆仲创办《中外小说林》，同年12月改名《绘图中外小说林》，担任主编。黄世仲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政论文章，批驳康有为保皇主张，支持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径，鼓吹拒俄运动，反对美国迫害华工，要求收回路矿权益，禁烟禁赌反苛捐杂税等等。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乃是1903年刊于《中国日报》的3万余言长文《辨康有为政见书》，还印成小册子分送海外各埠，内有康“欲以唇枪舌剑，对敌风潮，借胡清之剑印，以诛尽汉种之头颅”等语，痛快淋漓，气势磅礴，从此黄世仲声名大振。其它如《粤汉地界之缪辑》、《香江楼赋仿阿房宫赋》等，或暴露清廷割地卖国，或揭示官吏之骄奢淫逸，篇篇都掷地作金石声。最大快人心的是，1911年11月6日他在《世界公益报》上以头条报道《指看京陷帝崩，武昌起义成功》，不少报纸转载。广东清吏见报后咸以为北京失守宣统驾崩，粤督张鸣岐挂印逃往香港，水师提督李准被迫宣布独立，各县次第响应，广东全省宣告光复。同一个李准，在8个月前率部血腥镇压黄花岗起义，还亲自鞠讯林觉民等烈士；忽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不能不归功于黄世仲的心理战、宣传战攻势奏效。广州兵不血刃反正，大大减少了军民同胞的伤亡以及财物损失。

指挥敢死军光复广州

黄世仲是文武双全的革命者。1901年，他由尤列介绍，在吉隆坡加入兴中会分支机构中和堂。1905年10月，中山先生乘法轮赴越南西贡，舟过香港，冯自由偕陈少白、黄世仲等人登轮晋谒，即由中山先生主持同盟会宣誓式，令陈、黄等一一举手加盟，众举陈少白为会长，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香港分会向例须兼理西南各省之军务常务及南洋美洲各地之交通事务，故分会会长一职极为重要。

1906年冯自由继任分会会长,黄世仲复被选为庶务员,于会党运动及文字宣传,至为尽力。按同盟会会章规定:“庶务部职权最重要,总理他适时,以庶务总干事代行一切。”1907年所发难诸役,如潮州黄冈之役、七女湖之役、防城钦州之役、镇南关之役,除防城义师是中山先生亲自策动外,余皆由香港同盟会直接指挥。1908年改选,黄续任庶务,钦廉河口诸役失利之革命党人,多由越南政府驱逐出境,其流亡至香港诸义士均分驻中国日报社或各招待所,各该舟车旅费给养抚恤招待事宜均由黄世仲参与办理。早在1904年,湖南哥老会首领秦力山至港,寓中国日报社,日与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谋,欲运动驻粤湘籍防军反正,尝往来广州三次。是年12月秦被清提督李准派兵搜索,狼狈逃港。翌年春,秦氏由世仲介绍,到新加坡投奔反清志士陈楚楠。所以,港人有志者,日至报社探候萍沚诸役捷音,门庭若市,世仲也随之积累了不少写作素材。1909年同盟会增设南方支部,承办西南各省之党务军务。1911年5月18日,即黄花岗起义的7周后,黄世仲便在广州《南越报》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五日风声》,对此役作了全方位的描述,盖因他是起义的直接策划者和参加者,失败后又冒险留在广州观察事态变化,就具有别人所不能替代的身临目睹的有利条件,使作品更加真实感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杭州、广西、安庆各省市纷起响应。广东因7次起义失利,革命党人斫丧过度,故迟迟未能发难。在会党中颇具人望的黄世仲遂奉命潜入广州设立机关,以同盟会南方支部联络员名义运动起义。1911年10月下旬,昭字营民军首领胡汉贤率领广九筑路工人与东莞石龙巡防营防军300余人,与谭瀛率领的惠州工人、增城农民等会合,至11月初已有千余人。胡、谭二人混入省城,向同盟会指挥机关报到,由黄世仲协调将两支民军合并为瀛字敢死军,而黄世仲实际担任了攻城之役的前敌指挥官。

陈炯明罗织罪名冤杀黄世仲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褒许状给同盟会秘密机关《南越报》,而《南越报》

的大量政论、小说都出自黄世仲之手,故孙中山表彰《南越报》,实际上是肯定了黄世仲的功绩。

11月12日,广东军政府成立。胡汉民、陈炯明出任正副都督,黄世仲任都督府秘书长。朱执信、廖仲恺、黄世仲、姚雨平、陈少白等十余人组成枢密处。12月14日,黄世仲以与各民军首领向多意气相投,被胡汉民委任,接替刘永福为民团总长。1912年1月3日,胡汉民调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暂代理广东都督,“锐意发展本身势力”,一面透过军政司加强其所属循军装备,复对各地民军拉拢分化。南北和议将成,陈炯明即拟定裁编民军计划,召开裁军会议。在会上,黄世仲与部分民军将领认为此项裁军计划,目的是编自己而裁他人,有欠公允,因而反对甚力。陈炯明遂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异己之民军。民元三月间,有人向陈炯明告密,谓黄世仲已向香港某日本洋行以低价购得村田式步枪约万支,已秘密起运来穗,将用以武装王和顺、杨万夫、石锦泉等部民军云云。陈炯明遂派兵诱捕石,解送督府后未经审讯由卫队执行枪决。是时陈炯明已决定先发制人,一面以图谋不轨罪名扣留黄世仲,先行枪决后发布告;一面派兵分别包围市区与近郊之王和顺部惠军,经激烈战斗后加以解决。据冯自由回忆:“壬子春三月南北统一告成,胡汉民随孙总理返粤,都督陈炯明弃职他适,濒行署一军令曰:‘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签后置于公案上,留交新任执行。胡汉民就职后,遂如陈令行之,闻者多为呼冤不置。”据黄世仲侄黄鉴泉回忆:“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外出视察之机,罗织罪名,把黄世仲逮捕。陈炯明深知孙中山与黄世仲关系非同一般,一时也不敢贸然下手杀害,只是将黄软禁,后来他听到孙中山即将回穗才假手部下用小轿将黄世仲抬到观音山秘密枪杀。”事后黄伯耀回忆说:“在逮捕黄的前一个晚上,陈炯明还到黄家饮茶谈心,其实是窥测黄是否得到消息。”

黄被扣押后,陈少白、汪精卫、黄兴等纷纷营救,汪、黄两人用电报向广州陈炯明询问黄世仲所犯何罪,陈炯明回说无什么事,计数而已。黄被害后,挚友陈邹卿去都督府找陈炯明问死因,破口大骂。胡汉民说人已死了,过后追封回就了啰!所以陈少白说:“世仲宣劳革命有年,功大罪小,

陈炯明入党日浅,或不知其过去历史;胡汉民岂无不知,就职时应即移交法院依律审讯以昭公允。倘情罪确实,亦当计功减罪,未可置诸重典,任汉民竟甘认陈炯明之刽子手不辞,殊不可解!”

胡汉民公报私仇剪除异己

10年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晚年又投靠帝国主义阻挠革命军北伐。这证明陈炯明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23年1月,滇桂联军攻占省城,陈炯明逃往惠州。孙中山回师广州后,谢英伯、高剑父等曾呈请国民政府为黄世仲昭雪并立碑纪念,终因政局多变而不果。

1912年2月,陈炯明曾向南京政府电荐黄世仲任广东都督以自代,后又设立军团协会任命黄任副会长,旨在笼络黄世仲统揽军权以与孙中山、胡汉民抗衡。然而黄同情民军,为被残酷消灭的惠军仗义执言,遂激怒了陈炯明,加上黄曾电请中和堂首领尤列回粤主持大计,陈逆遂下了杀机。

胡汉民忌恨黄世仲早在10年前洪全福、谢纘泰广州起义失败之时,广州《岭海报》记者胡衍鸢著论辱骂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黄在《中国日报》著论痛斥,双方交战月余。衍鸢是胡汉民兄,弟兄情深,故黄氏积怨于胡氏。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氏在《五日风声》中指责胡汉民弟胡毅生临阵脱逃以致功败垂成(副总指挥赵声事后建言按军纪处死胡毅生,旋被胡汉民毒毙),故黄世仲再度得罪胡氏兄弟。南北和谈时,孙中山起初反对议和,黄世仲与孙眉力主直捣幽燕,被胡汉民斥为“反动”。胡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曾力劝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以致铸成大错。到他回粤主政,见到陈炯明留下的军令,自知手下无兵,为了安定政局,乃以黄世仲的生命换取实力派陈炯明的合作,并且报了私仇。陈炯明拟就,胡汉民执行的杀黄军令曰: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可是及世仲伏法,身后绝非富有,众疑始解,他死后不名一文,连棺木都是冲口村彭景山送的。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中可见与胡汉民长期共事的蒋介石对胡的评价是:“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减小人之尤者也”,“挑

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破坏党国,阻碍革命”。信然!

岭南大儒罗香林先生说:“伯耀世仲昆仲皆革命宣传政论家、小说家,其鼓吹也,大裨革命宣传,于武昌首义、广东光复、民国肇造有文字之功。世仲且尝躬督民军以光复穗垣,联络会党,统抚广东光复后之四方民军有功,于中国、香港文化有贤劳。民元5月,世仲竟横死于胡汉民先生复任粤督后数日。呜呼!黄氏不亡于光复粤垣之阵,竟死于同志之口,可谓不幸之至,其寔当待于后考之。其小说之撰,实为广东学术文化发展之里程,香港文学新型态发展与之关系,至钜且大,而其置之全国,堪称名家,足以媲美吴趼人,斯亦中国文学史上之盛事。”

近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香港作家

近20年来,大陆各省黄世仲小说已达7种24个版本,收录黄世仲事迹的各类丛书、评论集、文学史、史料集、地方史、新闻史、辞典、百科全书、人物词典共有31种;黄著《五日风声》中《攻占督署》一章已被收入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1999年,黄世仲后裔在广州市芳村区西塱乡兴建了黄世仲纪念馆。在黄世仲旅居8年的香港,官方的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也于1998、1999两年连续拨款近40万元,编纂了60万言的《黄世仲大传》,重印了80万字的黄氏昆仲编著之清末《中外小说林》旬刊。1999年8月,在香港官方拨款的香港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确认黄世仲是百年来香港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者。2000年11月,香港唯一已上网的文学刊物《香港笔荟》聘请海内外38位文史教授为20世纪香港小说排名次,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在经典名著百强中夺魁。2001年8月24—25日香港大学中文系与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计有美、加、新加坡、台湾、大陆文史专家学者200余人,宣讲论文52篇,出版论文集两辑,计80万言。

(作者为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第三届文学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 庄建平)

国民政府女官刘曼卿单骑赴藏

● 田 文

上个世纪的前期,民国建立以来,祖国的西南边陲动荡不已,藏汉纷争不断,川边战事时起。英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就在这多事之秋,却有一位奇女子,挺身而出,勇闯雪域,代表中央政府赴藏联络沟通,她就是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刘曼卿。后来,刘曼卿将自己从1929年7月到1930年7月这一年的传奇经历,写成6万字的《康藏轺征》一书。本文所引述的史实大多出自此书。

刘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名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秘书,后又任九世班禅秘书。刘曼卿从小生活在民族联姻家庭,故娴熟汉藏两种语言。1911年秋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拉萨,引发清廷驻藏川军内乱,进而藏汉冲突,英人插手,拉萨陷入动乱时期。1915年,刘曼卿一家避居印度大吉岭,1918年回到祖国,定居北京。12岁的刘曼卿即在市立第一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进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岁时奉父母之命草率成婚,因而夫妻不和,刘曼卿不再回家,专心读书。师范毕业后进道济医院当护士,意图将来能为西藏妇女服务。

1928年的一个机遇,使刘曼卿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这一年,远在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摆脱了亲英倾向,靠向中央,希望和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年底派其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赞前往南京晋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给他们谈话进行翻译的就是刘曼卿。蒋介石对刘曼卿的才干表示赞许,随后她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



刘曼卿

但刘曼卿不满足于政府机关的“走笔应对之事,随班附和而已”,总是向往着西藏故土,愿意为家乡有所贡献。她对当时西藏与中央“隔膜既久”,中央“不暇注意边防,致使英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状况十分担忧,因此主动向文官处文官长古应芬提出:“自愿前往康藏调查现状,记集成册供政府参考。”此时国民政府也关注着西藏形势,因此很快批准了刘曼卿的请求,让她以文官处书记官名义赴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同时派文官处二等书记官孔党江村(藏族)以

“西藏调查员”身份随行。刘曼卿的愿望将要实现,“大喜如狂”,“而亲故则戚戚然若不胜忧”。她北上北平向母亲辞行,母亲更是“哽咽不能成声”。刘曼卿虽“相持饮泣”,仍好言相劝。

终于在1929年7月底,年仅23岁的刘曼卿从南京出发,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8月中到达重庆,又雇轿行至成都。到成都后,她直奔位于署袜街的班禅办公处,见到在此供职的父亲,“相见悲喜杂来,无暇问起居,投怀诉辛苦”。父亲担心女儿“不知量”,完不成使命,又恐遭不测。刘曼卿表示:“政府有意扶绥康、藏,他人辞劳不敢往,我系藏族,宁容推卸,故政府授命,儿顿忘其愚鲁也。至生死之途,原应权其轻重,果掷儿一命而能有益于国,父其谓无代价耶。”刘父“挥泪承吾言,曰去诸,我观其成”。随后刘曼卿又会见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亦表达了“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数供牺牲,某即愿为牺牲之一份,以促社会人士之觉醒。”

8月底,刘曼卿一行抵达已属藏区的康定。在这里她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外祖母,“外祖母欢喜失声,疑自己身在梦寐间。坚持予手,又将予自顶至踵抚摸殆遍。”刘曼卿感叹“一家骨肉,各作劳燕”。离开康定后,翻越折多山,经雅江、理塘,10月底到达藏区名镇巴塘。在巴塘,刘曼卿见到美国人兴办的医院和教堂。数座洋楼,“外备花园、草坪、菜圃、运动场、树林、池沼、养畜园等地,无异一雏形之市镇也”。她感到,“外人对于文化之贡献,亦未可一笔抹煞也。但闻外人常将本地地图及种种机密探报回国,是否存有侵略之野心,诚难言矣。”

11月中,刘曼卿一行从竹笆笼乘皮筏渡过金沙江,即进入了西藏今芒康境界,在此她会见了闻名康藏的富商邦达家族。这时刘曼卿已感觉到了人为的阻碍。清末民初以来,达赖、班禅一直失和,拉萨方面怀疑她为九世班禅的人。“……出都,藏方即有所闻,俟抵蓉,彼等已探报达赖佛爷矣,漏风者或即北平某使馆为之,外人处心积虑,真可畏也。”她在江卡滞留多日,才得到昌都方面的通行证。在藏军卫士“阳为护送,阴实监视”下继续前行。经察雅到昌都的一路上,崇山峻岭,险情迭出。刘曼卿曾数次失足跌下,“自料坠岩决无活命,万里送死,深致唏嘘不已。”孔党

江村“行路不慎,滑跌坠岩,几及于难”。12月中,终于到达藏东重镇昌都。

在昌都,刘曼卿一行仍被阻留。昌都地方总官萨旺晴布虽款待周到,但告谓:“惟子所衔者国家使命,事关重大,能否直到拉萨,吾尚不能自主也。且迺者冰天雪地,女士以一闺秀,虽云有勇可贾,在吾人甚不愿予再冒艰难,予身为总官,有转递应接之权,可否即全权,托予向达赖佛转致。”刘曼卿则“以婉辞动之”,“乃云内地与西藏,为姊妹为兄弟,断不能离散,以前姊妹兄弟相失,各号泣走觅,今既有相亲相见之机会,彼此何可狐疑;……目下内地未始不可出强力以制边民,总以此为自伤和气之举,抑而不行,故进而遣使与西藏通好,使知中央德意。君为西藏望人,智识超于侪辈,即达赖不允,君且力争之,安可从中阻挠,苟因此汉、藏亲善失败,子能辞其咎否。彼答以容作熟思,盖已动其心矣。”这样等到1930年的1月7日,刘曼卿获悉达赖的有关批示已到昌都,仍有拖延之意,于是收拾行装,作将返回状。昌都地方官员恐怕“将开罪于中央,而受责于达赖”,结果表示“将负罪纵君去,一切祸难自当之”。刘曼卿一行又上路了。

这时,时值隆冬,翻山越岭,愈加艰险。跨越夏供拉山时,“逾山崖,见冻死人畜数具半没雪中,而大风过耳,如虎啸龙吟,雪花击面不啻针刺刀割。”上山时,“以长绳系予腰,两人前曳,两人后推,分寸前移,卒至山顶。”下山时,“从者乃脱大皮衣以革覆地,嘱予坐毛丛中,于四隅结绳,后提而前牵之,顺势而下。”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刘曼卿一行终于在2月初到达了拉萨。他们受到夏素代本的接见,并且招待周到。但是由于亲英分子的种种阻挠,迟迟未能会见达赖喇嘛。刘曼卿并未消极坐等,而是广泛接触上层官员和各界人士,扩大影响,还对西藏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终于在3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会见了刘曼卿。刘曼卿以藏语同达赖喇嘛交谈,又用藏文写出祝福字语,达赖喇嘛面带微笑,破例为这位国民政府女官员摩顶。当达赖喇嘛得知她确实出生在拉萨时,更是十分高兴。刘曼卿向达赖喇嘛说明了自己的使命,介绍了内地政局的变化,转达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关怀,“姑无论西藏之

诚否受英人挟制,要不能让其久立于整个的中国团体之外,甚愿得一机会使大家互相了解,仍和好为兄弟如初,顷之此来,出万死一生,亦思以汉、藏人之两重资格。从中为之引线贯穿,尚望佛爷顾念大局,体惜愚忱,赐以明白之答复。”达赖喇嘛深有感触,但表示“惟此时时不我许,容后当再详细见告”。

会见达赖喇嘛后,刘曼卿又先后会见了西藏噶厦曾权倾一时后因亲英而失势的察绒·达桑占堆嘎伦和其他三位嘎伦,达赖喇嘛的侄子、司伦朗敦·贡嘎旺秋,藏军总司令龙夏等政界要人。还在察绒宅第见到了刚到拉萨不久的雍和宫堪布、负有中央使命的国民政府“赴藏慰问专员”贡觉仲尼。贡觉仲尼在拉萨受到热烈欢迎,他问候刘曼卿,并说:“同做一家事,当效一家人,此后遇有事故可随时就商。”针对拉萨的一些谣传,贡觉仲尼公开表示知道刘曼卿的使命,“临行时曾遇古文官长嘱为照拂”。

刘曼卿等待了一个多月,一直未得到噶厦关于再次会见达赖喇嘛的回复。这期间她一方面继续探访西藏经济与社会状况,一方面果断向噶厦提出:如果5月25日前不能领回公文,将只身离藏,并请致意达赖喇嘛,“吾以藏人之立场,无论西藏地方官府待我如何,予回内地绝不作挑拨非毁之辞,只望我西藏同胞早日觉醒耳。”结果在5月25日,刘曼卿前往罗布林卡再次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首先表示,你的好意我早已领会,我不背中央此前已说过。让你久等了,实在是因为你远道劳顿,要好好休养,才能返回。并嘱咐刘曼卿回寓所把他的这次谈话记录下来,以免遗忘。接着缓缓而言:“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能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在谈到康藏形势时,达赖喇嘛说:“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人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说到对英国的态度时,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

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尤其是英国统治下印度的状况让他震动,“言时态度异常沉重”,“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渠不愿印度受英人之压榨,谅自己亦无人瓮之念。”最后达赖喇嘛答应将派代表去中央,并希望中央能援助西藏有关纺织、制革方面的设备和技术工人。这次会见,“计谈至四五小时之久”。

次日始,刘曼卿向各大臣一一告辞,于5月27日——达赖喇嘛为她选定的吉日踏上归程。此后经浪卡子、江孜、亚东等地于6月中进入锡金和印度。6月底,在加尔各答受到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卢春芳的欢迎,然后乘海轮返回,于7月25日到达上海。两天后,刘曼卿到南京,向行政院文官处古应芬文官长报到,呈交达赖喇嘛的复函及礼物,“详述经过,蒙大嘉奖”。此后她又在国务会议上作了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正廷、钮永健等国民政府要人均到场。“内中尤以谭、戴两公问藏事特详,谈话逾九十分钟皆不以为倦,继以报告书一卷进,传阅后以重要文件性质珍纳之。”不久国民政府向刘曼卿颁发了褒奖状,称:“国民政



十三世达赖喇嘛

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驰驱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义,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24岁的刘曼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商务印书馆、《申报》等举行欢迎会;胡汉民、王正廷在国际新闻社设宴为她洗尘;蒋介石、林森、于右任等为她后来出版的《康藏轺征》一书题词,孙科写序。面对一片赞誉之声,刘曼卿保持了清醒,她在《康藏轺征》中最后写道:“而中外报纸腾载女杰刘某云云,致予无所措手足,唯有以全副热忱,望国民、望女界共谋国家福利而已。”

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曼卿继续为国家、为民族效力。1930年,刘曼卿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以期唤起国人关心祖国边疆的安全和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曼卿等一批在南京的康藏人士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通过关于抗日救国的六项决议和《告全国同胞书》。1932年5月,鉴于第二次康藏冲突已有时日,国民政府批准刘曼卿的申请,委任她以“西康调查专员”再次赴康藏地区。由于战火阻隔,她滞留滇西北地区,但仍托人将中央官员致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带到拉萨,同时将获得的康藏方面情况报告中央,并且还就地在滇西北一带进行调查。不久达赖喇嘛派员来见刘曼卿,带来复信,信中说:“汝上次为汉藏亲善,远来拉萨,备受辛苦。回京以后,又常为西藏襄助一切,殊堪嘉慰。此次不幸在康,又发生战事,余深为惋惜。但纠纷症结所在及衅由何开,想汝已明

了,回南京可将是非真相报告。至你重来拉萨一节,现因沿途战事未息,诸多不便,俟将来战事平定时,再欢迎来藏。兹派排长丁曾等前来相晤,一切均可嘱该员转达,所有带来信件各物统交该员带回藏可也。”由此看出,此次刘曼卿虽未能亲赴拉萨,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1937年11月,刘曼卿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出任团长,在康藏地区开展团结抗敌、共赴国难的宣传。1938年夏,刘曼卿又与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藏族知名人士发起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在藏区募捐一批金银首饰,赴重庆献给国家。1938年11月,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分两路进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一路走滇藏线,刘曼卿另一路则经缅甸、印度于1939年2月到达拉萨。宣传团在拉萨向上层人士、宗教界和普通民众宣讲内地全民抗战形势,驳斥敌伪谎言,并发放藏文宣传品,放映有关电影,收到很好效果。宣传团6月初离开拉萨前,一些群众捐献一百多匹氍毹呢,以慰问前线将士。而各大寺庙僧众则自动诵经,祈祷中国军队胜利。

然而,刘曼卿没有能续写自己的辉煌。1941年,年仅35岁的她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刘曼卿短暂的一生犹如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在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史和妇女史上留下了闪亮的一笔。她兼具汉藏民族的优秀品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怀念她。(责任编辑 庄建平)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2002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通告

本刊编辑部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现已全部售完,特此告知,请勿再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电话:(010)68532048 邮编:100045

刑讯逼供与封建主义“草民意识”

● 江仁宝

刑讯逼供是长期困扰公安司法机关执法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地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作了许多决定,下发过若干文件,从加强公安司法干警队伍建设、法制建设等不同方面入手,千方百计遏制、减少、消除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刑讯逼供问题的彻底消除,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还需警钟常鸣,长抓不懈才能奏效。

目前,在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时有发生,请看几例。

2001年10月13日凌晨,安徽阜阳市颖泉公安分局驻苏屯乡工作组抓获涉嫌盗窃犯罪的梅玉宽。凌晨4点多钟,梅被带到该局四楼一中队办公室,被铐在办公室的铁环上,由取证组副组长张力及成员徐强、张绍亮、曹建勋等4人轮流看管审讯。在审讯期间,张力等4人对梅刑讯逼供,甚至强迫其他犯罪嫌疑人与梅对打。第二天,梅被送入界首市看守所关押。19日上午,界首市检察院监所科干警巡视监房时,发现梅双眼青紫,于是将他提出查看,发现梅两腿及脚面红肿,背部也有伤。据界首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三家法医联合对梅进行的法医鉴定表明:梅的软组织损伤占体表面积26%以上,属轻伤;肝右叶损伤、脾挫伤,属轻伤;急性肾功能衰竭,属重伤。到24日晚,梅因呼吸困难,危及生命,转院抢救。经过调查,殴打梅的关键证据——两根木椅撑被查获;颖泉分局内部对张绍亮、曹建勋、张力、徐强涉嫌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也被记录在案(参见2002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执法犯法法不容》)。

1995年5月7日晨,河南省尉氏县南曹乡朱坡村农民朱新军家的手扶拖拉机被盗,当天上午失主到南曹公安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副所长王

保堂带领两名联防人员到朱坡村调查,当了解到失主家欠同村村民朱旺坡家几百元钱一直未还,朱旺坡曾对失主家的人说过“如果再不还钱,要弄他家的车”……据此,王保堂等人认为朱旺坡有偷车的较大嫌疑。过了几天,将朱旺坡带到派出所,刑讯时将朱双手反铐在木椅上开始刑讯。先后用电警棍电击,用扫把、胶棒等殴打,见无效果,又用手摇电话机“过电”。朱旺坡受刑不过,只求放了他,“叫说啥就说啥”,按照办案人员意图承认了盗窃手扶拖拉机的“犯罪事实”。此时,王保堂等人觉得一个人不能将一台拖拉机盗走,便追问同伙,朱出于无奈,随口说了本村村民朱连生,朱连生便成了“共犯”。当晚,在派出所对朱连生进行突审,联防队员对其轮番殴打,并说:“朱旺坡已经承认偷车,你不承认不行!”朱连生怕皮肉之苦,也承认了,并供出车在何处,但因找不到车,又把朱连生大、小拇指接上电话线,用“过电”方法搞刑讯逼供。朱又说了车在哪里藏着,但仍查无事实,又决定动“大刑”,将朱反绑双臂,吊在墙上,进行长时间拷问。朱痛不欲生,只求一死,编出了“拖拉机卖给别人,所得钱自己花了”这一口供,才停止用刑。朱连生受重伤,失去知觉,在医院共花费1000多元,让朱坡村报销。尉氏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没有对证据做进一步深入调查,就认定朱连生等二人盗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提起公诉。尉氏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未经查证,即行审理。早已吓破胆的朱连生不敢辩解,满口称是;朱旺坡和他的律师则完全推翻原来的供述。但被告人的辩解没有引起法官的重视,认为二人认罪态度不好,分别以盗窃罪判处朱连生、朱旺坡有期徒刑。1996年5月,开封中级法院二审中没有对上诉理由、被告口供、证人证言、赃物去向等问题进行深入调

查复核,一错再错。1996年10月,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团伙盗窃案,交待了盗窃尉氏县南曹乡朱坡村朱新军家手扶拖拉机的事实,并通知南曹派出所和失主去领车。王保堂知道后未向上级报告,致使朱连生二人一直在监狱关押。最后朱连生两家到处借钱,赴省进京上访告状,终于在1999年2月得到平反昭雪。至此,二人已无辜关押3年8个月零17天。(参见《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7期《刑讯逼供害人害己》)

1998年12月7日,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对南京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健涉嫌“辩护人妨碍作证”案作出一审判决。刘健披露了在滨海县羁押期间遭刑讯逼供作出虚假供述的情况。刘健说:由于我在李政案的辩护中当庭揭露县检察院刑讯逼供、对证人非法取证的事实,他们就实施对我报复。而他们所有指控我涉嫌“辩护人妨碍作证”案的“犯罪事实”都是虚假的。我之所以在一审中全部承认了检察院的指控,是因为在侦查期间我受到了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在审查起诉期间受到了检察人员的威胁和欺骗。1998年7月20日中午,侦查人员再次提审我,让我交待问题,见我交待不出什么,便叫我站在房间墙角,脚尖抵墙,然后在我身后放一张写字台,把我圈在里面,并说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出来,……实在受不了便用头抵着墙,他们见后就拍打我的头。就这样到21日上午,我仍交待不出什么,他们便在房间内让蹲马步,我说不行,便让我坐地上,要求两腿伸直,上身与地面垂直。因为累了打盹,他们就揪我头发,要么就重拳击我腰间脊椎,始终不让我闭眼。就这样折磨到22日下午5时被逮捕。……22日晚上侦查员又提审我,大声训斥,让我两腿伸直,上身向后仰,身体呈135度,我支撑不住,公安人员就抓我头发往后或往上拉,疼痛难忍。他们见我讲不出什么,就在我身后一手抓住头发,另一手扇我耳光,两手换着打,打得头晕眼花鼻出血,还用脚踢我腰,边打边威胁说:“公安局没有不打人的。我们打你让你讲真话不是刑讯逼供”,“我打了你,你到哪儿去告都没有用,你没有证据”等等。几天下来,我在精神上近乎崩溃,看架势不按他们要求讲,他们是不放过我的。后来,公安局两个负责人又来训斥我说:“你今天非得讲,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十遍,十遍不

行一百遍,直到我们满意为止。”在此情况下我答应交待问题,按侦查员的提示作了一份虚假的供述。8月份的一天,省检察院纪检部门的两位同志提审我了解情况,我当时迫切希望省检察院能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就向他们讲述了事实经过及我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无任何结果。……过了几天,县检察院检察长和检察员提审我,问寒问暖,一副表示关心样子,对我讲,我现在不承认没有关系,就凭我在公安机关的那份供述材料就能定我的罪,说我唯一的出路是争取个好态度,从轻处理。几天后,检察长又几次提审我,要我不改变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虚假供述。还说,他们公、检、法已开过碰头会,对我的问题已形成一致意见,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又说,检察院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建议处缓刑,但公安局不同意,认为我态度不好,所以叫我态度要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同意按检察长的要求做。……不再翻供,只求能判个缓刑,早日出狱。(参见《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19期《刘健有话要说》)。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虽然法律明令禁止,但为什么公安司法机关干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仍时有刑讯逼供现象发生呢?人们分析了种种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首先是一些领导干部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二是部分公安司法干警缺乏政治素养和法律意识,不懂得运用诉讼程序的科学原理来查明案件事实,因此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常常束手无策,以致失去理智,诉诸拳脚、棍棒等;三是有些公安司法干警沾染上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习气,囿于坐堂问案的陋习,仍把口供看成是最好的证据,没有摆脱旧的公安司法作风的影响;四是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和“左”的流毒仍在起作用,少数干警往往把刑讯逼供看成是单纯的工作作风、方法问题,是“好心办了错事”,因而常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制裁,甚至不给任何制裁,使得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笔者认为,以上所述仅是一般的原因分析,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根

本原因还是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中的“草民意识”。

据历史记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纠问式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已合法化和制度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法里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刑讯逼供一直被用作获得口供和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刑讯(又称“拷掠”、“拷讯”)长期被披上“合法化”的外衣,成为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根据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又称《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刑讯在秦代已成为法定的必经程序。《唐律疏议》“断狱”篇则对刑讯的适用条件、立案程序、工具、适用对象、具体程式和顺序等作出了详尽明确的规定。将刑讯作为合法的手段,是建立在重口供、轻人权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较为重视口供。司法官员在收集到一定的物证、书证、证言后,必须获得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供认,才能最终定案。没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司法官员一般不会直接定案。所以,当被告人不供罪时,就只有依靠刑讯逼供了。这充分反映了古代刑事诉讼制度极其不科学的方面;同时,最根本的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者视人民为“草民”、“草芥”,不尊重被追诉者乃至证人、被害人的基本人权,而把所有参与诉讼活动的民众均视为可以认定案情、惩治犯罪的工具。正因如此,封建社会的刑讯逼供不仅适用于犯人,而且适用于证人等,这又体现了封建社会诉讼制度的残酷野蛮。正是由于这种“草民意识”或“草芥意识”的阴影根深蒂固,所以滋生出了现代社会中的刑讯逼供这个封建专制的毒瘤。

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小平同志这个重

要指示,对全党、全国,尤其对消除公安司法部门执法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糟粕文化,不仅为封建统治者强制推行,而且通过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淀于中国的普遍人格之中,凝聚为一种“国民意识”。这些糟粕文化在我国文化学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即儒家的“礼”是以轻视人的价值,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为能事的。“礼”的内容以等级家族关系为特征,它最集中的表现是维护忠孝的“三纲五常”,其作用当然是维护封建的大一统天下。“礼”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强调必须以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强调人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而忽视人应有的权利。它只承认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而根本否认个人可以独立于这种人伦关系之外,个人永远只能是被证明、被规定、被定义的对象。“礼”将人的主体性融化在贵贱有别、尊卑有别的“名分”之中,在“礼”的统治下,人被塑造成名分系列,唯独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因为属于他自己个性的东西,已经被当成“人欲”而由“天理”彻底吞噬了。封建主义制度下的高压、专制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必然派生出无视个人存在价值、无视个性、无视自我的社会意识,即所谓“草民意识”。这种“草民意识”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则是“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须以法数制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从国家意志的高度,公开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人的价值观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君主为首的各级官吏自我意识的恶性膨胀,自认为具有非常的存在价值,负有管教“草民”的“天命”,为所欲为。反映在法律上,则是无视人权的严刑峻法,以及“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诉讼制度。另一个是,对充当权利客体的“草民”视同草芥,毫无价值,似乎“草民”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被“管”、被“罚”而已。因此,劳动人民处于被支配、剥削、欺诈、奴役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被推翻,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封建意识的残余并未随之彻底消除,恰像腐烂着的尸体那样时而散发着阵阵臭气。历史唯物主义

告诉我们,社会意识既派生于社会存在,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继承性、落后性等特性。在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沉淀尤其深厚,专制积习非常浓重,而民主思想意识却相对十分淡薄。正因为“草民意识”的潜在影响,一方面使得我们某些公安司法干警至今仍存在着浓厚的特权思想,其中不少思想作风公正、清廉的干警也仍然停留在当一名“清官”,以及属于“为民作主”这种思想境界上;而另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也具有希望政府的公务员都是“清官”,都能“为民作主”这样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因为这总比那些贪官、赃官、昏官、不为民作主的官、甚至以权谋私的官,不知要强多少倍。于是,这在某些公安司法干警的头脑中,无形地又增长了高人一等的思想,而淡化了人民公仆的思想意识。这种“为民作主”的思想,仍然把自己摆在“父母官”和“管教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权位置上。这种思想,不仅决定着他们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易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只愿“坐堂”办案,听信口供,不想走群众路线,更懒于做艰苦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简单粗暴,急躁草率,无所顾忌,导致一个个刑讯逼供事件的最终酿成。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背离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宪法和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刑讯逼供之所以长期存在而难以根治,还因为它没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有力的抵制。封建制度下的高压、专制和封闭的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人们思想深处自私、怯懦、满足和忍让的文化心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和“好汉不吃眼前亏”等信条至今仍在支配着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刑讯逼供搞到自己头上,宁肯咬紧牙关忍着,以免招来更大的祸端,即所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如果搞到别人头上,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视而不见,绕着走。在这种文化意识的长期影响下,一部分人形成了与世无争、与人无患的思想意识。这种“清静无为”、“清静自足”的思想意识环境,在现实社会里便成了滋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最好温床。

总之,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与宪法、法律效果的圆满实现,是与社会文化思想素质、道德

素养紧密相联的。如果还有一些人无视宪法和法律,像“文革”中的“四人帮”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肆意玩弄践踏法律,而另一些无端受屈的人们,都仅仅满足于辩诬的成功或胜诉,所谓讨回了公道就满足,那么,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无视人的尊严的封建文化心理,侵犯人权的行为就永远难以得到根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刑讯逼供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一种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里,刑讯逼供则是封建传统文化心理影响或者说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结果。因此,根治刑讯逼供的问题,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才能彻底解决。不这样做,而仅仅从公安司法干警的思想作风、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入手,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目的、也根治不了刑讯逼供这个顽症的。目前,我们对消除刑讯逼供在法律制度上已有了可靠保障,但是笔者认为,要彻底根治并消除刑讯逼供,最重要的还是正本清源,从人的思想意识上找根源。因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要抓住一个时期的刑讯逼供典型案例或事件,相对集中一段时间,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深入开展以批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整顿,这个整顿又必须严格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原则进行,他说:“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整顿的重点也应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主要是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劳教所,以及公安、检察的侦查预审部门等。通过教育整顿,让广大干警明白,禁止刑讯

逼供不是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思想余毒、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更加准确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等方面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安司法干警素质和办案能力、维护公安司法机关形象、威望,密切警民、党群关系的需要。第二,要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现代化文化素质,尤其是政治思想素质、法律意识,充分运用全民普法宣传教育的有利时

机,有针对性地安排宣传教育内容,进一步使我们的人民群众深刻认识我国法律的性质,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即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对国家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敢于和善于实施有效的监督。只有人民群众的自觉性起来了,监督力度加大了,落实了,刑讯逼供这类封建主义毒瘤才有可能得以根治和消除。(作者是山东省司法厅原厅长)

(责任编辑 程 度)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李锐论说文选	李 锐	28.00	4.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方 实 杨兆麟	25.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 晓 丁 东 徐友渔	26.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老三届朝歌——尘劫	丁小禾	22.8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我向总理说实话》本书作者自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改革的全过程。他于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如实反映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等状况。此信引起中央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曾赴监利县调查。书中不仅记述了这段经历与感受,还对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滕代远受命组建军委铁道部

廖诗权 张宏一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中央军委命令四野迅速入关,包围平津;二野、三野分进淮海,开始了平津、淮海战役。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党中央正运筹着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为保证这一决策的实施,发出电令,决定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接着,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周副主席指出: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的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你要努力学习,向人民群众请教。滕代远接受了新任务后,虽对多年的军队工作有些留恋不舍,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担子不轻,从头学习,下定决心,把铁路工作搞好,只要党需要,我愿做一辈子铁路工作。

从此,滕代远虽然身在军区,可他在思想上已在往铁路上转弯子了,开始注意接触铁路上的人和事了。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他急赴石家庄会晤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武竞天。滕代远和武竞天早就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武竞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武竞天是中央局秘书长。现在两人又走到一起,自然感到十分亲切。武竞天向滕代远汇报华北铁路情况,并召集秘书们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收集资料,协助武竞天陪同滕代远调查研究,视察铁路站段情况。滕代远在华北视察一周,拟好向军委汇报的提纲,前往西柏坡,向军委汇

报召开铁路工作会议筹备事宜和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初步意见。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来了,朱总司令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了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从今天开始军委铁道部成立,他要当你们的部长,接管各解放区的铁路工作,要指挥几十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二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8日滕代远率领先行人员,由石家庄向北平进发。出发前滕代远嘱咐随行人员:“我们是军委铁道部赴北平的先遣人员,是代表人民解放军去接管铁路的,要表现出胜利之师的姿态,衣着要整洁,汽车要擦得干干净净,咱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代表解放军的。”

车队沿着残旧的公路颠簸着北进。有很多地段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滕代远沿途很注意观察铁路的破坏情况。石家庄至高碑店段,钢轨枕木没有一根,道床满是疮疤,站段一片瓦砾,机车车辆体无完肤,线路两侧到处是壕沟。滕代远看了感叹地说:“过去是我们领导军民破坏了它,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立了大功;现在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赶快把长江以北的铁路主干线修通,完成党的重托。”

滕代远的车队走走停停,140公里的路程,走了5个多小时,黄昏时分才到达保定河北第二师范学校接待站宿营。

2月9日车队继续北上,从高碑店至北平的铁路比较完整了,公路也比较平坦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长辛店。滕代远指着铁路两侧高大的厂房说:“这就是铁路大厂,是‘二七’铁路工人反帝反封建大罢工的发源地之一。我们进城搞铁

路建设,必须牢牢依靠工人阶级。”车队从永定门进城,前门城楼高高地耸立着,高大的城墙向东西延伸。滕代远望着雄伟壮丽的城楼和城墙感慨地说:“八百年的古都,上千年的文化名城,终于为人民所有了。”

1949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挂牌办公。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它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

三

中央考虑到滕代远虽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与彭德怀共同领导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党代表、红三军团政委,在抗日战争中曾任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晋冀鲁豫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但对铁路工作毕竟是新手,还需要熟悉铁路业务的左膀右臂为他的全面领导分担重任。1949年2月21日中央批准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临时委员会,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组成常委会,滕代远为书记。中央军委同时任命吕正操、武竞天为铁道部副部长,至此,中央军委铁道部领导核心组建完毕。

铁道部领导分工是:滕代远主持全面工作,吕正操分工全路运输指挥和铁路的修建,武竞天分工物资供应、生活保障和思想政治工作。三位一体,集中领导。

吕正操是铁道部“左膀”指挥官。他曾是张学良旧部,追求真理,倾向革命,1937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奔赴冀中,创立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吕率领部队进驻沈阳,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在中央军委铁道部成立前,他在东北主要负责铁路修复

和运输工作。他把我党治军的办法灵活运用到铁路建设中去,把被破坏成千疮百孔的东北铁路治理得井井有条,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写的《怎样办好铁路》一文得到毛主席的夸奖:“你写的文章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如何搞建设。”

武竞天是军委铁道部的“右臂”。他1926年入党,曾从事地下工作,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过。解放战争爆发后,武受党的委派到华北,在刘、邓的支持下,组成裕通运输总公司,为我军南征北战的后勤保障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领导组织军民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修通了多条公路,而且还只用十个月就修建了103公里的邯(郸)涉(县)铁路,保证了太行山区生产的军火迅速运到前线。

人们常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旧铁路规章制度各有一套,行车调度不统一,客货列车不直通,各行其事,弊端甚多,运输效率极低。要改革旧铁路,在当时只有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

滕代远首先率领铁道部一批领导干部到学习苏联经验有成效的东北铁路考察,把学到的苏联经验,结合我国铁路存在的问题,由吕正操、武竞天按分工,分别召开会议,分别制定和实施了全国铁路统一的运输调度指挥、客货规章、运价、



1949年军委铁道部三位领导人滕代远(中)、吕正操(右)、武竞天

铁路财务规章制度,并且制定了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滕代远特别赞赏吕正操在东北铁路总结并广泛推行的“负责制”经验和管理铁路的方法。吕正操特别善于发现苗头,树立典型。在1949年6月军委铁道部召开的全国机务工作会议上,根据滕代远的提议,树立了东北铁路培育出来的“毛泽东号”、“八八四号”和“铁牛号”机车组,为机车乘务员负责制的三面旗帜。

铁道部领导常常教导职工,铁路是一部大机器,车、机、工、电等部门是一个个大部件,各个岗位上的人是零件,零件一出问题,机器就立刻停止运转。铁路上出事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万疏忽不得。推行“负责制”的做法,不仅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也有效地减少了行车事故,保证了列车运行的安全和正点。

四

滕代远等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人们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印象极深,终身不忘。

1949年秋,帮助我们在江南抢修铁路的苏联铁路专家巴格列夫少将,应邀来京参加开国庆典。但到北京站下车后无人去接站,北京饭店的翻译问清原由后接到了北京饭店住下。滕代远本来计划让他住专家招待所,当晚会见他。哪知指派的领导未去接站,只派了一位司机,误接了一位女性宾客,送到了北京饭店。滕代远得知此情况后,极为恼火。他叫通知有关失职干部到他办公室来。滕代远严肃地说:“人家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抢修铁路的英雄,不远万里志愿帮我们修路,是我们请来的功臣,你们就这样的不负责任。”那位失职干部却有些满不在乎,这时滕代远的火气更大了,拍得桌子震响。当天,滕代远亲自到北京饭店向巴格列夫少将致意,并陪同他到专家招待所住下,共进晚餐。第二天,滕还指派专人陪同巴格列夫少将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北京名胜,送了他爱喝的沃特加名酒。

滕代远进城后由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血压一度高到240/120,周副主席非常关心和体贴他。他身体稍好就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亲自到门口去接,还亲切地问:“病好些了吗?”并对警卫员说:“你去玩儿吧,把你们

首长交给我啦。”汇报完后,周副主席又送到门口,再三嘱咐:“你血压高,要注意多休息,可别累坏了身子。”

滕代远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不论暑夏寒冬,还是久病体虚,都常下基层调查研究。滕常说:“基层的批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在出差中,他们一般都吃住在公务车上,从不游山玩水。伏天出差到重庆、武汉,气温常在40摄氏度以上,闷热难熬。市委领导劝他们到宾馆去住,他们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们的岗位,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的领导了。

掌权不谋私,他们对自己对干部都是严格要求。滕代远在家务农的大儿子是他离开家乡前出生的,听说父亲当了铁道部长了,来京探亲,要求父亲在京给找个工作。他对儿子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谋取私利,部长更不能例外。”他还劝告儿子:“你家有祖母,又有妻儿,不能把这包袱交给当地政府。家里有困难自己想办法,也不要打我的招牌,给国家找麻烦。”儿子听了父亲的教导,觉得很有道理。父亲陪儿子逛了京城,叙了叙情意,孩子愉快地回家务农了。

军委铁道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机构散落在全国四面八方,而且是集中统一,垂直领导,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滕代远、吕正操除集中掌管全路的大事,参加中央的会议,又得经常下去抢修铁路和指挥军列运输,因此铁道部日常工作就交给了武竞天。

军委铁道部成立初期,武竞天分管人事、教育、财务、材料七、八个业务局,还兼任办公厅主任。事务繁忙,百废待兴,各种制度、条例急待制定。滕代远、吕正操在前方指挥,武竞天在后方保障后勤,筹划资金,积聚铁路器材,调配人力;制定制度,加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被铁道部很多干部职工誉为群众的好领导,干部的贴心人,部长的好助手,铁道部的大管家。

军委铁道部在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统率下,全路职工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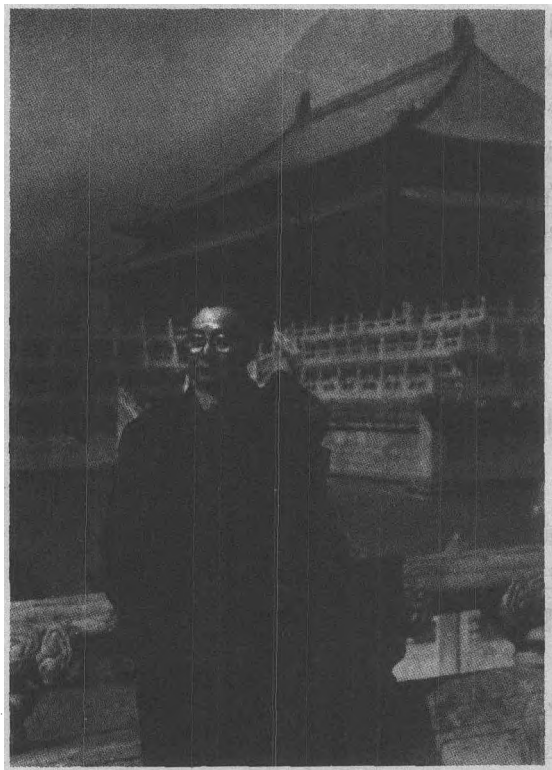
(李之明协助整理)

(作者廖诗权 1930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光明日报》发表 “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 王忠人



莫艾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

天——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壮举,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四人帮”是如何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

1976年,毛主席从9月初开始,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主席逝世后,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然而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在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紧锣密鼓地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上午,华国锋一走进办公室,秘书把要批阅的文件交给他,头一件是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审阅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当华国锋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他停下来了,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联想最近各报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他再也不能容忍江青、张春桥这帮野心家继续以毛主席的指示卫道士的身分招摇撞骗了。此前他问过许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现在他手中有毛主席给他写的三句话,(即“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他要用此来戳穿“四人帮”伪造的“临终嘱咐”。于是华国锋在

这份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后华国锋同志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交部。”文件传到张春桥手里，这个阴谋家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不简单，它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在文件上写道：“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照过去方针办”的手迹，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会见。会见完毕，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一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主席看出华国锋的思想，因为他在4月7日才担任国务院总理，时间不到一个月。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同志搞下台，局势非常不稳，工作有许多困难，所以毛主席为了鼓励他，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你办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来。毛主席写的这几句话，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谈，这怎能叫作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10月3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 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同去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9.16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 9月17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20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9月20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

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文章的框架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两位领导小组成员规划的。

修改与定稿 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以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9月24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9月25日打出小样8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9月27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9月27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可惜没有被采纳。

9月29日，孙关龙将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动手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9月30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9月30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孙关龙把“梁效”的改动告诉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孙关龙在定稿样上写了批语：“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10月4日，《永》文便发表出来。

由此可见，《永》文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定稿。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

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永”文刊出后莫艾等人遭受审查

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作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以下三点：

1.《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根据这个结论，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曾不点名地给莫艾冠以“四人帮亲信”、“四人帮骨干分子”，以及“喽罗”等不实之词，自然应予推倒。

今天重提这个结论，很有必要，因为新闻界，尤其是社会上对莫艾被审查，结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当年“人民”、“光明”等报刊不点名地给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见有文章澄清。这一点，看来是有疏漏的。

2.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30来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批林批孔”、“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宣传中，它们除了宣传极左理论，还影射攻击当时中央正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孔丘之忧》、《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审查结论上写有如下一段话：

“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

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论中所指的错误文章,都是自稿,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须发表的稿件。如果总编辑头脑清醒,多一点独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样积极发表那么多这类稿件。

3.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一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要求它的宣传,必须严格贯彻党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当领导这张报纸的中央领导人是坏人,是反党阴谋家,而且在舆论上极力推行他们的主张时,则被领导的报纸是很难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正是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掌握在“四人帮”姚文元手里的时候,报纸宣传报道中犯有“左”的错误,应该说是可有可原谅的一面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莫艾同志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是诚恳的,认真的。不予处分的结论也包含这个因素,虽然结论的文字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当中央工作组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报》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永》文几次审稿大样等毫无保留地上交工作组。莫艾说这次教训“将永远镌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党严厉处分自己,并希望党组织把他“作一只麻雀,进行具体解剖,看看像他这样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样滑到泥潭的”。“五脏肝胆,任党检查”,态度诚恳。在被审查期间,莫艾共写出160多份交代检查材料,还写出6000字的《三年错误总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几个方面,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

对莫艾审查结论作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粉碎“四人帮”初期,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

有关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上都曾讲过《永》文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此后许多年报刊杂志谈到这篇文章时,也多沿袭上述说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的,个别的则直接说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1983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和同志们对他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1974年调到光明日报社,1976年3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1989年去美国,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责任编辑 程 度)

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

● 薛衔天

1945年9月15日，驻中国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德米特利·瓦西里耶维奇·别洛卢索夫上校飞延安，给中共中央传信息，苏军中校谢德明任翻译，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将军，搭机回延安汇报工作。别洛卢索夫带没带马林诺夫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什么内容，别洛卢索夫对延安传递了什么信息，关系到当时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和中共的决策，研究这一段中苏关系的人必须得弄清楚。曾克林和谢德明是当事人，在档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他们的回忆就弥足珍贵。我们中苏关系课题组首先想到要访问曾克林。

1990年4月25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还有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刘存宽和黄纪莲女士）按约定来到曾将军的寓所。老将军是江西人，中等身材，精神矍铄，一口江西话。他滔滔不绝地讲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党中央的决策，我冀东部队如何率先出关，配合苏军解放山海关，以及他如何当上沈阳卫戍司令等飞延安前的背景。说得兴奋起来，在客厅里边走动边讲。那天天气凉，老将军还穿着棉背心，后来把棉背心也脱了。关于飞回延安汇报一节，他说：

我军初到东北，特别是初到沈阳这样的大城市，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和十分复杂的局面。不仅同日伪残余势力斗争十分尖锐，而且与国民党的特务、“地下先遣队”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急需向中央请示汇报。我们的电台功率小，和中央联络不上，前委决定由我向苏军交涉，请他们派一架飞机送我们回延安汇报。当时苏联方面也急于和我党中央联系，以便向我党说明处境，于是很快决定派机飞延安，并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卫斯别夫大校（即别洛卢索夫上校，曾记错了，下同）和翻译谢德明同行。

我们先到北陵住了一宿，受到苏军特别热情的接待。第二天（1945年9月14日）从北陵起飞，在多伦着陆加油。这里有苏军一个空降师，我在他们帐篷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飞抵延安，杨尚昆、伍修权等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我们，送我们到王家坪。下午两点多钟，彭真带我去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已赴重庆谈判，在家里的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同志一同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我将我部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个城市，以及进驻沈阳，与苏军建立友好关系，部队迅速壮大等情况作了汇报。领导同志很高兴，少奇说，我们很想了解东北情况，你们来得正好。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要地，我们应当在那里发展，把东北建设成战

略基地。随后中央决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汇报之后,朱德总司令同卫斯别夫谈判,我不在场。后来得知:卫斯别夫向朱德同志表示,订立中苏友好条约,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苏联)做得有缺陷。他代表苏军对中国共产党、朱总司令表示敬意。问共产党能否撤离东北?朱总司令说,我们在冀热辽土地上坚持抗战,不能撤出。卫斯别夫说,热辽可以去,吉黑撤出来。最后卫斯别夫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朱总司令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在伪满时为一个省,辖辽西14个县)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与我们经山海关、锦州,于18日到沈阳。从此东北党政工作在东北局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曾将军还说,苏军允许我们进东北,阻止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帮助我们解决武器弹药问题,“总之,东北的解放,苏军有很大的功劳,我们不能忘记,要实事求是。”曾将军的谈话很重要,除了他将别洛卢索夫的名字记错为卫斯别夫,把他的军衔误记为大校,是搭苏联的飞机,不是苏军为他派飞机等细节问题不准确外,其他情况都符合史实,收获很大。但他在朱德与别洛卢索夫会谈时并不在场,而且把会谈内容概括得过于简略,要进一步弄清情况,最好能直接访问谢德明。刚好1990年中,领导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的协议,批准我到莫斯科访问半年,于是有了访问谢德明的机会。

当时谢德明已经是苏联著名汉学家,他的资料并不难找。他原名为瓦·亚·西季赫缅诺夫,1912年出生于俄国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1935年毕业于苏联远东国立大学东方系,后在该校任教。1945年8月随苏军来到中国东北,1946年在大连任苏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主办的中文报纸《实话报》主编,中校军衔。1953—1956年在北京任《人民中国》顾问。此后长期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工作,后转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精通中文,出版几十种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论著。苏联科学院接待我的恰恰是谢德明所在的工作单位——远东研究所,所以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便与他相遇了。

我是1990年底到莫斯科的,赶上圣诞节和新年,莫斯科连续放假。1991年1月3日我才去远东所工作。一进入研究所的一楼大厅,陈列在墙上的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老战士照片,便赫然映入眼帘。其中一位英姿飒爽的年轻军官,胸前挂满奖章,其中还有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奖章,文字注明“西季赫缅诺夫”。我心想,这不就是谢德明吗。这时就站在我身后的谢德明说话了:“小同志,你是从中国来的吧,我是谢德明!”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我在看他的照片。那时中苏关系刚正常化不久,相互人员交流很少,对方有人来,全所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所以他直接与我打招呼。他习惯向拜访他的中国人,报中文名字“谢德明”,因为好多中国人只知道“谢德明”,不知道“西季赫缅诺夫”!从此他叫我“小同志”,我叫他“谢老”。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就各自办自己的事去了。他爽直、开朗、亲切、友好,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

1月5日一早,我如约乘地铁赶到库图佐夫车站,他按时到车站来接。天在下着大雪,路滑难行,老人到来,已是气喘吁吁。他所住的苏共中央



曾克林

机关公寓,是半圆形的一排楼,全无楼号,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坚持要到车站来接。他住在一座楼的4层,进入居室才对我说,老伴已经过世,身边无子女,只有一个妹妹,在远东工作。“招待不周,请多包涵”。将我给女主人的鲜花先撂在一旁,打开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斟满杯子,坐下来,便开腔转入话题。他首先回忆与曾克林将军的简短交往(事先我已经将载有曾克林访问记的《中俄关系问题》交给了他),问曾的健康情况如何,“文革”中受打击没有,还提议为曾将军的健康干杯。

关于延安之行,他说:关于我们飞延安有一个重要情况。本来八路军来到东北,苏联非常高兴,我们军人更是高兴,因为是自己人来了,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嘛!可是曾克林他们进驻沈阳后,那里有美国特务,就给宣传出去了。苏联与美国订有雅尔塔协定,与国民党订有条约,不能承认中共,东北是要交给国民党的。美国一宣传,闹得苏联很被动。莫洛托夫给马林诺夫斯基打电话说,共产党可以到农村去发展,去没有国民党和苏联军队的地方去发展,不要留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马林诺夫斯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飞机让德米特利·瓦西里耶维奇·别洛卢索夫送往延安,亲手交给毛泽东,我是翻译,还有曾克林同行,他是回去汇报的。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不在,信就交给了刘少奇。怎么搞的,你们把别洛卢索夫说成是卫斯别夫?(我说,可能是翻译问题。)伍修权懂俄语嘛!(我说,还有师哲)师哲不在场,可苦了我。我对朱老总“意见”,他说的四川话我听不懂,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四川话翻译成普通话,我再翻译成俄语。谈了好长时间。

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我急切地问。

谢说:那是军事秘密。那封信我不能看,别洛卢索夫也不能看。(我说,这封信很可能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烧了,只能从苏联档案馆得到。)你们中央档案馆可以与苏联档案馆联系解决,你看不到。

我问:我们能否一起去拜访别洛卢索夫将军?他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人物。

谢说:他是中将,退休在家。还有你想见的博依科将军(苏联驻旅顺口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

委员,他的回忆录《解放使命》详细地写了与萧劲光、韩光的交往)正在住院。你要见他们,得你们使馆开介绍信。不过我已经给别洛卢索夫打过电话,又核实了一些情况。他与朱德的谈话内容,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那封信的精神。

别洛卢索夫谈话的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1、苏联与国民政府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对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中国革命有利。当时中苏谈判,关系苏联对日作战问题,属绝对秘密,不能打招呼,(中共)应当理解和谅解。2、苏联出兵东北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受到中国东北人民热烈欢迎。苏军对中国人民的情谊由衷感谢。抗联已返回东北,他们协助苏军打击敌伪势力,维持地方秩序,作了大量工作。东北是中国人民的东北。苏军不久将按时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3、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订有条约,希望八路军不要公开进入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按中苏条约,这些大城市要交给国民党政府。

我说:可是八路军已经进入了沈阳!据说沈阳苏军当局还说,八路军不走,苏军就用坦克轧!

谢说:可是苏军没有用坦克轧八路军。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占领了山海关和锦州,沈阳只要苏军一撤,八路军是守不住的。如果苏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一起往外赶八路军,你们的解放战争史就得重写。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苏军实际上做什么。曾克林把苏军对八路军的友好情况都如实地汇报了,这比信中写什么重要。别洛卢索夫说不要“公开”进入大城市,就是秘密进入,我们不管。八路军撤出沈阳后,共产党却留下来,苏军还暗中保护。

我说:这就是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谢说:对。睁一只眼对蒋介石,闭一只眼对八路军。苏联同情共产党,但没有条约;讨厌国民党,但有条约。当时的情况很微妙。彭真等东北局的同志不是搭我们的飞机到沈阳了吗?如果我们坚决反对共产党,怎么会有这种事?不要听西方的宣传!

我问:这就是说,马林诺夫斯基那封信只是说说而已。

谢说:不!苏联要求八路军不要大张旗鼓地进入大城市是认真的。沈阳公开进入,就得公开退出。长春、哈尔滨就不存在这些情况,是苏军头

脚走,八路军后脚进的。曾将军的回忆“热辽可以去,吉黑撤出来”,别洛卢索夫可能在谈话中说过。实际上八路军并没有从吉黑撤出来。写历史光凭回忆录不行,就是对文件也得从多方面论证。

谢德明全面的、有分析的谈话,使我明白:马林诺夫斯基那封信和别洛卢索夫的谈话的核心就是:苏联同情中共,支持中共,欢迎中共到东北去发展,只要中共不是大张旗鼓地在东北的大城市活动,他们并不干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英明:一方面,坚定地实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决策,派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军东北;另一方面,在东北问题上处处讲究策略,照顾苏联的需要,赢得了苏联实际上的同情和支持,在蒋苏之间和美苏之间打进去一个坚实的楔子,把东北建设成可靠的战略基地,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苏联真的与国民党联合起来,把中共的势力赶出东北,那解放战争史真的就得重写!

谢德明长我近 30 岁。无论年龄,还是学识,都是我的长辈。可他没有丝毫架子,对我这个“小同志”无话不谈。谈话中洋溢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他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我在东北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在北京又与廖盖隆、张彦成为至交。中苏人民友好,我是友好的宠儿。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做梦也没想到,中苏会吵翻。”说到这里,老人有些感伤,话头戛然而止,随即向我展示他珍藏的照片和奖章,每一件珍藏品都是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见证。他叙述着每一件纪念品的来历,又兴奋了起来,不断地干杯:“你口口声声叫我‘谢老’,其实我并不老。我要是四十岁,就还到中国去,还想找个中国姑娘呢。”他最后送给我一本

专著《中国的满洲统治者》和一张照片。我走出房门,老人便把门关上,径自去房间休息,他确实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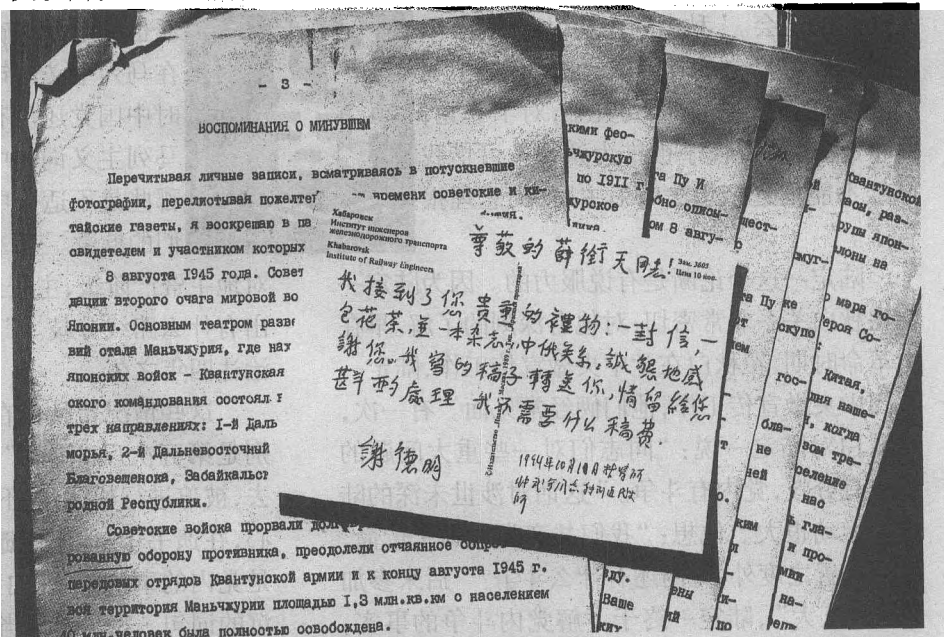
我走出楼门,已是中午两点。雪还在下,楼前的桦树林,只有几个儿童在玩耍,乌鸦在雪地里艰难地觅食。我怅然地感到,应当让老人将在中国的经历写成回忆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位真诚的朋友。

1994 年哲学所张武军同志访俄归来,带来谢老手稿《往事的回忆》和一张明信片,上头写着:“尊敬的薛衡天同志!我接到了你贵重的礼物:一封信,一包花茶,并一本杂志《中俄关系》。我诚恳地感谢您。我写的稿子转送你,请留给你斟酌处理我不需要什么稿费。谢德明”

1996 年再访莫斯科,带着他回忆录的译稿和一大包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老人患风湿性关节炎),准备看望尊敬的老人。谁知他已经孤寂地去见列宁。对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不敢藏拙,附上我会见他时,为他写的、他也喜欢的一首祝寿词,改动了末尾两句(原句为:奕奕鹤发焕童颜,喜迎八十华诞),作为对他的无限怀念。

东西相去万里	当年挥戈平虏
中横黑水乌山	更兼笔走雄关
一段往事梦魂牵	中俄友好世代传
终与谢老晤面	魂归九天无憾

(责任编辑 庄建平)



谢德明提供的回忆资料

大约在 1990 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陈清泉

1928 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 年 1 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责任编辑 仲文)

闻一多和顾毓琇的情谊

● 闻立雕

父亲当年的好友，百岁老人顾毓琇先生仙逝，我深感哀痛、惋惜。顾老是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著述、创作等身，在教育、科研、文艺等方面贡献巨大。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两个“犯人”成了好朋友

1922年5月21日，清华文学社为即将赴美留学的父亲等同学举行送旧迎新会，父亲发言时颇有些动情，谈到母校，尤其是文学社时，甚感“依依不舍”，大家听了，情感上都颇受触动。

第二天父亲回家乡去与高堂二老及我母亲作行前告别。

不久，他收到了最近一期《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其中有一篇题为《离别》的短篇小说。作者不但未用真姓名，只署了“犯人”二字，还特别交代“不必调查他朋友的姓名……更不必写什么回信”。

该文叙述的是与父亲的惜别之情，文字相当感人。父亲看了第一页“喜极了”，看了第二页“更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最后讲到：“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按：这是指因参加罢课，支持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所受之处分）得观三四年来的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今既离校复得一知己如足下者，更喜出望外之外矣！唉！十年之清华生活无此乐也。我之留级，得非塞翁失马之比哉？”

《离别》的作者署名“犯人”，父亲在信的抬头也就称“我亲爱的‘犯人’”，而在信的末尾则署名“误人自误的罪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多”。

信写好了，由于不知作者是谁，只好寄给梁实秋，请他打听作者并转交。

梁实秋没有辜负朋友的重托，很快就了解到“犯人”原来是顾毓琇。从此“犯人”和“罪犯”成了莫逆之交。

1946年父亲牺牲之后，顾老将《离别》重新发表，并在文前的序文中追叙了这一过程，最后也说：“从此我们便定了交，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父亲57年前殉难，如今顾老百岁辞世，两个老朋友分别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在九泉之下又重相会了！

善意的邀请引出一场意外的家庭风波

“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和北大、南开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我们一家也回到了武昌。按学校的制度，这一年父亲本来是应该休假的，但教师一时到不齐，梅贻琦校长来信请父亲推迟休假，去学校任课。父亲稍做准备就去了长沙，由于学校房屋奇缺，不能带家属，母亲和我们子女都留在了武昌。

这年的12月，战局进一步恶化，长沙也不安全，学校又奉命迁云南。父亲决定和学生一道步行前往。因为要到数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之地去，又不能带家属，临行前父亲回家再看看我们的祖父母，也同母亲就有关事情作些商量和交待。

其时，为避敌机轰炸，祖父母和我们都已回到了浠水老家。

父亲途经武汉时，已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琇前来探望，谈话中他告诉父亲教育

部正在组建一个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为政府抓战时教育提供咨询,他自己兼任该会的主任,想邀父亲参加,共襄战时教育大事。

父亲非常感谢老朋友对自己的信任,但他表示:“今生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他说:“各人志趣不同,大家都为了抗战,在哪里都一样。”

不料,父亲回到家中讲起此事,却引起了同母亲的一场不小的风波。

母亲极力主张父亲接受教育部的工作。几个月来她深感在烽烟遍地、炮火连天、敌机轮番狂轰烂炸的日月里,她独自一个人支撑这个家,无论精力上还是精神上压力实在太大了!五个孩子大的刚10岁,每天一睁开眼不仅要为他们吃喝拉撒睡操心,还要为他们的安全担心,闹得精神紧张,心力憔悴,疲惫不堪。

因此,从内心里讲,母亲实在是不愿让父亲远离这个家。当初,父亲去长沙,她照顾大局勉强同意了,现在学校又要搬到云南去,越走越远,困难将更大,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母亲为此忧心忡忡,心情非常不好。因此,当她听说教育部的事(教育部就在武汉),就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既可以为抗战服务,又可以照顾家,于国于己都有利,因而坚决要求父亲接受该项工作。

父亲觉得此行一去数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聚,临别竟是这么一番情景,也十分伤心,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但他依然不改初衷,路过

武汉时,给顾毓琇发了一封便函,说:“承瞩之事,盛意可感。惟是弟之所知,仅国学中某一部分,年事体太,万难胜任……我辈作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

父亲走后,母亲的怨气仍久久难消,父亲来信一概赌气不回。这回轮到父亲不好过了,长时间得不到家里一点音讯,焦急万分,好话、气话、赔礼道歉的话都说尽,母亲就是置之不理。直到两个多月之后母亲的恻隐之心战胜了怨气,这场风波才终告结束。

顾老没有料想到老朋友家中会发生这样一场不愉快,否则,恐怕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那么热情地向父亲发出那个邀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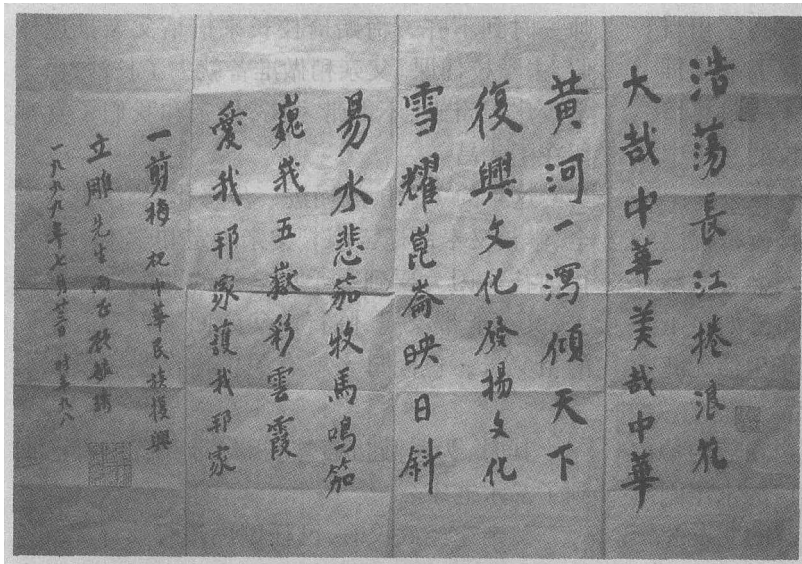
“不许发表,除非我死了!”

1932年父亲和顾毓琇相继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两家同住清华大学的西院。

清华的教学和科研条件非常优越,父亲终日埋头书案,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乐而忘返,成就颇丰。与此同时,顾毓琇也回清华就任电机系主任。两家同住在清华园的西院,时相往来。

次年暑期,朱湘来到北平访友。他也是清华校友,同父亲和顾毓琇都有相当深的友谊。父亲归国初期致力于新诗事业时,他曾是热心分子和过从较密者之一。他在平期间常来看望父亲,对于父亲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取得的丰硕成果颇有感慨,曾草就了一篇题为《闻一多与〈死水〉》的文章,称赞《死水》诗集“由封帧、扉页一直到书里各首诗的排列,便成为一幅图案井然的好画”,还联系到写诗、治学、立身、处世等方面称赞父亲这个人“也是一篇整体的诗”。

该文对父亲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倍加赞扬,称父亲对唐代文学的来源、去脉“有许多精辟的议论”;对文字的校勘考据有理有据有创见,说:“读古人书,要这么读,才能



顾毓琇给闻立雕的题字

说是读书”等等。

朱湘把文章写好后,约顾毓琇同去送给父亲看。顾老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多看了朱湘的文章,却不许他发表,说除非自己死了,因为那文章写的太好了,说了一多作学问的许多事,一多向来不愿听恭维话,自然不同意朱湘发表它。朱湘本来不爱讲话,文章要还给他,他非撕了不可。我出来打圆场,说由我来保存这篇文章。”

顾老确实很负责任地保管了这篇文章,他在武汉时,教育部被炸,他硬是从乱书堆中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后来又带到了重庆。父亲牺牲后,顾老以朱湘的名义把它发表了。文后加了附注说:“本文系朱湘在清华舍下作客时所写。一多看见了,便不许发表。一多说,除非等他死了以后。这文便归我保管。如今一多死了,谨以朱湘遗稿郑重发表。一樵敬志 三十六年四月”(按:一樵系顾老之字)

顾老既尊重了父亲的意见,又履行了保管的义务;既代朱湘实践了他的心愿,又表示了自己对老友의哀思。

两幅题词一片心

顾老是蜚声中外的名人,但他待人温厚,热情和蔼,丝毫没有一点架子。

1999年是父亲诞生一百周年,北京、武汉都准备隆重纪念。当时我想顾老是唯一健在的父亲生前友好,如能恳祈一幅题字,纪念活动必将大为增辉,先父在九泉之下也当倍感欣慰。于是,不揣冒昧发信向顾老提出了请求。

本来我曾担心顾老年近百岁,出于健康上的考虑,可能很难满足我的要求。不料,半月左右顾老竟将题字寄来了。撕开大信封抽出来一看,雪白的宣纸上工整端庄地写着:



顾毓琇(中)与闻一多(左)、潘光旦(右)20世纪30年代初的合影

一多学长百龄仙寿

英 灵 永 在
教 泽 长 春

弟 顾毓琇敬题

时年九八

寥寥二十几个字,情真意浓,充分体现了对老朋友的由衷钦佩和无限深情,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顾老还另外赐给了我一张墨宝,内容是顾老亲填的一首词,原文如下:

浩荡长江卷浪花 大哉中华 美哉中华
黄河一泻倾天下

复兴文化 发扬文化

雪耀昆仑映日斜 易水悲笳 牧马鸣笳
巍峨五岳彩云霞
爱我邦家 护我邦家

一剪梅 祝中华民族复兴

立雕先生两正 顾毓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时年九八

这首词盛赞我中华“大哉”、“美哉”,呼吁“爱我邦家”、“护我邦家”,火热的爱国激情跃然纸上,给人以极大的教育和启迪。

顾老终身热爱中华,年届百岁,仍时刻胸怀祖国,可敬可佩!

顾老去了,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温厚平易的爱国老人!

(责任编辑 程 度)

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 孙思源

1908年12月2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其父摄政王载沣的摄护下哭哭啼啼登基，刚满3岁便做了清皇朝入关后第十位皇帝，改元宣统。宣统年号的意思是要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使清王朝得以万世一系，长治久安。但这只是梦想了。进入20世纪，要求改革和鼓吹革命的声音已经不可遏止，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维持。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6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演出了清王朝的落



囚禁在苏联时期的溥仪

幕，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冯派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带领20人的手枪队进宫，限溥仪在3小时内全部搬出紫禁城。溥仪一行丧魂落魄地被国民军赶出宫后，暂住后海载沣醇王府。12月10日，溥仪逃入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由日本使馆策划和护送，秘密转移天津张园。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2月末，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的所谓“全满洲会议”上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3月8日沐猴而冠，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退位，16日被苏军俘获，送往苏联。先后被囚苏联赤塔、伯力监狱。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本文拟依据若干当事人撰写的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对溥仪被苏军俘虏经过及中苏两国政府交接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俘始末，向读者作出介绍。

（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向溥仪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伪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危言胁从：“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的杀害！”经溥仪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宽限。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绕道吉林至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凄凄惶惶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伪满洲国结束了它的生命。据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皇朝确实灭亡了。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瞻、毓岳、毓塘，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临行时溥仪对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安抚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其实连他自

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运将是怎样的呢。慌乱中溥仪一行随即乘火车到通化县转乘飞机去沈阳。16日上午11时,溥仪、溥杰和吉冈等所坐的飞机先抵沈阳机场。就在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毓嶙等人所坐的另一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传来一阵震耳飞机声,但是着陆的却是苏联飞机。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等待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军不期而俘。

过去的许多文章书著对溥仪的被俘大多语焉不详,没有深涉。这事甚至连身临其境的溥仪的随侍李国雄也都颇存猜疑,在他口述的《伴驾生涯》一书中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1945—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苏联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在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关于俘虏溥仪的经过。1945年8月20日他到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

“我把皇帝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运到了赤塔。”
“我们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以上陈述,表明溥仪一行是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转机时被刚降落的苏军恰巧碰上而被俘虏的,并不是像有些文章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要是依有预谋的说法,苏军则会严密监控机场,而决不会出现溥仪已在

机场候机,苏军飞机才降落,经详细询问才知道谁是溥仪这等事的。

《溥杰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并曾说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后,在溥仪的要求下,苏军把死缠溥仪11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同溥仪一行分开了。

在通辽机场,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皇帝”,围拢过来看,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模样的打趣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不止。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赤塔。

溥仪的偶然被苏军俘虏,对苏联来说是它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其所希冀的重要作用。

对溥仪来说,被苏军俘虏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的日本将会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国,落入国民政府手中。溥仪很可能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

(二)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押送溥仪一行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溥仪等人刚感到已获生路,很意外的是听到车外传来一声中国话:“要解手的,可以下车!”不觉一惊,以为最坏的情况出现,要在这里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政府了。下车一看,原来讲中国话的是一个苏联少尉,虚惊了。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他们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了虽觉刺耳,但仍为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初审交待问题,一个月后被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丰盛俄餐,还供应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

随侍侍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不测命运。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又看到让他揭发日本帝国的罪行，于是他认为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便生出一个想在苏联偷生、逃避祖国人民惩罚的幻想：苏联和英美是盟邦，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



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

去做寓公。他带着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其中写道：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惟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义（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出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尽余全力，而努力前进。”“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

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正是中国人民革命以巨大的节节胜利告示世界的时

候，怀着更加急不可耐心态的溥仪便直接向斯大林大写出“申请书”，其中说：

“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谢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我在满州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一九四五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军的第二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以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

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溥仪的这两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能为他向上说好话，溥仪还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榨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次故意对他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等。吓得溥仪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

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在先后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作书面报告。他在1947年12月的报告中称：

“被拘留的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关押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内务部第45号特别看守所内，现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在苏联生活。”“连同溥仪向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信，还送来了溥仪的侄儿的请求信，要求留在苏联，”“以求有可能研究最新科学成就和溥仪一道工作。”

在1949年9月9日送呈溥仪1949年7月29日请求信译文的报告中又称：

“溥仪请求允许他在苏联永久居住，他在这里‘像苏联人一样，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而工作。’现向您报告请定夺。”

1949年9月20日的报告中再次称：

“溥仪在他的请求信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很好和将中国人民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他解释他的动机是渴望为苏联以后的发展而工作、劳动。”

1946年国内报刊上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引渡溥仪的说法，发过消息。3月28日《中央日报》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报道说：“宣传部长吴国桢今日声称，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或问华方拟如何处置溥仪，吴部长笑称：‘我人自有计划’。一般人士均认

溥仪将以战犯资格受审问。中苏双方经长久谈判后，始商妥引渡溥仪。”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询问国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以试探国民政府对溥仪的态度，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

1946年8月，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八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溥仪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作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无疑，溥仪在为自己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对于这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我交涉引渡溥仪》的报道：（本报南京二十七日急电）伪满洲皇帝于东京作证后是否解归我国，抑仍由苏押回？司法行政部谢部长今告本报记者，已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浚，就近交涉引渡。

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作可否。当时有位西方远东问题专题学者就此撰述专论，猜测苏联拒绝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是准备将来把溥仪送回东北，利用他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

日本利用溥仪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1)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上述在押中国人的情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将这些人的引渡给中国当局是否感兴趣;(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后,按所附名单将58名在押中国人连同属于他们的财宝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

1950年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A·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于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1950年7月6日,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A·葛罗米柯在联名向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它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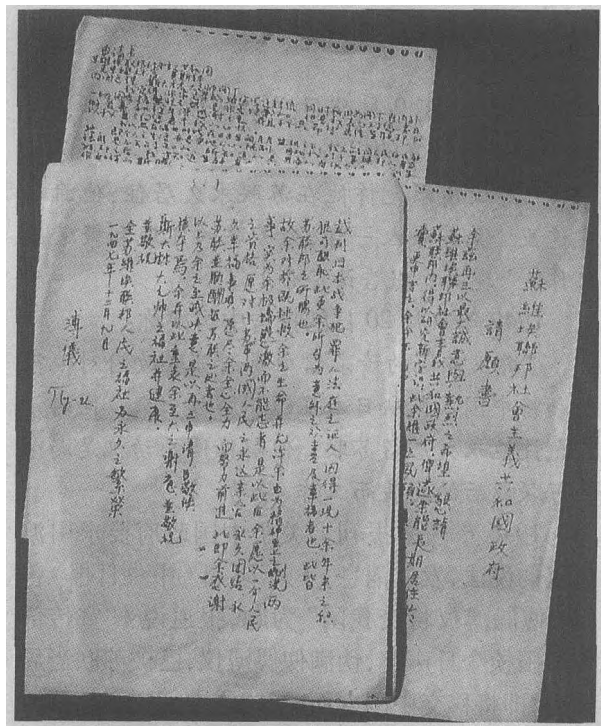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时间为8月1日。苏方移

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

(三)

对于苏联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一决定,在伪满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大多数伪满战俘感到高兴,这是他们所企盼的,他们希望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曾于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达了要求回国的迫切愿望。他们在函中写道:“我们读到了您于4月1日给溥仪将军的回电,电报中您划清了有罪和无罪的界线,指出了应走的道路,给予我们彻底自新的机会。”“我张景惠和其他人,虽然置身祖国疆土之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而兴高采烈。如果容许我们回到祖国并保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发誓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所以他们为能引渡回国而高兴不已。

但是,引渡回国这一消息对溥仪来说如上刑场。他惶恐不安,求助于占卜算卦问吉凶。1959年



溥仪致苏联政府请愿书

10月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的发言中也详述过以往的这一心态：“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共产党还能不严厉处置我？在报纸上，看到土改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就这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中，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1950年7月30日溥仪一行从伯力登上归国之程。苏方把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一位大厨还好心开导他说：“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可是溥仪总觉得这些话是诓他的。溥仪一直不吃不喝，坐卧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难以抹去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个美国律师对着他大声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溥杰也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引渡回国的列车的。他在《溥杰自传》中记载了当时心情：“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

中方对这次接收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一处执行科田羽，率石平、李季和杨永祝等人配合接收，并负责解送战犯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中国医大附属医院选派医生、护士各一名及公安部队抽调若干看押武装人员随行。

8月1日晨，载着伪满战俘的专列到达绥芬河市对面的伏罗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为保证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决定由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

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通道。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经通道走过，登上中方车厢。

这次接收的伪满战俘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此外，还有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当即在双方代表监视下，由苏方保管该财物的两名军官移交，中方由田羽、石平接收。按清单点交完毕，编成号码，用火漆加封，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

交接完毕，中苏双方签署了移交书。移交书着重指出：苏方由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上尉阿斯尼斯交出58名伪满战俘及其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中方由中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陆曦负责全部接收。

中苏双方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0年8月2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书面报告了移交情况：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这位代表移交了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随员和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计58人以及属于他们的贵重财物。”“到达绥芬河车站后溥仪写下了如下内容的感谢信：‘在苏联居住期间，我受到苏联以及斯大林大元帅的关怀。现在当我离开苏联领土时，我衷心为给予我的好心对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我祝愿苏联人民世代繁荣，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溥仪等人得以引渡回国，是真正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他们最大的幸运。无论引渡回国的伪满战犯怀着哪种心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思想逐步转变，通过劳动、学习，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认清自己的罪恶，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溥仪也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溥仪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人’，这是我在开蒙课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责任编辑 庄建平）

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自杀”真伪揭秘

● 鞠九江 盛楠

55年前,在惊心动魄的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其中将师长张灵甫命归黄泉。然而对张灵甫的死,国民党涂脂抹粉为“自杀”。张灵甫果真自杀身亡?过去曾受命为张灵甫验尸的原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司令员的保健医生盛政权,在缅怀陶勇逝世35周年、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5周年之际,详细披露了55年前孟良崮战役结束当日,他对张灵甫验尸的真实内情。

盛政权,今年76岁,祖籍江苏启东新港镇,现住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是一位享受地市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他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春至1949年6月任陶勇保健医生,并随军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1952年10月他赴朝作战,1963年被授予“少校主治军医”军衔,离休前任如皋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最近他在笔者独家采访时,愤然抨击了国民党美化张灵甫的“自杀”之说。

“张灵甫自杀了!”

1947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的直接指挥下,以第一、四、六、八、九纵队向盘踞在山东蒙阴东南孟良崮山区美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七十四师发起猛烈进攻。激战至16日,国民党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其中将师长张灵甫也一命呜呼。

“运输师长张灵甫,工作热情又积极,运武器送弹药,慰问我参战野战军……蒋介石的‘大

红人’,你替狗卖命见阎王……”5月16日,时值黄昏,解放军战士扛着战利品,押着俘虏,哼着小调一队一队走下山来。

此时,在孟良崮战役的告捷声中,设在山下的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指挥所频频接到战斗前沿打来的电话:“张灵甫自杀,张灵甫自杀了!”指挥所里人头攒动,指战人员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被陶勇称为“小白脸”的盛政权也情不自禁地狂呼着:“噢——,打胜仗了,张灵甫自杀了!”

“是自杀吗?”待战斗前沿报捷电话又一次打来时,陶勇紧锁双眉,操着浓重的安徽霍丘口音大声询问。

“报告司令员,是俘虏兵讲的?”电话那头未敢作出肯定性答复。

“混蛋,怎么搞的?”陶勇火气爆爆地将电话一撂训斥着。

指挥所一下子静了下来。陶勇一支接一支抽着“前门”牌香烟,室内烟雾腾腾。

盛政权跟随陶勇当保健医生多年,他知道首长的脾气,心情好时,幽默风趣,爱下棋遛马,待人也温和;心情不好时,耷拉着脸,爱骂人训人。

司令员发火了,大家谁也不敢吭声,但心里总在咕噜着:“仗打赢了,张灵甫也死了,首长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备马,寻找张灵甫尸体!”

夜幕渐渐降临,又暗又湿的司令部指挥所闷得人直发慌。陶司令来回踱着步,数十双眼睛盯着他来回转动,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室内空气

几乎凝成了一团。

“警卫员，备马！”陶司令将手中的半截烟熄灭，粗声粗气命令着：“去600米高地，寻找张灵甫尸体！”

“是，集合！”警卫班长立正行了个军礼。瞬间，警卫班20多人齐刷刷地立成一队。

“马夫老吴，医生‘小白脸’（盛政权皮肤较白）随队出发，再在当地找个熟悉地形的向导！”陶司令又下了一道命令。盛政权左背急救包、右挎药包，随队消失在夜幕中。

从山下的第四纵队司令部指挥所至孟良崮600米高地，直线距离约8公里。雷雨过后，天空依然乌云密布，夜色朦朦胧胧。漫山遍野的山坡上一片恐惧，到处都是弹坑、死尸死马，有的尸体已腐烂发臭，阵阵臭味袭来，直让人恶心作吐。陶勇骑一匹枣红马走在队伍中间，他的前后是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左右是两名随身警卫。老吴牵着马，盛政权走在队伍最后面。

山路崎岖曲折，举步难行，有的地段几乎要匍匐前进。人在尸体群中行走，稍不慎就踩着人头手臂，让人心里毛悚悚的。行至半山腰，因马受惊，陶司令员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盛政权和警



盛政权

卫扶着他走一段路仍不能骑马，陶司令即弃马随队一起步行上山，老吴牵着马跟在队伍后面。

在向导的指点下，队伍抄小道赶到600米高地。光秃秃的孟良崮山顶躺满了横七竖八的敌军尸体。随从人员迅速行动，搜寻张灵甫尸体。约一刻钟后，一警卫人员在一只炸毁的发报机旁发现一具身穿将官制服且面部朝上的尸体，当他取下其胸章时止不住大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他随即将写着“中将张灵甫”的胸章交给了陶司令。

已骑上马背的陶勇悠闲地点了一支烟，他看过胸章后风趣地说：“张师长，你醒醒，我陶勇看你来了！”

“小白脸，为张灵甫验尸！”

张灵甫尸体找到了，大家轻松地喘了口气。

“小白脸，为张灵甫验尸！”马背上的陶司令语调铿锵激昂，声震山谷，打破了万籁俱寂的黑夜。

验尸，是盛政权担任保健医生以来第一次接受此项任务，而面前的死者又是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中将师长，他不免有点紧张。

“小白脸，能为张灵甫验尸是你的‘荣耀’！”陶司令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他逗乐后又补上一句：“责任重大，验尸结果要向世人公开哟，不可马虎！”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盛政权坚定了信心，操一口江苏启东口音回答着。

四名警卫员协助验尸，四把手电筒将尸体周围照得通亮。张灵甫尸体躺在山坡上（头朝山头，脚向山下）。他身着一套美式将官制服，头戴大沿帽，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毛，面色如土，硬梆梆的尸体活像一条大鲨鱼一动不动地躺着。

盛政权一丝不苟地进行着验尸。他首先检查头部，发现除左面颊擦去一块皮外，其他无伤痕。他解开张灵甫胸前纽扣，发现其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躯体倒在血泊里。他反复检查枪伤，判断两枪眼均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的致命贯通枪伤。枪眼口径较小，符合我军战士使用的美制“加拿大”冲锋枪口径。按惯例，国民党高级将领自杀，一般都惯于

用手枪打太阳穴，而张灵甫头部无枪伤；退一步分析，就是张灵甫当胸开枪，也难以连发两枪形成两个枪眼，况且衣服上没有火药燃焦的痕迹，故排除了自杀。验尸结论为：张灵甫系被我纵击毙身亡。

盛政权将验尸结果报告给陶司令，并详细说明其理由。陶司令满意地点头：“我说他不会自杀的，他想突围逃命，才落得这个可悲的下场，该死，他该死！”

“报告司令员，发现一本军官证和一张照片！”验尸后一警卫人员从张灵甫内衣口袋搜出两份遗物。

陶司令接过一看，军官证外部血迹斑斑，但夹在里面的张灵甫照片完好无损，他幽默地说：“军官证上交，这照片嘛，‘小白脸’验尸有功，就留着‘纪念’吧！”

盛政权细看照片，这是一张一寸的张灵甫免冠照片，照片虽有点模糊，但仍能看出张灵甫颇有一番将军风度。他将照片包好放入急救包内。

当晚9时许，原班人马顺利返回四纵队指挥所，陶勇即将验尸结果电话上报军区司令员陈毅同志，得到陈毅的认可。

夜深人静，乌云渐渐消退，月亮露出笑脸。“老梅，来盘围棋！”陶勇兴奋之意涌上眉梢，与参谋长梅嘉生连下几盘围棋至深夜。

数日后，延安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张灵甫被我纵击毙的消息，从而纠正了张灵甫自杀的错误说法。

“自杀，这纯属无稽之谈！”

七十四师的全军覆灭及张灵甫的死亡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蒋介石痛心疾首，气急败坏，惊呼“真是空前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为稳定军心，振兴士气，国民党对张灵甫大加颂扬，撒起弥天大谎。此后不久，我军在缴获国民党的大批文件中有多处美化张灵甫的描述：“灵甫见大势难支，乃召集各部长官至山岩指挥所当众宣示：‘战局已无可挽救，自身决心一死报国，成我军人气节。’然后率部属从容步出指挥所，举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蒋主席万岁！’声震山谷，旋即入内，自杀成仁……”云云。

蒋介石在悼七十四师文中说：七十四师“饮水断绝，粮弹绝尽，全师孤立，四面受敌，即在阵地相率自戮者计有师长张灵甫等高级将领20余人，悲惨壮烈！”

“自杀，这纯属无稽之谈！”当盛政权听到这些文字描述时，他即以现场验尸者的身份进行了愤然抨击：“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全国解放后，上海、北京等地党史军史研究部门及辞书出版单位曾来信，向盛政权了解他为张灵甫验尸的有关情况，盛政权如实反映为张灵甫验尸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自杀”谎言，从而确保了党史军史及辞书出版对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责任编辑 吴明）

欢迎订阅《炎黄春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没订上，没买到，您莫急，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补购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大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 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 丁 丑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

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

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許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

为林豆豆选婿。

关于此事,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责任编辑 周 庄)

2001年5月9日,《北京日报》报道西安发现64年前黎明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引起读者关注;同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排《毛泽东自传》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去年4月12日《中国老年报》发表《孙寒冰与中文版〈毛泽东自传〉》一文(作者孙一德是孙寒冰女儿。本文作者是孙家女婿),不少读者更希望进一步了解孙寒冰其人以及孙寒冰当年策划出版《毛泽东自传》的详情。2003年恰逢孙寒冰诞辰100周年,特撰此文,以追忆孙寒冰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他只活了37岁,死于日军的空袭

孙寒冰,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一家靠父亲开木器店为生。他幼年丧父后,不得不跟着舅父去东北,一面读书一面在电报局当练习生。他勤学好进,1919年由上海中国公学考入复旦大学商科,毕业后,1923年留学美国,1925年获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及文学。

留学美国期间,孙寒冰除完成规定学业外,十分重视自学,独立思考,图书馆成了他风雨无阻每日必去之处。图书馆的藏书他了如指掌,有时同学找一本书,不去查索引,问问他就可以了。他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对古典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塞列格曼等人著作的一些精彩段落,可以背诵如流。正由于他的学识渊博,毕业后许多大学希望请他当教授。

抗战时期《文摘》创办人孙寒冰教授

● 郑兰荪

孙寒冰于1927年回国,一直在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任职。最初任政治学教授,而政治学却是他在美国没有专门攻读过的。但由于他平时读书面广,边教边学,很快成了这门学科的内行,1928年兼任预科主任,1929年任政治系主任。其间还先后兼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及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1年创办黎明书局,任总编辑;1937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文摘》杂志,任主编。1938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直到去世。

孙寒冰逝世的1940年,中国已进入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打了三年的侵略战争,战线拉得很长,战力消耗很大,不得不缓慢战略进攻,改变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疯狂地进行轰炸,企图以此改变其深陷泥潭难以自拔的局面。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自然是日本轰炸的重点。

复旦大学于1938年由上海迁至重庆郊区北碚嘉陵江对岸黄桷镇。这个小镇居民不足千人,又非军政要地,但日本空军竟有计谋地于1940年5月27日对小镇进行了整天的轰炸。肆无忌惮的敌机低空飞行,几架十几架地一字排开,像篦头发似的一遍遍地轮番投弹、扫射。孙寒冰在该日下午1点多钟敌机第四次的空袭中不幸遇难。

孙寒冰的遇难,震惊了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界,郭沫若的悼诗说:“战时《文摘》传,大笔信如椽。磊落如肝胆,鼓吹动地天。”老一辈出版家胡愈之则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文化战士。”

郭沫若、胡愈之所褒奖的,正是孙寒冰创办的《文摘》的功绩及其主编《文摘》过程中体现的主旨精神。

要了解他,不能不介绍他创办的《文摘》

1936年,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孙寒冰,决心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文摘》,每期200页左右,选载国内外各种报刊文章,使读者了解各家学说,纵览世界大势。孙寒冰称《文摘》是一本“杂志的杂志”。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前夜,孙寒冰确定《文摘》的编辑方针是:“暴露敌人阴谋,促进全国团结,为抗战做准备”。由于这一方针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杂志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出版于1937年1月的创刊号,因供不应求,再版五次,总发行数达五、六万册。

七七事变爆发,气焰嚣张的日军长驱直入。形势突变,人心惶惶,不少刊物被迫停刊。《文摘》怎么办?孙寒冰明确向大家表示,《文摘》这棵新生的幼苗,绝不能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扼杀,不仅要克服困难办下去,还要由月刊改为旬刊,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抗战形势。于是,《文摘》在出版八期后,改为《文摘战时旬刊》,编辑方针改为:“宣传抗战必胜,日本必败”。

1937年8月1日出版的《战时旬刊》,旗帜鲜明地刊出了卢沟桥浴血抗战专栏。上海沦陷后,复旦大学由上海迁往重庆,孙寒冰因患伤寒滞留上海,但他办好《文摘》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和几个挚友商定,将《文摘》转移到武汉出版。他病体稍有恢复

就积极搜集资料,为武汉源源不断地提供稿件。病愈后,他把老母和妻儿留在上海,只身从香港辗转广州,用汉口寄来的纸型发行《文摘》广州版。武汉、广州沦陷后,《文摘》一时被迫停刊,孙又不得不返回香港,几经周折到达重庆。孙寒冰在复旦大学继续任教的同时,在资金、人力、资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终于成立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坚守住了这块抗日的宣传舆论阵地。

《文摘战时旬刊》从1937年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共出版140余期。

杂志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必胜论。《文摘战时旬刊》第1号,发表毛泽东的《论中日战争》和宋庆龄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并加按语评论说:“孙夫人的大作和毛泽东先生对抗日战争的观测,更可使我们确信中华民族抗战的必然胜利。”《旬刊》第2号,继而发表了《在中国胜利的条件》。文中说:“中国可以失去很多土地而仍然战斗下去。照毛氏估计即算日本能占据拥有2万万人口之土地,中国还是可以抵抗下去。

同时,在日军前进的时候,它的交通线加长,它的后方加广,而它的后方必须永久看守和保护,以防御游击的扰袭。……”其后,《旬刊》又发表不少剖析日本国情、揭示日本不可克服的弱点的文章,如《拆穿日本纸老虎》等,阐明日本最终必败的道理。

杂志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公正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文摘》8期发表中文版《毛泽东自传》一炮打响(下面专题介绍),又发表了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文章。在叛逃了的张国焘发表公开信造谣诬陷,挑拨国共两党关系,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旬刊》发表了周恩



孙寒冰

来、秦邦宪、陈绍禹三人的公开信予以严辞揭露批驳（见1938年5月18日第21号）。《旬刊》还刊登了马相伯先生的《停止党争，一致对外》文章，以表达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制造磨擦斗争的严重关切。文章说：“当前的急务，除了团结救亡抵御外侮而外，再没有第二个更重大的问题，……各党各派的主张政见，容有不同，但总得以保全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为前提。”（见1938年4月8日第17号）

杂志坚持客观公正，不屈从压力，不人云亦云。突出的例子是：

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参加反苏大合唱，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是要和希特勒勾结起来瓜分世界”，并借此为在国内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这时的孙寒冰却不顾国民党的高压，在《旬刊》上选登多篇文章，揭露英国的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等拒不接受苏联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制止德意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的正确主张，还千方百计地讨好法西斯，企图把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孙寒冰还请人翻译出版了勃兰特的《莫斯科外交》一书，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真相。当国民党宣传机关对《旬刊》威胁和警告时，孙寒冰毫不屈服，沉着应对。他在《旬刊》第68、69期合刊的编者按语中表明，“我们选择文章，除了能够代表一定的言论之外，凡是分析实际情势的，我们决不因作者是世界名人而作选择标准，我们必须有可靠的事实作他们的意见的后盾。”“《文摘》和其他一切文化战线的战友一样，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和改造世界的忱”，“她希望尽可能地尽客观地介绍各方面的言论和我们所生活的今日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们的介绍虽然客观，我们的态度从不‘虽然’。如果我们发现真理站在那一面，我们将在环境的许可下尽可能站出来为他说话。”

关于《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的历史作用，夏衍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提起孙先生，人们就会想到《文摘》这本小小的杂志，抗战以来，在报道国际真实，善导全国舆论这一点上，尽了如何伟大的力量，我只能说一句用惯了的



1937年11月版《毛泽东自传》封面

话：无法可以估量。”至于孙寒冰在《文摘》中的作用，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则认为：“孙寒冰是《文摘》的灵魂。”此话，应该说是不差的。

最得意之作，是策划出版中文版《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笔录毛泽东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这本书从毛泽东的家庭身世讲到他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斗争；从红军的五次反“围剿”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这本书实际上是那一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此以前，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形式发表过自己的传记。在中国第一个发现和策划出版这本书的正是《文摘》主编孙寒冰。

1937年8月的一天，孙寒冰阅读美国的英

文报刊《Asia》(即亚细亚月刊)时,不经意间看到了这篇文章,顿时眼睛一亮,禁不住一口气读完。孙寒冰认为,由于受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人民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事实真相缺乏了解;发表这篇文章,让读者正面了解毛泽东及其政党的言论和政策主张。他找来当时任《文摘》编辑的在校生汪衡,请他将文章全文翻译出来。

文章译出后,如何在刊物上发表,是摆在孙寒冰和《文摘》同仁面前的一大难题。虽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积极抗战的姿态,但骨子里仍然是灭共之心不死。上海国民党设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的消息严加封锁,上海的《生活》、《永生》、《大众生活》等杂志都因发表进步文章一再受到迫害,有的文章被扣发,有的杂志被查封。在这种形势下,贸然刊发共产党领袖的自传不但不可能,搞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

孙寒冰既决心在《文摘》上公开刊发,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闯过反动当局审查这一关。他四处奔走,找很多人想办法。在最后无一结果的情况下,他想到去找复旦大学校友邵力子先生。邵是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直接掌管文权,也许他能为这篇文章“开绿灯”。他抱着一线希望携带书稿,乘火车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找到了邵力子,说明来意,呈上书稿,请邵力子过目。经过交谈,邵慨然提笔在书稿上批了“准予发表”四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寒冰带着邵力子的批示立即返回上海,审查委员会的官员们看到邵力子的亲笔批示也再无话可说。《毛泽东自传》中文版,从1937年8月1日起在《文摘月刊》和《文摘战时旬刊》分七期连载,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孙寒冰趁热打铁,及时将全文汇集一起,增加了《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等三篇附录,还影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题词和有关毛泽东的照片以及八路军战士活动的照片数十帧,由孙寒冰创办并任总编辑的黎明书局出版,并在《文摘战时旬刊》第5号刊登广告称:“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自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氏口述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

此书一出,不胫而走,震动了整个蒋管区,一版再版,正式发行量达六七十万册,成为中国出版发行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后不久,即1937年11月8日,《文摘》又连载了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孙寒冰独特的人格魅力,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真。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重大原则斗争中,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都是一个不加任何修饰的“真我”。

(责任编辑 洛 松)



孙寒冰一家合影

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

● 陈铁健

陈独秀——被嘲弄的历史人物

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南端,明代东华门城基陈列处,墙上嵌有一块全园游览路线和周边街区详图,用黑色大理石雕刻描金,图像清晰,标注严密,唯独遗漏了近在咫尺的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故居兼《新青年》编辑部。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彭明先生为这件憾事,不知说过多少次。然而,无独有偶,还有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怪事:在公园北部靠近北大红楼东侧,一座挺立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浮雕中,居然没有陈独秀。

这座浮雕,做成照相底片式样,宽高各约4米,呈倾斜的不规则三角形,以不锈钢铸成,似乎足以支撑千年而不朽。但是,熟知五四运动历史的人们敢于断言:它的寿命绝对长不了。何以如此?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近乎对历史的嘲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斗争规模之大,社会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激扬的爱国热情,是由以陈独秀为主帅,蔡元培、胡适等人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培植起来的。陈独秀说,五四时期的言论是应该由他和蔡元培、胡适来负责的。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说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指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以及李大钊诸公。毛泽东还说,“由他(陈独秀)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

党。”(《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可见,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早为毛泽东等后起者心悦诚服,铭记在心。学生固然可以而且必然后来居上,可以而且应当超越先生。但在当时,学生毕竟还是学生。过去几十年的党史、革命史、民国史乃至近现代史学者,不知写了多少书和文章,已经把这件事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反倒是近年有些作品和作者把这段历史弄得相当混乱。例如,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一家报纸推出的记者访谈,说湖南长沙在1920年秋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比毛泽东自己明确说的1921年秋提前整整一年。(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毛泽东自传》)难道就因为长沙党的发起者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历史家便可以毫无根据地涂改历史吗?又如,北京的另一家报纸,在2001年春夏之交,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号称“南陈北李”,创建中共的第一号人物被排在李大钊之后屈居第二,但能排在毛泽东之前,已属不易。然而作者说陈独秀在建党之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云云,同样违背历史真实。作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他不可能没读过数年前已经公开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卷);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下列确凿的史实:第一,陈独秀主持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随即又主持中共三大,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并率先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二,陈独秀主持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第三,陈独秀是五卅

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领导者和决策者；第四，陈独秀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批判者和这次批判斗争的领导人；第五，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他和周恩来等一道成功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在1927年3月底蒋介石抵达上海后，陈独秀保持清醒的警惕，部署武力反蒋计划，猝遭斯大林下令阻止。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暂时稳住蒋介石，依靠汪精卫推行土地革命，因而又有策划签署《汪陈宣言》之举。由此可知，陈独秀即使不是事事正确，他也并未如该文作者所说脱离“斗争第一线”。至于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右的“左”的错误都有），陈独秀作为总书记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同时作为听命于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国支部负责人，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尤其是斯大林）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方针的执行人，何况他对那些错误方针曾经予以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争。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联共高层夺权斗法时，陈独秀便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这顶罪帽，一直延续至今，仍被某些人当作天经地义，不肯撒手。在这种嘲弄历史的氛围里，五四浮雕的出现就不奇怪了。

高耸于五四大街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浮雕，以自认是陈独秀学生的毛泽东大幅头像居中，李大钊头像稍微靠边，蔡元培、鲁迅则偏在边角，而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也竟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写于1925年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的《沁园春·长沙》词也占居显著位置，比李大钊头像还大。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在这里竟变成“南毛北李”。这不由使人联想到以伪造历史著称的“文革”时期，那时北大红楼陈列中竟把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的办公室改成报刊管理员毛泽东的办公室。两种作伪一样荒唐可笑，后者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独秀一生跨越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位在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复杂多变、充满争议的人物。其所守定不变者，是进化、民主、科学、爱国和社会主义五大根本问题，始终如一，至死不渝。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关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和教育改革等主张，

后来一一得以实现。他在晚年重返五四，重拾自我，痛切总结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苦经验”，提出一系列带有预见性的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9月15日）民主主义是人类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且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五六百年才实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具有普遍性，民主就是民主，没有资与无之分，只是实施范围有广与狭而已。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苏俄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官僚独裁制度造成的，而非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不从制度上得到教训，只是反对斯大林，将永无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如果不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势将误尽天下后世，听任格伯乌蹂躏全人类。”（《陈独秀致西流信》，1940年9月；《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上述论断，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升华，并且已经或正在应验，或将在未来逐步应验，这是可以预期的。陈独秀一贯相信人类社会进化永无穷期；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领袖人物，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今天研究陈独秀及其思想，也应采取这样的科学精神。

西安事变——近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重大历史事件，都以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为中心而展示其复杂多变的进程。叙史者如何摆脱以政治功利为导向的个人或派别的感情因素和非好即坏、成王败寇的简单化绝对化思维方式，就成为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准确评判历史的关键。按照预先设定的某种政治功利标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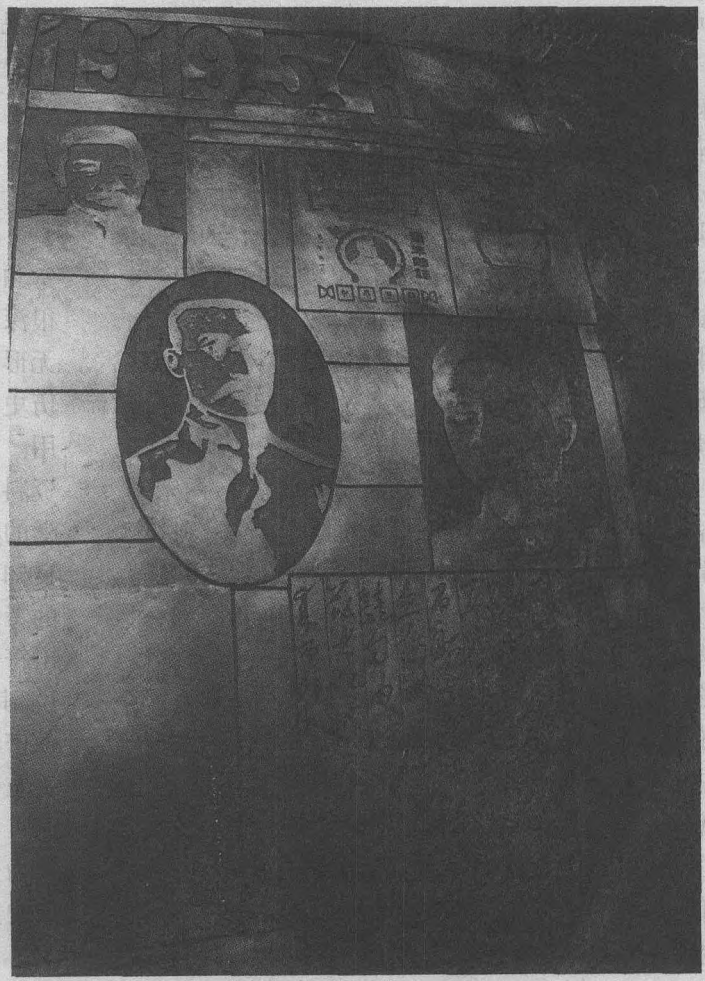
旦认为某人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百分之百正确,即使做错的事也要诿过于人以维护他的一贯正确,有的党史官员把这概括为八个字:“隐恶扬善,笔下留情。”倘若认为某人是错误路线代表,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百分之百错误,一切罪过都推到他头上,即如把红军西路军21800人的全军覆没之责推给张国焘那样。这就是长期困扰某些史学研究正常发展的感情因素与简单思维交织而成的某种史学危机综合症。

姑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问题为例。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又不可否认,它同时又有一个复杂变化的发展过程。过程中政策和策略的转变,必定包含认识的不足和某些缺陷。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事变对策时,除张闻天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不危及蒋介石生命安全的立场外,有些与会者如毛泽东、张国焘、秦邦宪(秦听完张闻天发言后转而支持张的意见)等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都有过激表示,以致事变发生数日后“审蒋”、“除蒋”之声在陕北不绝于耳。如果真实地记叙这段历史,不为尊者讳,就应一一写出他们每个人的过激主张。老实说,当一个手上沾满无数共产党人鲜血的元凶被擒,受其害者即使诛之杀之犹恐不足以平抑心中积忿,人们包括一些大人物要求公审除掉之,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这样,倒令人费解了。对于这件史事,可以有三种处理方法:一是合盘写出,随人评说;二是全部隐而不宣,任人揣摸;三是写一部分,隐一部分,写所当写,隐所当隐,即如只写张国焘如何过激,隐去毛、秦诸公的过激。不讳恶者讳贤者尊者,此之谓乎?我想,即使不是历史家,只是普通读者,也会对上述三法,作出正确判断而加以取舍。

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有些论者只强调中共的作用而将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撇开不谈。实则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乃是各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

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对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报,固然在12月20日后才到达陕

北,但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所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已经清楚表明苏联不赞成张、杨发动兵谏,力主保障蒋介石人身安全,“和平解决冲突”。经由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连续播送,使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西安的张学良、周恩来,甘北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等,至少在18日已获悉苏联乃至共产国际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立场。12月17日,潘汉年也从上海发电附译苏报评论给陕北中央。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弃除蒋及与南京政府对立策略。会议讨论中,张闻天、毛泽东均提及苏联报刊上述主张,张并表示中共今后作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鉴于当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不能不据以协调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策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全过程的凯丰,在蒋介石获释后,回顾上述策略变化时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1936年12月27日,凯



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五四运动碑

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向西安方面承诺结束内战,实行抗日等六项条件,并以此面告周恩来。依据张学良与宋美龄、宋子文事先商定的协议,只要蒋口头承诺并两宋担保,即应送蒋返宁。正当此时,某方又提出要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签署“政治文件”公诸于世,以防蒋走后变卦。25日是南京要求释蒋的最后期限,倘不释蒋,中央军即向西安开进,大规模内战势将无法避免。故而张学良对周恩来连招呼也不打,迳自秘密侍卫蒋介石飞往洛阳。蒋到洛阳即发表对张、杨“训词”,声称是他感召张、杨而非被迫妥协得以获释。事到此刻,各方都有台阶下,似乎应该皆大欢喜了。然而,在蒋介石“训词”激怒之下,西安《解放日报》于27日公布蒋介石六项承诺。28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也将六项承诺予以公布。基于对西安事变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中共这时确信,公开蒋的承诺将是逼蒋就范的有效办法。自认可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以西北为中心”推动南京方面“向左”。可是,事与愿违。张、杨武力捉蒋,对蒋已是羞辱备至,蒋能私下承诺六项条件亦属非常不易,再要他和南京方面公开承认一切,岂不让他威望扫地,日后何以服人?西安、陕北双方既要拥戴蒋领导抗日,又要张扬其秘密承诺,让他公开出丑,严重损害其政治形象和统治权威,只能使蒋在言行上做出否认姿态,坚持强硬立场。转眼之间,形势突变。31日张学良受审判刑,当晚南京电台宣布“剿匪,除奸,御侮”三项方针。蒋、宋严责西安方面“无信义”,两宋扬言退出调停,已撤的中央军回师重入潼关。共产国际随即来电批评中共,说是“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做出了什么保证”。中共中央也觉察到,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六项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应该承认,在拥蒋气氛弥漫全国的形势下,那种认为蒋介石已经投降,西北可以形成半独立状态,甚至要以此指导全国,只是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共产国际来电指出,中共同张、杨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同南京和解共同抗日这一主要任务。此后,中共更加强调和平方针,一再作出让步。1937年1月底,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最后达成和解,不料由此又引起东北军的内哄。2月2

日,东北军主战派青年军官刺杀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是为“二·二”事变。随着主帅张、杨的被扣押被放逐,东北军、西北军全部瓦解。张、杨在西安事变之初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力求根本变革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终于未能实现。西安事变只是在兵谏层次上取得成功,促成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容共抗战。西安事变最大受益者当属中共和红军。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数十年来中共一直盛赞张学良、杨虎城为“千古功臣”,乃是发自肺腑的无限感激之情。有兴趣的读者,若想更多了解西安事变史,不妨看一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和李义彬的《震惊世界的一幕》等书。正是这些著作,摆脱了过去长期沿用的从事物的结局或既定结论出发去推导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复杂多变发展进程,而轻视或无视对曲折变幻过程的具体考察的简单思想方法,在发掘新史料、采取新方法、树立新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历史,才使西安事变史逐渐清晰,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不是题外话:守定良知

质而言之,血火交加的现代政治斗争史,常常和诡秘多变的权谋相结合,历史的真相掩藏得很深,而且客观环境还会给历史家设置种种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尽管某些禁忌和戒律早已被历史真相的发现所突破,却依然发生禁阻的作用。历史真相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不断挖掘历史资料,不断评判修正历史,是历史学不断走向科学的必然之路。“不疑处有疑”,历史家只有心存良知,对陈词旧论质疑追问,才有可能进行细致的考订,而只有考订辨伪才有可能揭示真相,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其治史水准之高下,无不与其史才、史识、史德密切相关,而史德即良知赖以存在的基石是至关重要的。

世事易变。历史总是随时俗变易被打扮,因权力升降而沉浮。唯一无法被修饰的是那些正直历史家的良知。正是:良知宜永存,千载皆其然。

(责任编辑 庄建平)

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 闵 杰

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在汽车热兴起之前,在所有交通工具中,中国人对自行车情有独钟。因此大多数人也许会对本文将要叙述的历史感兴趣:自行车是一个半世纪前传入的舶来物,一百年前流行于中国各大城市,当时的自行车车型已经相当先进,直至20世纪90年代山地车等新型车流行前几乎被中国人使用了一个世纪。百年前自行车价格昂贵,而购买者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自行车的最初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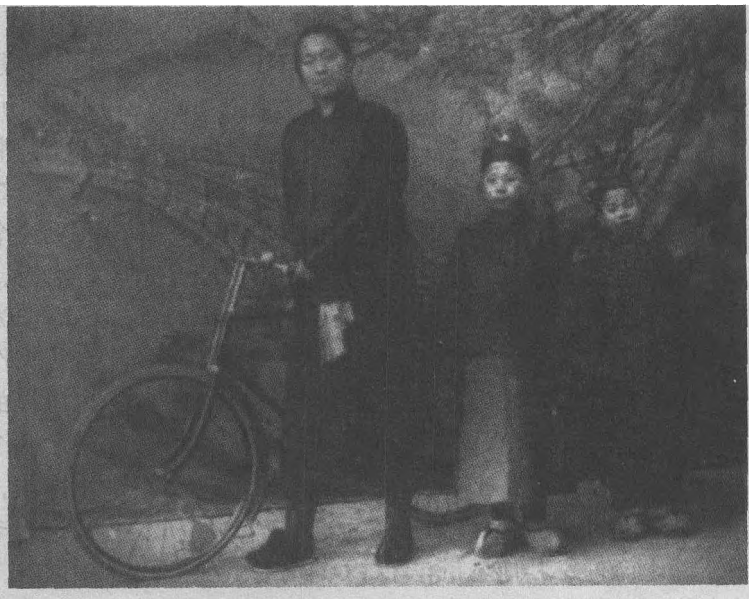
第一辆自行车传入的时间已不可考,这无关紧要,因为最早的自行车骑行起来很不方便,并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大量的史料记载,在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

自行车的发明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1790年,法国伯爵西夫拉克首次发明自行车。这是一种用两个木轮直线排列的最简单的自行车,没有链条,人坐车上,以两脚蹬地向前行驶,虽然与今天的自行车大相异趣,但比走路毕竟省力。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麦克尔和德国人费歇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踏板由金属制成,装在前轮上,骑车人可以靠蹬踏板驱动车子,运行速度大大提高,体力也节省多了。但这时的车身是木结构的。1869年英国人谢尔查发明了链条和中轴,1871年空心钢管开始取代木头构成车架,1880年滚珠轴承被应用到自行车上。在这一系列发明的基础上,1885年英国人斯塔利创造了全套自

行车链条传动装置,把脚踏板的运动用链条从前轮移至后轮,并设计了使车座、脚蹬子、车把、前后轮的回转轴相互构成三角状的结构,使自行车的运动合乎结构力学的原理,造成了自行车的革命,不仅运行速度大大提高,同时也节省了体力,自行车从此进入生产阶段。1889年苏格兰人杰罗巴又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自行车与今天的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在自行车发明和改进的各个阶段,这些不同类型的自行车都曾经传入中国。最晚不超过1868年,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据当年11月17日的《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的自行车不多,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自行车既有原始的靠脚尖点地而行的自行车,也有1839年或1853年装配了脚踏板的自行车。

上海的自行车是由侨居的外国人带进来的。



清末北京城里的自行车

风气开化的上海人对外国的新器物很感兴趣,因此 19 世纪 60 年代后自行车便不断传入,成为上海街头新奇一景。但当时自行车尚处于试制阶段,需要不断改进,传入的大多自生自灭,难以像其他传入的交通工具,例如马车、人力车那样流行起来。1876 年,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描写他所看见的上海街头自行车说(译文):“车子有前后两个轮子,中间是车座,前轮的两旁各有一个踏蹬,还有链条,前轮上方有横木作为扶手。人骑车上,两脚踏蹬子,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速度快如马车。但是,骑车者需练习两到三个月才能熟练。近来已不多见。”这段记载中所说的自行车的“踏蹬”设在“前轮”,车的把手是“扶手横木”,显然是 1839 年或 1853 年欧洲自行车第二阶段的产物。1883 年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译文):“从前上海有脚踏车,虽然行走如飞,但草软沙平尚有翻车之虞,一遇砖石瓦砾,便无法行走。因其不便,近已不见。”这些记载反映出,自行车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国,但长时间不能流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自行车本身性能不佳,骑车人不经长时间的练习不能掌握骑行技能,骑行中也容易摔倒。其次,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辆未与道路相配套,中国的道路坑坑洼洼,自行车轮子比马车小得多,难以适应;在宽敞平坦的马路普及之前,自行车在中国(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难以流行。

到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道路状况的改善以及自行车自身的改进,自行车在中国流行起来。自行车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当时有几百辆。据 1898 年 1 月 28 日的《申报》报道:“泰西(即欧洲)向有脚踏车之制,迩日此风盛行于沪上,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这里提到的是近期上海开始盛行自行车,不仅寓沪西方人,而且华人也开始骑自行车了。同年 4 月 1 日的《申报》又说:“每日黄浦滩一带,此往彼来,有如梭织,得心应手,驰骤自就。”这说明在 1898 年时,外滩马路上自行车已经往来如织,而且自行车经过改进后,骑车人已能驾驭自如了。

除上海外,其他城市也于 19 世纪末出现了自行车。1897 年,北京的一名法国医生去宣武医

院时,“坐脚踏车展轮而行”。同年 9 月,烟台一名西方人骑自行车穿城而过,引得“睹者咸为称赞不置”。除京师和通商口岸外,一些风气闭塞的内地城市也引进了自行车。1898 年一则有关江西报道说:“近日上海盛行脚踏车,江省初无所见。昨天某少年乘坐双钢轮脚踏车,由进贤门至贡院前一带驰骋往来,迅捷如飞。士人见所未见,无不讶为奇制。唯道途凸凹,不能任意驰驱”。

自行车由于轻灵便捷大受欢迎,但道路条件则限制了它的发展。1899 年,苏州官府因骑车人日益增多,而道路狭窄,经常造成交通事故,禁止中国普通百姓在城内骑自行车。被允许骑车者只有三种人:“西人、教士、教民”,其余“一概不准乘坐”。由于种种限制,到 1904 年春,成都市内仅有 7 辆自行车,其中 3 辆车的车主为外国人,1 辆为邮政局送信用,其余 3 辆的使用者为普通中国人。

百年前关于自行车的大胆预言

19 世纪末自行车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兴起,除了车辆自身的改进、城市道路的改善等原因外,还由于 3 名英国人骑车环游地球,途经中国长江流域大都市,激起了中国人对试骑自行车的莫大兴趣。据当时上海《时务报》、《申报》的连续报道,这次环游地球的壮举从 1896 年 7 月 20 日开始,从伦敦出发,由印度入中国,历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城市,1897 年 12 月 22 日抵达上海,历时 520 余日,行程 14332 公里。骑行者一路上风餐露宿,将沿途见闻随时记录下来,投往各大报馆,借助稿费支付旅游所需。在中国,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大批中国人前往看稀奇。抵上海时,寓沪外国人骑车几百辆蜂拥出城迎接,一时蔚为壮观,华人观者如潮。这一切,客观上为自行车作了最好的宣传。人们佩服这些骑自行车走世界的外国人,对自行车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几个月后,1898 年 4 月 1 日,鉴于上海人骑车骤增,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特地发表社论,作了一个大胆的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

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 世纪末,自行车修理

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

最早的自行车修理业务是从一些相关的行业起步的。如1898年4月上海史维记钟表铺在《申报》刊登一份广告说：“本铺开设上洋后马路兴慎里对门，修理钟表、机器脚踏车、一切泰西异样玩物，迄今数载。”这则广告还附有一自行车图片，以广招徕。此图片显示，当时的自行车与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同年6月，该店铺又登广告，声明除修理自行车外，开始代销自行车，可见自行车在上海已经初具市场。该广告说：“本号专理钟表、机器脚踏车、西洋玩物等件，精工巧造，四远驰名，今又到最灵巧第一架新式脚踏车，价廉物美。”所谓“第一架”，显然该店铺是首次代销自行车。该广告也配有自行车照片一幅，连同其4月份广告中的自行车图片，都是中国报刊中较早的自行车图片。

19世纪末，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

1899年12月13日上海《中外日报》的一则消息提到，某人之包车曾“与踏飞洋行之脚踏车相撞”。1901年该报又刊登踏飞洋行一则附有新式自行车图片的广告，广告写道：“本行专办各种脚踏车，出售外洋头等机厂奇造一种飞轮脚踏车，其速较快。本行不惜重资，远运而来，刻已

到申，尚幸价值平廉，想绅商之乐步飞者当欣喜而闻，为特布启。”显然，踏飞洋行至少在1899年已存在，是一家以销售自行车为主的外国商人开的店铺，到1901年已经专营自行车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都不难见到。1902年天津鸿顺洋行宣布：“专售英美各国男女自行车，各样飞车，时式无练[链]快车，车灯、车铃以及车上应用之件一概俱全。”该广告的附图是一辆女车。附图显示，这辆女车有车铃，车闸，还有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车灯，车链已经采取全包式。1903年，天津又出现一批法国制造的女式自行车。有关广告称：“美国巴希克洋行新到德国名厂制造头等新样女脚踏车十部，每部价银六十两。”按照当时白银与银元的比价1:1.4，60两白银约合84元银元。

车价昂贵，分期付款

清末自行车价格昂贵，无论南方的上海还是北方的天津，车价始终在80元上下浮动，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1900年初上海的一则销售广告说：“今有外洋精造脚踏车公司专托本公司在中国广为销售。该厂欲扬其名于天下，故价值廉之尤廉，所有车上大小物件，亦可零售。现因来货无多，凡有追风逐电之好者，速来尝试。

是价目列下：头等，价洋八十五元；二等，价洋七十八元。灯、铃全备。”可见当年自行车的价格有85元和78元两种。

此后的几年间，车价略略下降，但降价的幅度十分有限。1906年上海《时报》所登的一则广告称：“本行自运英国头等脚踏飞车，价廉物固，每〈辆〉计洋七十五元，可保用二三年。”1907年，天津日商新开设的加藤洋行为推销自行车，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每辆价80元，若采取一次付款方式，价75元。其广告称：“敝商会现在天津设立分号，专售英国克比多利市之盛货野司会社制造各样新式宝星牌自行车，与众不同。此车真乃货实价廉，且鲜明华丽无比，又兼非常坚固，敝行并可能保长久不坏。共运到五十辆。出售分期交价，以三个（下转80页）



民初骑在自行车上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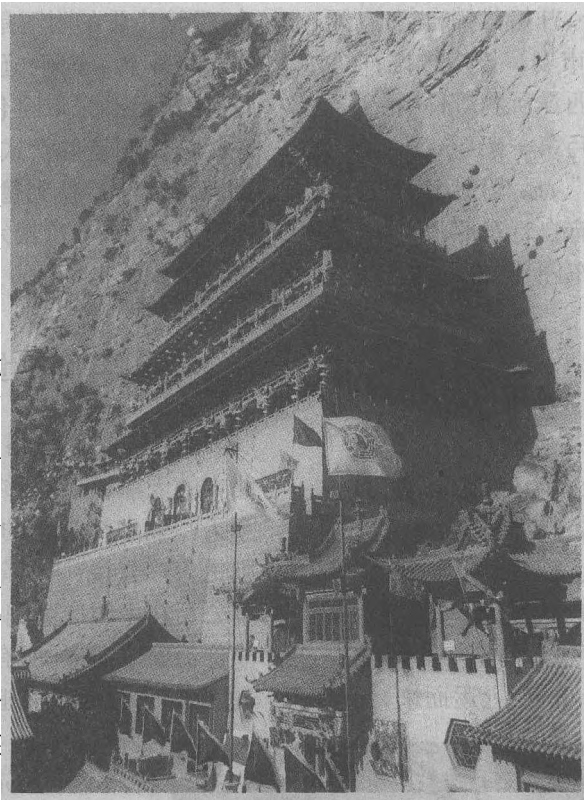
绵山的中国之源与中国之最

● 惠金义

介休绵山开放两年来，“五一”、“十一”两个长假期间，游人之多，均位列山西诸景区榜首，最多的一天，游客达3万余人，超过了著名的五台山与平遥古城，成为山西旅游的一个新亮点。人们为何如此青睐绵山，平遥人、五台人感到茫然，只要略加调查，就会发现，绵山，博大精深，有不少“中国之源”、“中国之最”，使游客为之陶醉。

据绵山通、原介休市副市长、晋中文化局长王融亮先生考证，我们日常用语中的一些成语、特定语言和传统的民间风俗有许多起源于绵山，不少游人到绵山就是为了寻根探源的。

“贪天之功”成语、以龙蛇喻人、“足下”一词与穿木板鞋，皆源于“介子推焚绵上(古时称谓)”的故事。最早记录介子推功不言禄事迹的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中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意思是说晋文公返国即位是“上天”的旨意，而狐偃、赵衰等人却欺骗说是自己的功劳，意即把天的力量，说成自己的力量，后来引申为抹杀别人的作用，并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身上，成了贬义词，一直延用至今。把人比喻作龙与蛇，也与绵山有关。《吕氏春秋》、《史记》等书记载说，晋文公封赏功臣，却忘了割股之恩的介子推。有人为之抱不平，编了一道顺口溜，叫《龙蛇歌》，贴在城门上，其辞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承辅。龙返其乡，得期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桥(意指木枯)死于中野。”这里把龙比作晋文公



大罗宫

重耳，把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等从臣比喻为蛇，从此人们把龙比作帝王，把蛇比作从臣。“足下”一词与穿木板鞋的习惯也源于绵山。南北朝宋人刘敬叔所著《异苑》说：介子推为了逃避封赏隐居，抱树被烧死，晋文公抚摸着烧焦的树木顿足哀号，后又命人砍下一块木头制成木屐（一种有齿的木板鞋），穿在脚上，走起路，听见响声，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割股之恩，愧疚地看着木屐呼喊：“足下啊！足下！”“足下”一词便由此而出，后来成了敬词。穿木屐习惯也曾风行全国，后流传到日本。

我国现在的一些民俗也起源于绵山，如寒食与清明节。据《左传》、《史记》等书记载，当重耳知道自己吃的是介子推从腿上割下的肉后，激动地问他：“你这样待我，我将用什么报答你？”介子推说：“我不求公子报答，我们君臣流浪在外，饱经风霜，深知民间疾苦，但愿你日后做一个清明的国君。”后来介子推在绵山被烧死后，晋文公十分悲痛，长跪在尸体前，放声大哭，哭了一阵移尸安葬，发现介子推的脊梁堵着柳树树洞，洞里有件东西，原来是衣襟一片，上有几行血书：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行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愿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看罢，将血书藏入怀中，将尸体葬于大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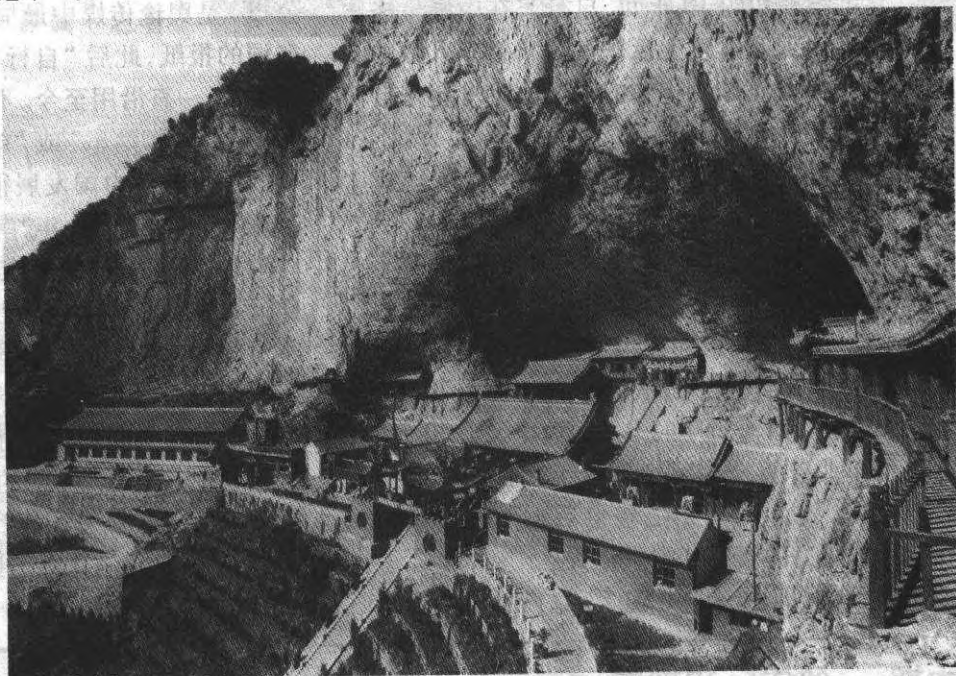
树下,决定把绵山封给他,称为“介山”。还下令,在他的每年忌日,不准动烟火,要寒食,这就是寒食清明节的来历。《吕氏春秋》把清明节说得更明确,第二年寒食的第二天,晋文公又来到介子推殉难的那棵大柳树下吊唁,他惊奇地发现这株被烧死的树又奇迹般的复活了,上面长出青青的柳枝,他欣喜地折了几枝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介子推割股奉君时对他说的做清明国君的那段话,又一次老泪纵横,把这棵树封为“清明柳”,把这一天定为清明节。之后,晋文公与随从把折下的柳枝插入土中,进而演变成清明节植树的风俗。

清明节上坟扫墓的习俗也源于绵山。介子推的高风亮节,受到人们的崇敬,每逢寒食清明,人们便自发地上绵山为介子推母子清墓,加培墓土,久之又演变成到自家的坟地扫墓祭祖。春季踏青也源于绵山。清明时节,正值春和景明,草青花香,人们踏着青草登上绵山,祭奠介子推,逐步演变为踏青。这种习俗始于春秋,形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发展成春游。

绵山,自身还有一些奇特的景观,可称得上是全国之最的就有十多处。诸如抱腹岩、蜂房泉、天桥栈道、大罗宫、木刻道德经百家书、碑楼与亭、防虫彩绘布画、悬崖宾馆、灯图等。抱腹岩是绵山的精华,到了绵山不看抱腹岩,就等于没上绵山。抱腹岩,是指山势像一个人张开两臂抱腹,这个“腹”是一块巨大的石盖,宽180米,悬空伸出,距地面80米高,盖下洞深50米,洞口又是一道陡坡,依坡就势建有200多间殿宇僧舍,据说可容纳1万多人。这种“抱腹”山势全国“绝无仅有”,奇险壮观。更奇特的是岩下内壁上悬挂祥铃。这挂铃,是将人从山顶用绳索吊在半空,靠绳索晃动,飞空凿洞拽棒挂铃,整个作业过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又是一绝。

过龙头寺,在一处高百余米、宽30米的凹形

石壁上,有数十个大小不一的蜂窝状石乳,泉水从乳头中滴出,称蜂房泉,又称悬泉。这种形状的泉,在全国罕见,也算一大奇观。而泉水甘冽,传说饮后能治痼疾,游人争相饮之。大罗宫,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明四暗二的6层仿古建筑,高达48米,面积达3万平方米,庑殿出檐,歇山盖顶,顶覆琉璃瓦,层层叠叠,闪闪熠熠,辉煌壮丽,是当今最大的道观。大罗宫是道教的最高境界,里面塑元始天尊等像。全国道教协会的许多活动在这里举行。在大罗宫的一座大殿里,紧贴墙壁是一幅巨型工笔画,貌似壁画,实际是画在布上,称布画,可随时卷走,非常便于保存。布画长50多米,宽2米,名叫朝元图,有100多个神仙,每位神仙高1.6米。画师融合永乐宫壁画与敦煌笔画技法绘成,栩栩如生。更称奇的是,绘画用的布经过20多种中药材浸泡,有防虫功效,这样的布画在全国也是一绝。使人们叹为观止的是大罗宫里还保存着新制作的《道德经》百家书木刻。20世纪60年代董寿平等百名书法家曾一人一段,将道德经全文书写了一遍,称《道德经》百家书,是国宝。上海市商务印书馆曾印1000册,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收藏一本,前年他登绵山时,送给了开发保护绵山的阎吉英。阎先后尊崇道教,读后,写了感情奔放的后记。为了长久保存,他从海外购进红花梨木,制成108块板,每块高4.8米,宽80厘米,请名家刻于板上,成为一件珍贵艺术品,挂在大殿墙壁,总长86米,气势恢宏,供游人欣赏。过了大罗宫,向朱家



抱佛寺

凹前行,抬头仰望,便会发现凌空高悬一条栈道,人称天桥,蜿蜒曲折,长300余米,宽仅1米,边上装有仿汉白玉栏杆。人走在栈道上,白云脚下缭绕,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栈道之长、之险,景色的美妙也是全国之最。绵山牌坊与凉亭之多也是全国名山罕见,全山共建有17座牌坊和60多个小亭,大都是传统造型。用料特别讲究,为了寓意介子推是一位廉臣、贤臣,特从河南开封选购来大块青石,用在龙头寺与介子推墓地牌楼,庄重严肃。小亭形状各异,大小不一,顶有歇山,悬山,券棚,硬山,多建在奇险处,有的玲珑,有的典雅,有的妙趣横生。

宾馆建在悬崖上也是绵山一绝。建筑外观均为明清特色,顺山势而建,能高则高,不宽则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玉峰山庄,三个建筑体,三种造型:清宏阁,下五层为正方形,上面两层为八角形;邀月楼,里边框

架结构,外檐木结构,上面三层为六角形;集仙居,下面一层,上面五层为偏六角,顶呈丁字形;云峰墅苑,建在48平方米的平台,一面凌空,一面紧贴石壁,下面四层,高20多米,上面五层,22米,琉璃瓦盖顶,靠电梯悬空垂直上下,是绵山最大的豪华宾馆。绵山之夜,流光溢彩,如梦如幻。镶嵌于危崖绝壁上的灯图,形状怪异,玄奥莫测。除了根据《周易》创作的河图、洛书、八卦灯图外,还有北斗七星灯图,九曜星君灯图,二十八宿灯图,周天灯图,……在光、电、声的配合下,闪闪熠熠,据说演绎着天地日月的万千变化,阐释着道家对宇宙万物生成的理解,启迪求知者以无尽遐想。绵山还有全国最大的宗教乐团,曾出访东南亚,在国内许多重要场合演出,在旅游旺季,每晚都有演出,清心寡欲的乐曲,使疲劳的旅客很快进入轻松愉快的境界,如醉如痴。(责任编辑 纪方)

(上接77页)月内为限。头一月付洋三十元,第二月三十元,第三月二十元。若付现洋,每辆七十五元。”这则广告可说明三个问题:1、自行车因属贵重物品,已采取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一次性付款的价格是每辆75元,分期付款的期限是3个月,每辆80元,比一次性付款贵5元。2、一家洋行一次到货50辆,说明天津自行车市场不小。3、一些名牌自行车已经出现:“宝星牌装置飞轮、明闸、链子包”,性能和装潢已相当先进。

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自行车在中国价格居高不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使用自行车人数的不断增加,市场远未到饱和的程度。1908年来自山东的报道说:“历下各街,坐脚踏车者络绎不绝,车价为之骤涨。”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

自行车售价昂贵,愿骑车的老百姓很多,所以在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在上海,平均每条马路有一、二家这样的车行。因车价贵,租费也同样很贵:头等新车每小时租费0.30元,全天2元;次等车每小时0.20元,全天1.50元;旧车每小时0.10元,全天0.80元。这种租车业务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各城市中仍不罕见,7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行车购买力的增强才自然消失。

自行车刚刚传入时,人们因它借助于双脚蹬

踏驱动行驶,形象地称之为“脚踏车”,偶尔也使用过“自行车”一词,例如1896年出版的《时务报》在报道3名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地球时,使用的就是“自行车”一词。但当时“自行车”一词远远不及“脚踏车”普及。在清末,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地区的报刊较多使用“脚踏车”一词。1902年天津《大公报》创刊时,受南方的影响,也曾使用“脚踏车”一词,但从1904年1月起,该报已基本上以“自行车”取代“脚踏车”。《大公报》是舆论传媒中最早使“自行车”成为固定名词的报纸,此后“自行车”一词在书面和正式用语中,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民间习语上,还长期称之为“脚踏车”或“单车”。

自行车在中国发展很快,特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上海发展更快,是中国的自行车王国。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有自行车9800辆,8年后增至29500辆。解放前夕的1948年,上海全市拥有自行车23万辆。发展到如今,自行车已几乎是城市人手一辆,农村户有一辆了。作为一种人力驱动的简便交通工具,一百多年来自行车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仍无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取代它在寻常百姓家庭中的地位。(责任编辑 庄建平)

本期: 终审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庄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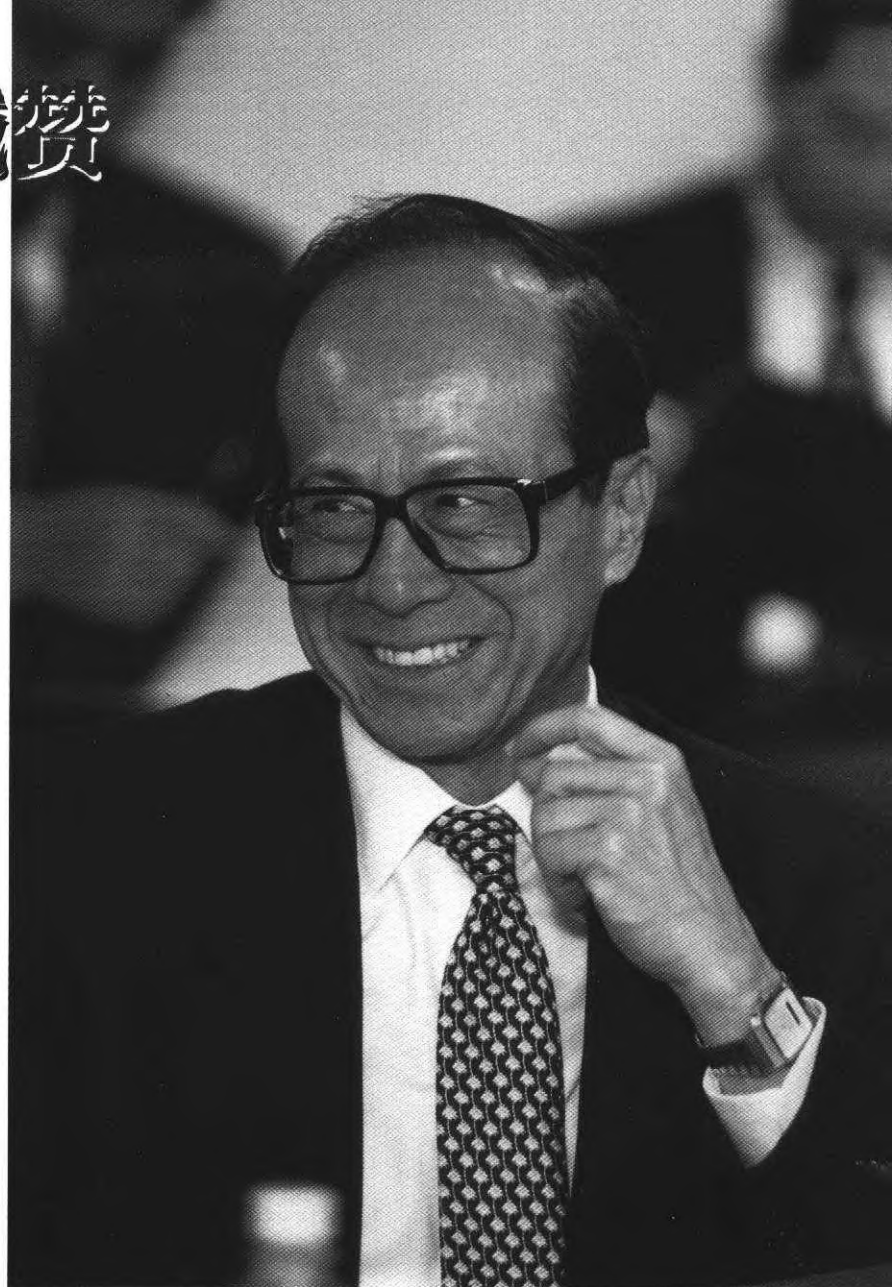
审校 赵友慈

七绝 · 李嘉诚赞

刘立山

靠勤靠苦靠精明，
唯运焉能巨业成？
赤子拳拳殷报国，
光辉并论比嘉庚。

李嘉诚——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他认为成功不能完全靠运气，要靠勤奋工作，靠个人条件。身为炎黄子孙，他把“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作为“毕生奋斗之宗旨”。他对祖国多有捐助，贡献卓越，堪与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相提并论，有“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之誉。



靠勤靠苦靠精明，
唯运焉能巨业成？
赤子拳拳殷报国，
光辉并论比嘉庚。

李嘉诚

刘立山《诗书长卷·炎黄骄子》选

- **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
- **刑讯逼供与封建主义“草民意识”**
-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 **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 **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
- **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自杀”真伪揭秘**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